

／ 一个投机者的告白 ／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

(Andre Kostolany) / 著

何宁 / 译

大投机家

Die Kunst über Geld nachzudenken

德国“证券教父”科斯托拉尼

八十年投机交易回忆录

[修订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投机者的智慧/（匈）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德）格劳著；邓小红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

书名原文：Weisheit eines Spekulanten

ISBN 978-7-80645-922-5

I.一... II.①安...②格...③邓... III.科斯托拉尼一生平事迹
IV.K835.16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1682号一个投机者的智慧
（修订版）

作者：（匈）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德）约翰内斯·格劳

译者：邓小红 梁东方

责任编辑：苏斌 刘德军

特约编辑：李鹏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812776

E-mail：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年4月 第2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100千字

书号：ISBN 978-7-80645-922-5

定价：28.00元

- 问题一：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先生，您1906年出生于布达佩斯，居住在巴黎，工作在德国，持有美国护照，那么究竟哪里是您的家乡呢？
- 问题二：但是您的家的感觉是与哪座城市、哪些地方联系在一起的呢？扪心自问，下面的这些问题您应该如何回答：我的家在哪里？我将叶落归根于何方？哪里给我留下了对生活的铭心刻骨的印象？
- 问题三：您人生的前20年是在布达佩斯度过的，追忆一下旧时光，说一下当时您的家庭，好吗？
- 问题四：您是受的天主教的洗礼，不过，您的家庭本该是信犹太教的，这是为什么呢？
- 问题五：您是由一位德国的家庭女教师带大的，是吗？
- 问题六：您又是如何相对来说那么早地远离家乡匈牙利去了法国巴黎呢？这与您的职业生涯设计有关吗？
- 问题七：第一个建议后来怎么样了？
- 问题八：您直到今日还一直坚信，要做证券生意，决不可人云亦云？
- 问题九：那么，您对当前的德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持乐观态度？
- 问题十：我们谈到了“建议”，您作为股票投资人是否曾以工作之便从官方那里得到过一些不是人人皆知的所谓内部消息呢？
- 问题十一：您是否认为，在几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搞内部控制真的有效呢？

- 问题十二：您父母打过您吗？
- 问题十三：我还想再回过头来说一说布达佩斯，您不仅出生，而且成长在君主立宪制国家，还在那里上了学。您印象中刚开始的几年是怎么样的？
- 问题十四：您对1914年战争开始爆发也有印象啦？
- 问题十五：您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匈牙利的反应吗？
- 问题十六：您的答案始终是来自于您对美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信任，美元根本不会下跌的，美元属于地球上的被证实了的东西。
- 问题十七：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未开展过一次真正的全面战备防御，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工作。纳粹们一直想全面但实际上也没有彻底组织这场战争。现在，回到您的青年时代，当您从布达佩斯去了巴黎时，您已经在学校和跟您的家庭教师学了德语吗？
- 问题十八：您也已经能说法语和英语吗？
- 问题十九：您是怎么到了巴黎？那是在哪一年？
- 问题二十：那是欧洲极度通货膨胀之时，对您却影响不大，是吗？
- 问题二十一：德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德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自打那以后，德国人患上了永久性的与德国政治休戚与共的通货膨胀恐惧症。他们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受到这种恐惧的伤害，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科斯托拉尼先生，他们经常在一些文字章节中提到“通货膨胀恐惧感”，而且他们非常重视马克的稳定性，并把对此稳定性的把握能力视为评判德国银行的基由，是拥戴还是攻击。您如何看待通货膨胀并不是最大的苦难的说法？
- 问题二十二：我们对黄金从没有这种依赖性。您估计我们落后于法国，原因何在呢？
- 问题二十三：现在我们谈一谈您年轻的时候在巴黎，是不是很快就进了亚历山大先生的公司了？
- 问题二十四：您是如何步入股市的？
- 问题二十五：就在您这几年成功的职业生涯期间，在德国，纳粹势力逐渐强大，您对其影响力做过估计吗？

- 问题二十六：当1940年反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您和您的同事，以及法国人是如何反映的？
- 问题二十七：德国的犹太人的境况不同吗？
- 问题二十八：不过您在美国并不仅仅是成天参加各种各样的晚会，您是移民，是为了躲避迫害从欧洲逃离出来，到这里避难的。您是如何量入为出，维持生计的呢？
- 问题二十九：您当时的20万美元按当今的社会购买力折算的话，是现在的多少倍呢？
- 问题三十：您是否想过办一家自己的经济实体？
- 问题三十一：这是一个富有的年轻人的经历。为什么您在二战结束后又回到了欧洲呢？
- 问题三十二：然后您在欧洲都做了些什么呢？股票交易所肯定都是都关了门了。
- 问题三十三：您是如何明智地预感到，德意志帝国或者说德意志帝国的后来人的购买力会再次恢复呢？
- 问题三十四：那您得到了您所期待的了么？
- 问题三十五：到现在为止您已经多次使用了“天主教”这个词，您本人是天主教徒，阿登纳也是天主教徒，您如何理解天主教教义？您参加天主教的宗教节日吗？您笃信天主教的教义吗？
- 问题三十六：在随后的几十年生涯里您又开创了一个新的事业。您成了一名记者，32年来，您为经济报纸杂志写了大量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文章，在您的同龄人都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时侯您并不服老，而是奔走各地，到处演讲，不遗余力地宣讲您的理论。您为什么要这样呢？
- 问题三十七：在IOS事件中您做得非常正确，使德国大众免遭了一次大的损失。从这次事件以后，您似乎成了德国经济发展的理性指导者。您认为当今的政客是缺乏经济理性思维的，或者说您对欧洲经济政策的现状还是持满意态度？
- 问题三十八：为什么富有的人有危机呢？
- 问题三十九：您没有错过企业经济学或者是国民经济学的学习机会吧？
- 问题四十：今天您是否还会说，现在学院派的经济理论太多，实用的经验认识太少呢？

- 问题四十一：您对现在的大学校园和现在的学生们有什么印象？和他们有交往吗？
- 问题四十二：您说世界是和平的、经济是繁荣发展的，但是在非洲、在安哥拉、在莫桑比克、在印第安、在拉丁美洲还存在着种族之战；阿富汗也还没有和平；在我们的附近。古老的南斯拉夫也还是战火连绵。
- 问题四十三：那您是否要对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来表达您的观点：人们应该自我解放？
- 问题四十四：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提到了建立和平新秩序，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世界的确又是一个平和的世界。不过，您对我们现在的世界秩序真是百分之百地满意吗？
- 问题四十五：科斯托拉尼先生，您的兴趣和关注点一直就是钱，您最大的爱好一直就是音乐，对吧？
- 问题四十六：您的父母亲让您去上过音乐课吗？
- 问题四十七：您在一生中是否结识过和您同代的大音乐家呢？
- 问题四十八：您认识伊高·斯塔文斯基吗？
- 问题四十九：其他一些人您不仅见过而且还有很多交往，特别是歌剧作曲家埃梅里希·卡尔曼；您真的喜欢他的作品吗？
- 问题五十：当我想到贝拉·巴托的时候，我感到您所提到的其他那些作曲家都是在另外的一个曲子的基础上搞创作的。您是在哪儿认识的贝拉·巴托呢？
- 问题五十一：您认为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之间的过渡者是谁呢？
- 问题五十二：但是，并不是说音乐家都特别爱谈论钱，文学家们也不是都特别爱谈论钱，是吗？
- 问题五十三：您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吗？
- 问题五十四：那好吧。不过，要是另外一种情况，愿意和您谈谈股票或者理财的不是知识分子，不是艺术家，而只是单纯的普通消费者，他们只有微薄的普通收入；这样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您有哪些建议？
- 问题五十五：您的生活开始于匈牙利，在后来您又把生活的重心转向了匈牙利，还在那儿买了一所房子。
- 问题五十六：您是如何看待匈牙利的发展的呢？

- 问题五十七：您如何看东欧国家呢？
- 问题五十八：您从布达佩斯到了巴黎，与布达佩斯的联系却从来没有间断过。除了哈波斯堡的奥拓之外，当今的匈牙利的各路豪杰之中，您还和谁有联系？
- 问题五十九：他的匈牙利语怎么样？
- 问题六十：科斯托拉尼先生跟您谈话的人根本就想象不到您是1906年出生的，而且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过去的人们不像今天的人们这么幸福，那个年代的人该会把您这个年龄的人作为寿星来看待了。您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而且总是充满激情，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意思正好相反的问题：科斯托拉尼先生也会偶尔地想到死亡吗？也会想到生命的尽头吗？
- 问题六十一：是的，这些是与死亡相连，但却又是来自于生活的一种念头。如果允许我接着问下去的话，再以后呢？对于您来说死亡是一种终结吗？还是说死后还有某一种存在的方式继续施加自己的影响呢？
- 问题六十二：那您给自己留了惊喜吗？
- 问题六十三：您也做些身体运动吗？
- 问题六十四：科斯托拉尼先生，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些绝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呢？您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观点，您都是以此为杠杆，来衡量其他的事情呢？
- 问题六十五：您希望自己被人看作是博爱的慈善家还是被人鄙弃的人呢？
- 问题六十六：我想，日后如果有人总结您的事业生涯和声望的话，一定会让您感兴趣的，是吗？

问题一：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先生，您1906年出生于布达佩斯，居住在巴黎，工作在德国，持有美国护照，那么究竟哪里是您的家乡呢？

答：我出生在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匈牙利，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儿童和少年时代；我成长在古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国；二战期间，我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纽约；战后我又回到了欧洲生活。我在联邦共和国范围之内频繁地旅行；我以10个城市为家，先是纽约，

后是伦敦、苏黎世、维也纳、威尼斯、日内瓦、法国的科特达祖尔、慕尼黑，当然还有巴黎——27年以来我主要居住在那里，即使有时候会离开，但是应该说一直还是住在那里的。我感觉慕尼黑和联邦共和国也是我的家，真的！我在慕尼黑和巴黎的时间，比在布达佩斯的时间要长得多；不过，我仍然一直热爱着匈牙利。

问题二：但是您的家的感觉是与哪座城市、哪些地方联系在一起的呢？扪心自问，下面的这些问题您应该如何回答：我的家在哪里？我将叶落归根于何方？哪里给我留下了对生活的铭心刻骨的印象？

答：对于这几个城市我有着不同的感觉：我的父母被安葬在苏黎世——尽管墓地已经不在，因为那里的土地拥有权只有10年；这并不重要。在巴黎我有年长的股票朋友；我每年在布达佩斯的高中的毕业会上同我年轻的朋友们会面；我在慕尼黑没有未成年的朋友，但是那里的朋友心都是年轻的，他们的年龄介于18岁到70岁之间，有的可以当我的孩子，有的能做我的叔叔。现在，我的大部分同事和朋友都在德国；因为在巴黎和布达佩斯总有些东西会让我伤心。我很少住在纽约，尽管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如果人们问我，我讲什么语言，我的回答是：在祈祷的时候，我和仁慈的上帝讲匈牙利语，与年轻的同事和朋友我讲法语，和我的学生朋友们我讲德语，同银行打交道的时候我讲英语。

问题三：您人生的前20年是在布达佩斯度过的，追忆一下旧时光，说一下当时您的家庭，好吗？

答：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我父亲开了一个酒厂，酿造健胃苦味酒，就像现在的文达山酒，而且他把事业发展到了首都布达佩斯。

我有3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一个是长我14岁的哥哥埃梅里希，一个是我比我大10岁的哥哥贝拉，两个人都是先在德国、后在伦敦学习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刚过，他们就回到了布达佩斯。不久，埃梅里希到布达佩斯一家银行去工作，贝拉接

手了那个刚才提到过的建于1803年的酒厂。我的姐姐丽丽比我大8岁，在我儿时的印象之中感觉她对于我来说有时候就像我的第二个妈妈。丽丽有过两次如意的婚姻，除此以外还有一份丰厚的嫁妆。她的第一个丈夫与我父亲是同行，是个业主，专门酿造白兰地酒，很招人喜欢。我对他崇敬有加，我的姐姐也是在对他有了好感以后心甘情愿地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她的第二个丈夫安德烈思·拉波，是银行行长，二战后他们结了婚，并一起去了苏黎世。我姐姐1988年以91岁高龄安息在了那里。她在那里曾经过着殷实的生活，因为她丈夫同布达佩斯来的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经营不错，这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无疑，在我大姐的眼里我是我妈妈最娇惯的老小。这倒不是说，我母亲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待人有所偏向；恰恰相反，她的自我道德约束比我爸爸还要严格，我爸爸其实是一个“狡猾”的人。当我母亲在浴室里这样评价他时，甚至这个词刚一出口，她自己的脸就先红了。她恪守自己的原则，却不事声张，这也是为什么我姐姐没有秉承她的言行的原因。我总是听到我母亲唠叨我姐姐丽丽：“我真不知道，她的话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的父母亲和睦相爱，我确实常常向人说起或在书中写到他们。依照我家的经验和我自己的“真知灼见”，如果男人无忧无虑、心宽体胖，女人就该把紧钱罐，精打细算。要是我父亲又乱开销了，我母亲就会抱怨他浪费，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又怎么了？这总比把钱送给药店好。”他有着艺术家的浪漫与放荡不羁，同时又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

那还是在20年代的时候了，我妈妈常常叮嘱我些类似这样的话：“过马路要注意呀！”、“上电车要小心呀！”我父亲却对此毫不在意，也从不督促我自己做家庭作业。他生性乐观，心无牵挂。1944年，二战期间，布达佩斯受困，我父母必须整日躲在防空洞里；当时，硝烟弥漫，弹片横飞，房屋剧烈摇晃，好像随时都要倒塌，可我父亲却不停地安慰大家：“会平安无事的，会平安无事的，我们会渡过难关

的。”事实果真如此，他们在枪林弹雨和重重包围中非常侥幸地挺了过来。

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他的豁达与乐观。那时，我姐姐总是在中午休息时到防空洞里来，告诉他们布达佩斯来的最新消息。

一天夜里，我妈妈最喜欢的外甥女，我的表妹伊丽莎白突然患重病夭折了。我姐姐本想把这个消息婉转地告诉母亲：

“很遗憾，妈妈，伊丽莎白得了重病。”她说道。

“噢！圣母玛丽亚！”我母亲大叫起来。

“那又怕什么？”我父亲喃喃地说，“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不过，她病得特别严重。”丽丽坚持说。

“送到医生那儿，不出几周就会痊愈的。”父亲大叫着。

“医生已放弃了。”丽丽黯然神伤地说。

“上帝呀！我的上帝！”我的母亲无助地自言自语。

“这没什么的。”我父亲安慰着她，“我有个做医生的朋友默勒，他有回天之术，常有些眼看着没了救的病人被送到他那里；不过，这会儿，他去吃午饭了。”

面对被不幸的消息愁得不知所措的双亲，我的姐姐不忍再绕来绕去，只好如实招来：“其实，你们该得到真实的消息，伊丽莎白，她昨天夜里已经死了。”我的父亲却只是喃喃地说：“她已经死了，现在，我们也无能为力了……”这样一来，这场争辩也就偃旗息鼓了。

还有，是在他临去世之前。他已87岁高龄，在苏黎世，患肺炎，躺在病床上，他还在让我递给他鱼子酱和酒。我感到他在好转，自然第二天又返回了巴黎，因为他的确看起来好些了。就在他闭眼之前不久，护士小姐走进来，问他：“您怎么样，科斯托拉尼先生？”他面带微

笑，声音洪亮地说：“很好，可爱的小姐。”我母亲心里却早有了预感，她说：“有漂亮的小姐在眼前让你赏心悦目，这会让你马上好起来的。”就在那天，我接到了我姐姐的电报，父亲去世了。

问题四：您是受的天主教的洗礼，不过，您的家庭本该是信犹太教的，这是为什么呢？

答：在我出生之前我父母已经改信天主教了。所以，我一出生就成了天主教徒，并依天主教的仪式受了洗礼。不过，我们过去是犹太教出身。“犹太教”，在二战时自然是含意深刻的。那时，在布达佩斯很多犹太教徒改信天主教了，接受了天主教洗礼。但也并不全部如我们这样，有些人改信了新教或者加尔文教。我的一个儿时伙伴就是这样，现在已是91岁高龄了，住在法国的瑞丽拉，每天还在玩桥牌。我的最好的朋友汉斯卡尼茨也是改信了新教。他们在新教教会中学上了学，不过闲暇时也同异教徒们有很多的接触。我们家的朋友圈里不仅有犹太教徒，还有其他的，就像市政议会一样，有容乃大。顺便说一下，我父亲也是议会成员。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和睦相处。当时的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布达佩斯犹太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是当时那些有钱的贵族，而是犹太人同德国南部的施瓦本人一起建立了布达佩斯。匈牙利当时的50万犹太教徒中有30万居住在这里，布达佩斯在那时是一个犹太教味道很浓的城市。所以，有人称之为“犹达佩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修复了这个城市，使之成为“两院”所在地：参议院和各阶层人士组成的众议院。众议院包括所谓的工业巨头，再有就是天生的贵族，第三就是匈牙利本土的各团体协会的代表，其中还包括各种宗教团体，有天主教的，当然也有加尔文教的，30%的匈牙利人都信仰加尔文教。除此之外，还有新教代表以及其他小的教派的人，比如：反对三位一体派信徒，基督教新教的浸礼会信徒，甚至还有安息日教派的。安息日教派信徒也是基督徒，这些犹太教徒不是把星期日，而是把星期六作为安息日。我有一个学校的同事就是这个教派的。

参议院就是一个多彩的大杂烩，这也正是当时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缩影。犹太人的两位犹太教大经师作为代表进了参议院，一个是乡镇里选出来的，一个是正统的高层人物。在美国，一般还有来自改良派的代表，可惜，那时在匈牙利还没有改良派。第一位大经师叫埃玛努埃·勒维，他总是穿着传统的匈牙利民族服装。他的对手是那位来自于上层的正统人物——科普尔·来希。他看起来总是那个样子，穿着长袍，蓄着大胡子，带着犹太式的帽子，像我们今天常看到的那种。我的学校在佩斯，在我从施瓦本山到佩斯去上学的路上经常能看到他坐在钢丝吊椅里。

一些布达佩斯人不知道这个小学校；这里需要做些解释：多瑙河流经这个城市，把城市一分为二，一部分叫“布达”，另一部分叫“佩斯”。埃玛努埃·勒维经师坐在钢丝吊椅里，跟他的学生们聊着天，他常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依照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建参议院时，其成员必须得到那位资格最老的经师科普尔·来希的同意，而且，第一次参加议会的议员要穿传统的民族服装。这对他来说，太麻烦了，他是个正统人物，所以，他既不佩剑，也不穿传统服装了，干脆只拿了教仗，谁能想象得出这是个什么样子。所有的议员都穿着民族服装，只有那位致开幕词的院长，一如既往地穿了长袍。这两个传统是无人能够破坏的，这一尴尬的困境使得科普尔·来希进退两难。于是，有人暗示他，可以在第一次大会时不露面，以避免与传统规范相违背。假若他不在场，自然地他之后的第二位长者将坐在这个位子上。不同宗教团体代表云集参议院，这就像今天书本里所说的独一无二的民主政治。当时，这一点可是至关重要。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位叫埃玛努埃·勒维大经师，他曾在布达佩斯大学作过慷慨激昂的反对“名额限制”的演讲。所说的“名额限制”与现在的含义不同，那时，对于各个教派的议席是有名额要求的，是一个平均数。匈牙利议会商定犹太教学生的入学率不能超过6%。因为依一些政客的观点，那时已经有太多的犹太学者、院士、知识分子之类的人了。而有些人，比如说我，已经受天主教洗礼很长时间，就很庆幸自己不再受“名额”的限制了。埃玛努埃·勒维先生为此而战，奔走呼号，却无济于事。他虽失败了，但他所做的却在历史长河里掀起了波澜。很多当时以没有名额或因反对排斥犹太主义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人移民美国，后来在那里成了大学者。这其中

著名的物理学家莱奥·斯茨莱得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维格纳，他们同恩瑞克·费米一起进行了原子弹的研究。我儿时的伙伴爱德佳·泰勒还承担起了氢弹的研制工作，并成为原子弹防御系统SDI总统顾问团成员之一。苏联人也需要原子弹防御系统SDI以加强国防，这迫使苏联不得不在裁军谈判中作出让步。可以说，爱德佳·泰勒为缓解世界紧张局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样看来，布达佩斯大学的“名额限制”的规定对于促进世界和平进程也是功不可没的。

直至今天，在美国没有一家大学会拒匈牙利教授于门外。

问题五：您是由一位德国的家庭女教师带大的，是吗？

答：她不仅仅是一位女教师。她叫索菲·露丝，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班贝格人，在布达佩斯经营一个促进德国民主改革的文化协会。我时常想起她，因为她给我们全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了解了德国和德国人。还因为她，我有幸早早地有机会学习德语。索菲·露丝小姐非常热爱她的家乡，极其憎恨法国人，她从来不屑于说“法国人”这个字眼，在她头脑中他们只是“肮脏的法国人”。她的观点未必是偏激古怪的，这主要是当时的德法两国关系的反映。

问题六：您又是如何相对来说那么早地远离家乡匈牙利去了法国巴黎呢？这与您的职业生涯设计有关吗？

答：不，的确是出于偶然。我在布达佩斯学了哲学和艺术史。我父母每年冬天都要去科特达祖尔，顺道游一游巴黎。我父亲拜访了他的供职于学校的老同事，亚历山大先生。他是个风趣幽默的人，不仅是他，连他的家人都是令人非常愿意与之交往的人。他和一个友善的法国女人生了4个孩子。一个不怎么争气的儿子，两个可爱的女儿。大女儿是个学者，在匈牙利始终不渝地爱上了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艺术收藏家内梅斯。他住在斯荡山的一个城堡里。亚历山大的二女儿安东尼特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人，她是那个年代著名的大诗人保罗·格拉地的情人。后来她同德国有名的画家马克斯·恩斯特结了婚。她给我留下

的印象最深，因为她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这取决于她的家庭，因为她的父亲是开商品交易所的。她爸爸和她的叔父同时还开了一家经纪人公司。

那次拜访亚历山大让我父亲意识到一个事实，法国法郎正有一个炒作的机会；事实上那个时候，法郎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正陷入低谷。当时的法国正饱受战争之苦，在打败德国的那场战争中大伤元气，死了上百万的士兵；很多城市都成了废墟，国家的金融业彻底瘫痪。

两个人还谈论了彼此的家庭，亚历山大问：“您的孩子们现在在从事什么工作？”我父亲说：“大儿子当了银行行长，二儿子接手了一个家庭工厂，我的女儿家庭很幸福，我最小的儿子安德烈学的是哲学和艺术史。”

“什么？这有什么用？他会成为诗人吗？把他送到巴黎来，他会学到更多东西！”亚历山大说。这个建议太棒了，从此我开始了生命旅程的第二个阶段。

问题七：第一个建议后来怎么样了？

答：关于证券的那个建议太糟糕了，法郎的投资使我父亲失去了一大笔钱。

有一位胆大心细的来自斯图加特的德国投机商，福利兹·曼海姆博士，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是阿姆斯特丹的门德尔松家族公司的总经理，也是老牌的柏林门德尔松贵族公司的合作伙伴。他曾经受通货膨胀投机大王卡米罗·卡斯提罗尼之约去维也纳赴一个盛大的宴会，这位通货膨胀投机大王曾经在维也纳的通货膨胀之中赚了上亿先令；通货膨胀投机大王卡米罗·卡斯提罗尼现在有个顽固的观点：法国法郎就像现在的匈牙利君主立宪制的货币一样肯定要跌入低谷。福利兹·曼海姆向人游说他的观点，他同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的几位银行家和投机商人一起组建了一个辛迪加——企业联合组织，为的是凭借着他的专业报刊向法国法郎展开攻势，并最终在所有的金融市场上将其彻底打垮。

向某一种货币大举进攻，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尽可能地弄到这种货币的大额贷款，然后抛向世界所有主要的金融市场，比如伦敦、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再在报纸之类的媒体（还包括口耳相传的方式）上大吹大擂，大造声势；然后，这个货币慢慢得就会走向低谷，低落的情绪在大众之中的悲观主义者那里悄悄蔓延，这样的蔓延越发的使那种货币走向低谷，恶性循环的锁链越来越紧，有些人就会把手里的法郎存款抛出去，那些债务人就可以趁机大量收购，从中牟取暴利。事实就是这样的，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策略，就像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卡特政府在对美元的控制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一样（有关历史事件，请参阅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美元的命运》，2000年3月第一版）。卡米罗·卡斯提罗尼和福利兹·曼海姆博士这两驾马车获得了绝对的胜利，伴随着欧洲所有投机商们的抛售，法国法郎的行情越来越低，卡米罗·卡斯提罗尼也就变得越来越富有；当然也该对这些当时成功的投机商们说点好话，这个卡米罗·卡斯提罗尼也为当时的文化事业做了很多贡献，比如说他一直资助当时的一个大剧院和一位来自莫扎特的出生地萨尔茨堡的戏剧表演家——格林德。

法郎的行情每况愈下，法国政府也对自己的货币失去了信心，无能为力；国家和货币一起都走向了底谷。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笼罩在法国的氛围，一切都恍如昨日。

1926年，左派联盟在爱德窝得海利特的率领下，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他是一位亲德的政治家，里昂市的市长，同时也是音乐和贝多芬的研究者。他的财政部长安那·托罗是一位杰出的智者（我随后和他私交甚密）曾经在议会做了一个演讲，一开始就说：“我的先生们，钱柜已经空了……”

整个议会震惊了，全法国震惊了！法郎再一次跌到了一个新的低点，法国政府的士气也跌到了新的底点，法国人上街游行，仇视外国人的势力日渐抬头，就像一首老歌里唱的：“外国人来了，吃光了我们的面包……”有人向外国人坐的游车扔石头，正在上演外国电影的影院也遭到了袭击。恐慌尚在，法郎却已经死去了！

局势突然有了转机，外汇经营商们应该都注意到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新形式。消息来自爱丽舍宫：里孟德·普恩加来接任了总理，同时将兼任财政部长。

普恩加来在法国人心中就是正直与善良的楷模；他又是坚定的爱国者。他的上任使证券市场每分每秒都在急剧变化着。他是在这个时机里挽救法国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是个纯粹的法学家，品行高尚，生活俭朴自律，内心执着坚定，行为果断勇敢。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共和国的总统，狂热的反德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得到了纽约银行的大力支持：两亿美元的长期贷款。

一切都像是受了魔杖的驱使。那些专门在行情下跌时做卖空投机的人陷入了另一个恐慌中，他们急于购入法郎，他们只能这样做，因为在追着抛售时，他们已经伤痕累累，现在他们要挽回经济损失。我的一个朋友经营着一个陶瓷厂，为此损失了上百万，因为这个厂刚刚贷了一笔款，就赶上了这场金融动荡。法郎一路攀升，越走越高。在证券交易中，人们根本不能根据他人的交易委托来判断国外的交易行情。现在只能做交易委托，因为全欧洲所有的大小投机商们贷款买的都是法郎有价证券。现在，每个人都想脱手。几千个投机商破产了，甚至几家大型法国公司也落入重围，因为他们贷了上百万法郎。法国法郎在一年内增长了100%，法国中央银行甚至不得不借助外汇手段巧妙地把兑换率控制在较“低”点。记忆中，在法国金融史上，称这一段插曲为“法国法郎的窃笑”。整个维也纳，半个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以及阿姆斯特丹都垮了。

我父亲采纳了亚历山大的第二个建议：送我到巴黎，从师于亚历山大，学习金融。我似乎从天而降，一下子到了巴黎。我不知道，今天的人们能否想象，我，一个来自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尚未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的贫穷落后的布达佩斯的年轻人，来到了巴黎，面对我的是什么？

问题八：您直到今日还一直坚信，要做证券生意，决不可人云亦云？

答：绝对正确。我的信条是：是信息，同时也是毁灭。我已多次实验，百试不爽，所以，我坚信自我，决不盲从。而那些毫无主见，听信他人的投机商，常是倾家荡产。从而我也极少给他人建议，只是教他，如何通过点子赚到钱。不过，我还是给投资家们提了个建议，让他们去药店，买点安眠药，蒙头大睡。把闹钟上到3年后的1999年，任窗外电闪雷鸣，尽可闲庭信步。因为整个国际股票交易市场包括德国在内都将会是赤字经营，直到1999年。到那时投机商们睡狮猛醒，会意识到他们将面对一个美妙的惊喜。

问题九：那么，您对当前的德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持乐观态度？

答：是的，绝对的。不仅如此，我认为，德国的经济甚至还将会出现第二次腾飞。我不知道我能否赶上那个时候，但我希望如此。我也愿意坚守这个预言。我已经预言并验证了德国的第一次经济飞跃，而且我从中大受其益。

问题十：我们谈到了“建议”，您作为股票投资人是否曾以工作之便从官方那里得到过一些不是人人皆知的所谓内部消息呢？

答：我曾常写到这一点。结果就如同那些建议一样。我们必须想到这些信息的另一面。我若这次这么做了，我就会成为赢家，但若我盲从了所谓的内部消息，我就会上当受骗。就像毕加索的肖像画，头朝了下，脚冲了天。任乾坤颠倒，我自心中有数。如果一个公司老板建议我购买他们公司的股票，我就会恰恰相反地采取措施，决不轻举妄动。从前，法国最富有家族之一的拉尼尔家族，就是听从了内部消息，全部财富化为乌有，这是整个家族的一个奇耻大辱。

我一个很好的亲戚也是这样在股票交易中被卷入泥潭的。他在墨西哥和法国两国政府之间从事工业贸易，并且同拉尼尔家族的几个公司都有着很好的协作关系，1952年复活节的前几天，在卡尔顿大酒店的大厅里我碰到了他。他坐在我旁边向我提出了下面这些令人深思的问

题：“安德烈，您现在在干什么？在对付法郎吗？您不觉得法郎要贬值吗？”我说：“怎么？我怎么没有看出来？”然后他说：“当然有了，现在有很多说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要给你解释清楚可不是一句半句的事儿，但是我觉着法郎肯定要贬值。”我说：“我真的不明白。”他仍然十分自负地断言，法国法郎在秋天之前，肯定会贬值。后来的事实使我更好地理解了他。我这个亲戚是个知情人，因为他跟拉尼尔家族过从甚密。实际上他们这伙儿人是在一起操纵金融业务。就在几天之后，也就是复活节那天的晚上，他进了赌场，向我走过来，对我说：“我刚刚获悉墨西哥的比索贬值了35%。”

这个消息使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使他喘不过气来。我很快就了解到，约瑟夫·拉尼尔参议员是当时的政府首脑；当时的法国，因为缺少在政治上的稳定性而陷入了金融困境之中。对此，全世界都在抱怨。可是却无人尝试着去消除。

拉尼尔议员是在50年代初执政的，与他的前任做法不同，他出生于一个大工商企业家族。他掌管着好几个大的家族企业，这些企业原本是经营稳定而成功的。

或许出于民族利益，同时考虑整顿一下自己的公司，他甚至希望法郎贬值，尽管此时已出现有关法郎波动的小道消息，他仍然坚持己见，局势发展无论如何决不需要采取类似的紧急措施。不管怎样只愿相信好的信息的人们，比如说我的那位朋友，坚定地相信政府的贬值计划。纯粹为了对付法郎投机商们，政府首脑想让法郎贬值。他突发奇想，把本家族所经营的所有产品组织在一起，组建了一个联合会。这些公司大批量地向墨西哥出口，那些墨西哥的进口商也都是国有的，用指定的当时走势很稳的外汇付款。拉尼尔家族当然需要把法国纸币银行开的汇票办成贴现。他们在那家银行有墨西哥比索存款也有法郎债务。这位总理的兴趣和从他的家族利益出发希望法郎贬值的愿望是不言而喻的，他操纵的这一笔生意也的确金额巨大。“法郎债务”加上“比索存款”的确是拯救尚处于低谷的法郎的外汇投机的好时机。

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一座漂亮的建筑倒塌了，另一个障碍物又显露出来。暗礁一个接一个。因为业内专家和财政部长爱德佳。法

耳的反对，法郎没有立刻贬值。

几年后爱德佳·法耳对我说，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会有什么后果。他当然不需要墨西哥比索，他只是意识到拉尼尔家族对法郎贬值的反映之强烈。

接下来发生的更具有戏剧性。没有事先通知，没有一点预先警告，就在1952年复活节前夕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结算贬值35%。对于总理和他的家族来说，就意味着他们的墨西哥比索存款一夜之间就损失了35%，而法郎债务遗憾的是却纹丝不动。这个旋风般的大洞顷刻间把整个家族的储备席卷一空。一位政府官员，其生意左右着某些国家的货币，这倒真的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了。我暗自思量，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如果当时意识到了拉尼尔的危机，会听之任之吗？会盲目追进吗？即使我向他建议了，观点也许是错的，岂不事与愿违。不过现在我是不会再上他的当了。

问题十一：您是否认为，在几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搞内部控制真的有效呢？

答：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人们只知道公开化了的一面。其次，这也是个概念问题，什么样的消息叫“内部消息”？什么样的不叫？界限不明。前段时间，德国有一个关于弗朗克·石戴恩库勒的内部丑闻。当人们揭发了他那笔金融买卖时，可惜德国还没有立法，内部交易是不会受到惩罚的。现在已经有了这条法律，但是否已生效我还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掌握官方未公布的内部统计。工业企业促进会金属部的主席弗朗克·石戴恩库勒掌握的信息的确比所谓的内部消息还要多，他钻着了空子。这是一个商业秘密。

我待人是远近的。我觉得，若是一个无所谓的、一般的股票投资人偶然或通过他人得到了一个内部消息，甚至盗用了某个商业机密，则是另一回事。弗朗克·石戴恩库勒作为职工代表，是戴姆勒—奔驰监事会成员，他获悉了这个消息，同时马上制定调整措施，规定持梅赛德斯（MERCEDES）股票的股东可以以一比一的比率与戴姆勒的有价证券兑换，从而他们每一股梅赛德斯股票可获利近80马克。

这位工业企业促进会金属部的主席弗朗克·石戴恩库勒先生，作为职工代表，代表企业主向在那几个新参加工作的已罢工一周的员工们允诺，每年年薪将多几百马克，可是他自己却因此在交易所偷偷贪了7万马克。就我个人观点，用“不道德”都不足以形容这一行径之恶劣。这就是犯罪。这个行为若发生在法国、英国，尤其是美国，不仅仅是下台的事，是要坐牢的，等待弗朗克·石戴恩库勒先生的会是牢狱生涯。这也是一个内部新闻，人们必须区分所谓的各式各样的“内部信息”。

如果某人也像石戴恩库勒那样，利用工作之便，私自炮制一些短期见效的新闻，愚弄他人，自己囊中得利的话，这就是欺骗。同样，还有一个内部错误，一位黄金矿业协会的部长，掌握着一笔金额巨大的基金，利用公款，买了几笔股票，后来新闻界披露了此事。但是偶然从那些要人那里得来些信息，我认为应区别对待，这不属于不道德行为。我得到的信息，听起来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但当我凭借这些信息操纵股票交易时，我总是会被狠狠地教训一下——一记响亮的耳光。

问题十二：您父母打过您吗？

答：不经常。我父母的教育原则不是特别严厉，不过那时人们相应的比今天更重视教导孩子勤奋耐劳，也更重视教导的方式。要说我的父母亲谁更严厉的话，那还是我的父亲。我还记得我一次挨打的经历：当时我们要去外面野餐，我对保姆说：“水。”我没有说“请”字。我的父亲打了我一记耳光。第二次，我也还记得很清楚，不是在家，而是在股票交易所。

那是我刚开始我的巴黎进修之时。我刚开始从事有价证券的工作，布达佩斯的一位股东发来一封电报委托，买入俾席鞍差100股，我的上司在没有得到该项委托下的正式指令时，就替他买入了。我没有阻止，因为我刚出道，而且，上司和这个股东埃梅里希·格鲁斯相识。这个股开始下跌，期望的利润泡了汤，继续暴跌，成本蚀空，几千法郎，相当于今天的一万马克，没有了。我的上司离开了这个职位，我承担了经济损失，自掏腰包添上了这个窟窿。

半年后我利用假期回了布达佩斯。我自然是直奔股票交易所，希望能在那里碰到埃梅里希·格鲁斯。我设计好了见面时的场景，甚至准备好揍他一顿。我爸爸，他不炒股票，却常常光顾股票交易所，正好碰到我，他知道我和埃梅里希·格鲁斯之间的过节。他注意到我的反常，不由分说，给了我一记耳光，吼到：“快，回家去！”一份布达佩斯的报纸甚至报道了此事。我父亲就打过我这么几次，以后再也没有过，接下来是股票交易所一点点教我长大。

问题十三：我还想再回过头来说一说布达佩斯，您不仅出生，而且成长在君主立宪制国家，还在那里上了学。您印象中刚开始的几年是怎么样的？

答：我在布达佩斯的儿童时代总的说来是很快乐的。我没患过什么大病，父母的收入足以为我提供很好的受教育条件。我在一家很好的天主教中学毕业，学校里当然也有一些家境贫穷常受富家子弟嘲笑的同学。后来，1948年，二战结束后，在我们的第一次同学见面会上，我了解到那些曾受人讥笑的同学大部分都已事业有成，作了官。正如持“机会均等”政见者所坚持的那样，这些同学虽然出身贫穷，却不甘落后，自力更生，终于成为举足轻重之人。

还有些让人难忘的事情是，1919年，我和我的父母举家迁到维也纳。维也纳的外汇黑市因大批移民的涌入而繁荣起来。我自由自在，到处闲逛，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外汇交易。我很快找到了其中的奥妙，对此着了迷，并迅速地开始了我的股票交易生涯，那时我才13岁。维也纳是当时中欧的货币中转流通地。有波兰的新货币马克，捷克的克朗，南斯拉夫等国的第纳尔等。我把一种货币换成另一种货币，再把第二种换成第三种、第四种……乐此不疲，到最后我能挣到10%的利润。从13岁开始我成了一个买卖外汇的小生意人。我在外汇市场上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积极入市，有时消极遁市。

我因此敢断言，我对“外汇”的理解要比中央银行理事会成员对它的理解深刻得多，因为我在金融市场上两度成为百万富翁，又两次破产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

1919底，全家重返布达佩斯，在返回布达佩斯的路上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这是我的第一次长途汽车旅行。日夜兼程，小轿车跑了两天两夜，我们终于又回来了。我又去了学校。我第一次股票交易的经验令我受益匪浅。

问题十四：您对1914年战争开始爆发也有印象啦？

答：是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1914年7月28日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一切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我生病躺在床上。我母亲在给我读《愤怒的小女孩》的故事。她突然停下朗读，跳了起来，因为“播”新闻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的收音机的前身。从早7点至午夜有一个频道，就像今天的广播电台一样，定时播送新闻、议会消息、报纸信息、音乐会、歌剧等等。只是通过电线传递声音，没有麦克风，只能用耳机听。这个“播”新闻的电话有个很大的优点，不管世界哪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事，它都可以大声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人们。只是，在这个星期日的下午，播音非常地吵闹而激烈。我母亲一步跨过去，抓起耳机，塞进耳朵：“噢，我的天啊！圣母玛丽亚！王储和王妃被杀了！”

历史上的这一刻如电影录音一般清晰的记忆，深刻地印在了一个孩子的脑海里。

接下来，假期的时候我们去了马林浴场，这是个理想的疗养浴场，坐落在捷克的波希米亚峡谷，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1914年7月28日谋杀的枪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加速了世界史的进程，从而也促进了世界的货币流通和外汇交易市场，在很多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这一新兴金融产业。

那是在君主立宪制的后期，人们轻松愉快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没有感到大难就要来临。人们在若有若无的军乐声中，在疗养胜地的林荫道上，边走边谈论着来自维也纳、柏林、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消息。

几天后，紧张局势开始了——历史学家们常提到这一时刻的紧张气氛。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其他因素的推波助澜，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消息一传来，疗养院关了门，所有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国家此时此刻都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

但总的说来形势对于我们家和所有匈牙利人还没有糟糕到极点。因为匈牙利的农业是自给自足，储备很足，不会闹饥荒。当然，家庭成员中所有的成年男子都上前线参了军。我父亲没有去，因为他年龄太大了。但我的两个叔叔都去了，官衔还不低。就在战争爆发前几天，为保险起见，我父亲让我的两个哥哥回到了布达佩斯，他们是必须上前线的，因为我父亲是政府议员，也恰恰是通过他做议员的关系，他们只短短地在不危险的岗位上呆了一段时间。在我的家庭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的两个哥哥，像当时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地要上前线。要是我父亲顺从了两个孩子的意愿，那他也就太聪明了。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我的一个表兄。他是列姆贝格市伽利森站的一名军官。这个城市当时是一个犹太人的城市。他向我们讲述列姆贝格市的犹太人光辉灿烂的历史。比如说，城市里有犹太人剧场，上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带有犹太人头衔的喜剧，令人捧腹大笑。

问题十五：您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匈牙利的反应吗？

答：那可是一种荡人心魄的感觉。嘈杂的人群涌上街头，欢呼着、大叫着：“战争爆发了！”

“塞尔维亚人见鬼去吧！”

“法兰士·约瑟夫皇帝是第一个，威廉是第二个！”

“维克托·埃玛努埃拉就会是第三个！”

“阿希姆德会是第四个！”法兰士·约瑟夫和威廉是所谓的三国同盟的首领，维克托·埃玛努埃拉为了把立场转向对方，即使在最后一刻也对那

两个人很冷淡。

激动人心的欢呼持续了几天。几个月后政府制定了几项措施，敦促爱国的公民们拿出爱国之心，以报效祖国。倡导“以金换铁”活动。，就是帮助国家增加黄金贮备，已婚男女公民们甚至上缴了结婚戒指，换得一个刻有“爱国者”字样的铁制戒指。

（记者插言：全民动员，捐献物资，支持国家建设的现象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就有了。）

是吗？那时就有了吗？我也学过一些，但这个我还不知道。我问我大哥，他刚从伦敦学完国民经济学回来：“为什么人们应该把自己的金制物品交上去？”

他兴致勃勃地给我做了一个报告，告诉我，政府有了金子，就可以用金子换外汇，换美元。“美元有什么用呢？”我又问。“美元是美国的流通货币，可以买作战时特别有用的原材料、武器等等，假如别无他法，万不得已，就移居中立而且安全的美国。”这是我得到的关于“美元”这个概念的第一个印象。全世界在不停地谈论着美元的行情变化，美元的每一次涨跌都对我，以及成千上万的玩家、投机商和外汇交易商们的或成功或失败的淘金冒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美元起什么作用呢？”70年前我就知道了这个问题。美元的作用有时大，有时小，但它一直是贯穿世界经济史的一根红线。

（记者插言：您每天都在回答着“美元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

我甚至写了一本书，就叫“美元起了什么作用”。

问题十六：您的答案始终是来自于您对美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信任，美元根本不会下跌的，美元属于地球上的被证实了的东西。

答：是的。当我生活在美国的时候，我对美元很有信心。直到珍珠港事件、直到胜利之日，我一直住在美国。在那里我感受到了美国人的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清楚地记得二次大战爆发时，那些同盟国的情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萨拉热窝的谋杀事件一样清楚，不同的是，这次我是从半导体里亲耳听到的。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做了一个演讲，其间他正式宣布美国与日本开战。

同样令人惊奇的，正如美国在珍珠港受到突然袭击一样，美国人也以闪电般的速度整理好自己的国家和经济。成立了很多的委员会，各委员会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颁布了一个又一个的法令。工业企业也为战势做了充分准备。从储备基金中出资生产的物品停止生产。因为战争，一些供私人使用的产品比如自来水笔、袖珍收音机和打字机不再允许生产。全新的工业广告鼓励人们节约消费。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通用公司（GM）的广告，广告是NBC集团自做的。每个星期日下午，上百万的美国人坐在收音机旁，为的是倾听这个广告：“通用公司（GM）来了，为越来越多的人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不过，现在我们的企业为战场服务，我们号召美国人为了战争节约吧。”企业就是这样以他们的广告鼓励大众，不要购买某些产品。有一点需要作些解释，在紧急关头，美国政府和工业企业联合起来，成为使美国强大起来的一部分力量。这种联合一直保持下来。比如，一个小规模的银行遇到资金困难，马上相应的委员会敦促其他大银行（如J.P.摩根公司，或大通一曼哈顿银行）援助，陷入困境的银行就能渡过难关。这个题目就说到这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制定了一些令欧洲人自己发笑的、轻松的措施，是纺织工业行业相关的委员会制定的。男式双排扣不允许再配马甲穿，单排扣西装已过时。男式西裤裤脚的卷边取消。还有，男式西裤的式样还有很多限制。裤腰不能带褶皱，必须全部展平。我当时很幸运，我有一个心灵手巧的裁缝，他把我的裤腰上的褶子熨平，外人看不出来。战后我还能穿这些裤子。

二战时，纽约有很多欧洲人，我们这些欧洲人坐在咖啡馆里谈论这些全新的规定，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感到欢欣鼓舞还是哀伤无奈。制定这些措施的意义我们还不甚明了。放弃裤腰一圈的褶子也会破坏希特勒的防御力量？那个时候，我们都目光短浅，现在我是很注意这方面的事情了，就像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那样。一年后，美国的工业每天都制造出大量的飞机、战舰和装甲车，还研制我们今天才知道的原子弹。

问题十七：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未开展过一次真正的全面战备防御，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工作。纳粹们一直想全面但实际上也没有彻底组织这场战争。现在，回到您的青年时代，当您从布达佩斯去了巴黎时，您已经在学校和跟您的家庭教师学了德语吗？

答：是的。那时我的德语已经说得很好。

问题十八：您也已经能说法语和英语吗？

答：这两种语言我也和索菲小姐学过。我启程去法国之前学了几小时的法语。我的英语没问题，我移民美国时已能说纯正的英语。过去我成天听电台，这对我帮助很大。

问题十九：您是怎么到了巴黎？那是在哪一年？

答：那是1924年。我从巴塞尔坐火车到了巴黎。好奇，也有些害怕。我的家庭教师索菲·露丝小姐大骂法国人：“蠢猪！”“无赖！”

她的行径对我不是没有影响。我当时还是个小孩。我高中毕业后作过一次旅行，从波兰的什切青横穿德国，到德国的塞京根。一路上，我体会到了流行于德国的“反法情结”。在所有的博物馆的入口处，比如在著名的慕尼黑的绘画展览馆和科技馆门前，立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禁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入内。但火车行驶到巴塞尔边境时，法国

海关的工作人员进了车厢，我想，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会把我吃了吗？我看到他们也是正常人，他们和我一样，有鼻子、眼睛、嘴巴，还很和善。我心里轻松了。我从巴黎下了车，在法国我说不出有什么不舒服的。我倒是感受到了一股反德的气氛，就像我在德国感到的反法情绪一样。而且，法国人用法语发不出“deutsch（德国人）”这个词，只能模糊地说成相似的：“les boches”。有一次我在咖啡馆里跟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民在一起聊天。我们讲的是德语。一个法国人突然冲向我们的桌子，愤怒地大叫：“滚！这里不准讲‘boche’（德国人）！”

那时的气氛就是这样的。当现在在我周围有人谈论结了仇的两个人化解仇恨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德法之恨”。今天又怎么样呢？巴黎市区内有一个美丽安静的广场，叫康拉德·阿登纳广场，离我的住宿处不远。400年里一直有一种排外情绪，前几年也变得友善了。我看到写着阿登纳和戴高乐字样的跑车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行驶。只是那时有过这种仇恨之心的人现在在揣测，现在德国与法国之间的联盟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

我举了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对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化解抱乐观态度。正如以色列首相大卫·本·古里昂所说：“不相信创伤的人，是不现实的人。”

问题二十：那是欧洲极度通货膨胀之时，对您却影响不大，是吗？

答：很大。通货膨胀伤害了每一个人。在我高中毕业后做的那次德国旅行中我就深刻地感受到了。这可以从商品价格中看出来。一条裤子，早晨卖一万马克，晚上就卖5万马克了。我父亲很有预见性，给了我一张面额500的美元。严肃地警告我，一天只能兑换一美元。真不知道，美元第二天会升到什么价格。一星期的利息就是20%。那时的一个金融笑话是：出门不坐电车，只坐出租车。因为电车是一上车就交钱，出租车是下车才交钱。这就是当时令人难过的情况。我不知道，为了不停地印制出新钞票，每天有几百台印钞机在工作。

问题二十一：德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德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自打那以后，德国人患上了永久性的与德国政治休戚与共的通货膨胀恐惧症。他们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受到这种恐惧的伤害，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科斯托拉尼先生，他们经常在一些文字章节中提到“通货膨胀恐惧感”，而且他们非常重视马克的稳定性，并把对此稳定性的把握能力视为评判德国银行的基由，是拥戴还是攻击。您如何看待通货膨胀并不是最大的苦难的说法？

答：按我当时的亲身感受，那种苦难是很沉重的。德国人从两次大的通货膨胀带给人们的苦难中得到的启示是赞成限制货币政策，人们似乎忘记了，通货膨胀发生于两次战败的世界大战之后，物资被损坏了，被消耗殆尽了，可是，钱还照样有。70年代的通货膨胀是通过外部压力得以控制的，当然是两次石油价格休克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只因为锁住货币政策而导致的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如您所知，几年来我严厉批评过联邦银行过死限制外汇的做法。成百上千的失业者对前任纸币银行行长赫耳穆特·施莱辛格是心怀感念的。当他退休的时候，我引用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话：“他走了，那个自吹自擂的糟糕的家伙。”遗憾的是，当今的那位联邦银行行长和他的上司奥特马一起沿袭原来的做法，采取了同样错误的政策。赫耳穆特·科尔和特奥·威格尔也只是奥特马先生的政见的顺从者。如果什么时候，通货膨胀率是零，他们可能会说：“手术成功了，不过病人死了。”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柔性通货膨胀。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在负债累累，人们也常问我这个问题：“债务会带来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有。”债务会通过缓慢的通货膨胀而被悄悄地抵消。

（记者插言：换句话说，这些债务会由那些并未借款的人来还。）

那是肯定的。不过，借了债的那些人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东西。后人继承了所有的进步、所有的技术、所有的基础设施以及所有的科学成

果，而且，这些也能抵消通货膨胀率的几个百分点。另外，低的通货膨胀率还能刺激经济发展。就像每天一杯葡萄酒，2~3支香烟会给人提提神。只是不能因此成为烟民或酒鬼。我的医生甚至建议我，每天喝两玻璃杯葡萄酒。

“零通货膨胀率”的说法是无稽之谈，直到人们从这个“经济稳定的神话”中脱离出来，德国的第二次经济腾飞才会出现。

过去法国也是如此。货币不是自由流通，而是和黄金价格捆绑在一起。任何一个纸币银行有多少货币，就必须拥有多少黄金抵押。如果他们积累了黄金储备，只能增加货币数量。错误地令黄金价格不断升高，导致了货币体制加盟国之间永久性地为了争夺黄金储备而进行的斗争。费尔斯特·俾斯麦在说到货币的黄金储备时讲到他对“黄金标准体系”的看法——“黄金标准”对于“货币拥有量”和“黄金储备”来说，是一个盖子罩了两样东西，谁都要把这个盖子拉向自己。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也许正因为俾斯麦不是经济学家。

法国人这个时候成了拜金者。他们不投资经济，只是大量地买黄金，只是黄金、黄金。投资者们也像他们的政府一样，把储备基金投入到拿破仑硬币和金条中去。之后，“黄金标准体系”（Goldstandardsystem）终于被取消了。经济发展流畅了。黄金变成了一个无所谓的东西。人们再次投资证券，投资经济。从此，法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够自我表现和发展了，法国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底层大众也都非常聪明。

法国人扭转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落后，加入明显的领先行列。建的TGV比10年前铁路线上跑的ICE还要多，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出售。

如果您以前在巴黎申请一个电话，要等半年。带电话的住房价格会翻一倍。要是今天的话，电话当天就能安好，而在德国的慕尼黑还要等14天。所有这些只有取消了“黄金标准体系”才能得以发展。

问题二十二：我们对黄金从没有这种依赖性。您估计我们落后于法国，原因何在呢？

答：在于德国联邦银行执行的货币政策是通货紧缩，是“黄金标准体系”迫使一个国家不得已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比如说货币疲软，银行就必须提高利率，用黄金储备购买这种货币。

当然，一个银行，未受“黄金标准”或者一种其他的货币体系所迫，也可以采取或者实行一种通货紧缩政策。联邦银行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认为因为进口价格下降，马克依然坚挺，这样做很好；对于一个最终以出口为主的国家，比如说德国，这样当然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当人们通过便宜的进口获得利益的时候，他们在出口上失去的就会更多。

问题二十三：现在我们谈一谈您年轻的时候在巴黎，是不是很快就进了亚历山大先生的公司了？

答：不是，没有马上进去。我手头有几封房地产公司的推荐信。我8月份就来了，想在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工作以前，在巴黎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好好地领略一下她的美丽！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到这里的第一天，我的法语当然还不那么纯正；我在火车站一下车，扑面而来的法语让我晕头转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因为法国人说话太快了。我的表兄爱提那·巴罗斯那时候已经在巴黎住了两年了，他现在还健在，已经95岁了，住在马尔贝拉，整天下国际象棋。他答应我父亲我到巴黎以后他会照顾我，他简短地给我解释了一下我应该到那儿去找旅馆，那是一个临时的住处。在路上，在电车里我偶然认识了一位匈牙利的画家，那也是他到巴黎的第一天，也像我一样正在找旅馆；因为带的钱很少，他就必须得找一个便宜的旅馆。我爸爸给了我很多钱，我住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这个旅馆叫布莱兹利，在茹高夫大街上，现在还有。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带阁楼窗户的房间，藤蔓爬上了我的窗户，窗前有一块黑板，是给顾客们看的，上面写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住在这儿！后来我从老板娘那儿了解到，除此之外，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匈牙利作家奥兰多·阿格亚提斯也已经在这里住了多年了，不过他用的是一个西班牙名字，所以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还有更让人心情舒畅的事，我的房间每个月的房钱是200法郎，当时约合50美元——我必须得说明一下，那时候的一美元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30美元；当然到底是多少我没有兴趣搞得太清楚。

一个从事简单劳动的普通职工，每月的基本工资差不多是1000法郎；而我每个月从我父亲那里得到的钱和这个数是差不多的，我的二哥贝拉每个月还要给我500法郎。我上午熟悉了一下新的工作以后，中午就去离我工作的地方几步远的优利亚那进餐。饭很便宜，只需要3.5法郎，面包和红酒不限。8月30号，当我在阳台上坐下来准备进餐的时候，我看见一位极其优雅、个子不高、长相英俊的先生向我走了过来；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冲着我问道：“你是拉约斯的儿子吗？”（拉约斯图尔特是我父亲的名字）这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他已经在巴黎住了一些时候了。

我长得特别像我爸爸，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所以他认出了我；现在我要是照镜子的话，我还能看见我父亲的影子。我父亲的这位老朋友查尔斯·斯泽伯和我一见如故，直到他去世前我们一直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吃完饭以后，我就坐地铁去了巴黎市中心。我在歌剧院下车，因为后面有世界著名的拉法耶特商场，正赶上夏季大甩卖，临街的桌子上摆得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吸引着所有来自布达佩斯的囊中羞涩的人们。那时巴黎还在沉睡之中，因为著名的、今天称之为佛豪合的大街是巴黎最高贵的大街，直到今天也没有小商小贩和小咖啡厅，而只有大量的居民住宅，家家都挂着百叶窗。这时正是节日期间，住在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外出旅游了。不久，这里成了世界上最漂亮的街道，后来，我也搬进这条大街，周末我常在这里散步。当我晚上回到宾馆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生活的一个崭新阶段开始了。我当时18岁，我要了结巴黎，了结这个世界。

第二天开始，一周时间里，我游逛了整个巴黎。在这里的生活与在布达佩斯的生活截然不同。巴黎，意味着一个奢华、殷实、欢庆的世界，我愿意了解这个世界。巴黎的电影演员也让人神魂颠倒。

优雅的女士们骄傲地走在长长的赛马队伍的前面，向人们展示她们由波莱特为他们设计的漂亮服装。在塞纳河上，波莱特的游艇上，这位著名的裁剪大师招待那些来自大公司的朋友们。直至黎明时分，伴着源于新奥尔良的优美的音乐，他们依旧玩兴不减。那时的香榭丽舍大街上还没有电影院，人们排着队等着看美国的查理。卓别林和道格拉

斯·费尔班克斯的电影《淘金记》，还有东方的《巴格达的贼》。那时的香榭丽舍大街优雅富贵，只有高级时装店、车行，仅两家咖啡馆，一家叫佛奎特，另一家小的是在巴黎的美国知识分子们秘密集会的的地方，现在我还常去那里。

在当时的小说里，这些高智商的人们使用大家熟悉的语言与人交流，今天混在皮伽勒的酒吧的人群里，第二天又在马克西姆大餐厅和世界头号明星、令人难忘的莫里丝·薛瓦利埃聚会，一块欣赏瓦伦丁最新的作品章节。或者，人们坐在咖啡馆里谈论最新的汽车款式，与当时身材优美的著名歌星米丝汀凯特促膝而谈。

作为旁观者，我逡巡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我没有时间感受孤独，因为全世界到处都有匈牙利人，我很快就交上了朋友。我到巴黎的第一天就去了德米咖啡馆和罗温德咖啡馆。在那里我遇上了一帮俄罗斯人。通过其中的一人，我认识了那个拉斯朴汀的谋杀者——那位尤素普王子。

除此之外我还经常拜访那些来自布达佩斯的我父亲的老朋友。那时的巴黎和现在的巴黎一样，看重人际关系。和我往来频繁的一位朋友是萨弥·保罗斯，我父亲的一位挚交，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萨弥长得不十分英俊，甚至看到他都会让我想起钟楼怪人卡西摩多。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事业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刚17岁，就作为秘密特使被匈牙利政府派往巴黎。那时匈牙利只是通过君主共和制的大使来代表，只有一个秘密特使，那就是提到的萨弥·保罗斯。战后，他是匈牙利贵族最受人信赖的人，这些贵族们想把哈布斯堡前任国王卡尔再次拥上王位。萨弥好像是匈牙利和大西洋的马得拉群岛之间的秘密信使，被废黜的哈布斯堡前任国王卡尔想在那里东山再起。在例行公事的旅行途中，他顺便拜访了我。那是令人激动的几个夜晚，因为他可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他拥有的信息特别多。当我们谈到一些著名的大美人时，这个小矮子向我吹嘘说：“她是我的情人。”他说的几个故事也是确有其事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是法国荣誉军团的贵族骑士，要不是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和法国的名人阶层有如此真正紧密的联系。

我开始渐渐地喜欢上了蒙特巴纳西恩酒吧。我每个晚上都在这里消磨时光。然后就去多摩咖啡馆，然后就是约克俱乐部。那个约克俱乐部是个夜总会，有一位矮个子的黑人钢琴手，一个低音提琴手，一个吉他手，他们来自古巴。著名的女歌手吉吉在这里唱歌，她的歌不是缠绵悱恻的那种，而是很令人振奋的。她长得不怎么标志，但她是蒙特巴纳西恩酒吧最受欢迎的。后来，我几乎每晚都在约克俱乐部。我若不在那里，我就是去了约瑟夫甜点房。这是当地人开的一间店，晚些时候可以和这儿的几位客人跳跳舞。我像我姐姐一样非常喜欢跳舞，我姐姐丽丽和我二哥贝拉是布达佩斯有名的一对舞伴。

在布达佩斯时，我没和哪位女士有过亲密关系。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们，而是说，没感觉。在向世界开放的巴黎，我很快就失去了我的童贞。我认识了一位护士。她比我年龄大，不像我那样毫无经验。我们只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当我们已经多年不见，我再次接到她的信时，我还是怦然心动。我渴望着再次见到她。通过关系我找到了她曾工作过的那家医院。那儿的人问我，我是不是她家亲戚，我说：“不，只是一个老熟人。”住院处负责招待的一位女士告诉我：“很遗憾，朱丽叶·莱丝卡摩尔——她的名字——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是我的初恋的故事。随后，又有几次，但我都记不起什么了。不是因为太多了，而是因为毕竟是70年前的事了。只有安东尼娅。我还记得她。她后来移居匈牙利，其中的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移民布达佩斯后不知什么时候她进了一家夜总会。她邀请一位男士跳舞，当这对舞伴跳舞时，她问她的舞伴：“您在巴黎有一个弟弟吗？您看起来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人。”

“他叫安德烈。”她的舞伴说。第二天我哥哥问我，是否认识安东尼娅。世界如此之小。常有人谈到我和我哥哥贝拉长得像。因为我俩的确长得像。不同之处就是他长得更英俊健壮，而我个子不高，默默无闻，不引人注目。

到巴黎两个月后，我拜见了亚历山大先生。我在巴黎的一切成功都多亏了他。他指点我，告诉我，我该做什么。他说：“你要了解所有股票

方面的知识。”亚历山大先生是做食糖交易的大户。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交易商，我从未看到过他在食糖生意中让自己处于劣势，承担风险。他的生意只有手续费是支出的。我起初的工作内容像其他新手一样。我着迷于这种工作，常常是过了午饭时间，我还坐在办公室里，手不释卷，读金融交易的书籍。我有时能看到亚历山大先生是如何操作的。如果有人亲自来办公室，看了办公地点，看了5个职员的操作，他还不太会对一个公司有多么深刻或者良好的印象。但是这也足以使亚历山大成为巴黎股票市场上的唯一头号经纪人。亚历山大是两家银行的大股东，一家是法国证券银行，（50%的股份归国有），另一家是环大西洋银行。他当时的财产是400~500万美元，也就是现在的1000多万美元。

我的收入符合我的工作付出。我每月得200法郎，刚够付了我的房租。依我的经验，可以是一个四层的房子。首先，我学会了如何招揽客户。亚历山大和他的兄弟有智有谋，是出了名的热销商。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即使是下班后还给过我很多必要的建议。刚开始我有一个不聪明的不良习惯。当我和他人打招呼说话的时候，我总爱把两个脚后跟磕来碰去。一个在匈牙利呆过的很友善的客人，一个书商，注意到我的小动作，友善地告诉我，在法国没有人愿意看到别人这个样子：“这里的人们不这样做，只有德国佬们爱这样——肮脏的德国人。”就像我说过的，不仅是德国人鄙视法国人，法国人也同样鄙视德国人。

很快地，因为我来到了巴黎而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不仅仅是事业上的，还有个人生活方面的。我在巴黎这种“飞扬跋扈”的生活很快受挫，因为我不能真正参与到生活中去，关键问题是：钱。我的收入加上从我父亲和哥哥那得来的钱足够我的基本生活，但过多的奢侈消费，就使我入不敷出了。我就像一个馋嘴的孩子，把鼻子贴在点心房外的大玻璃窗上。望着里面琳琅满目的东西，却什么也买不起，这让我想起奥地利一个古老的谚语：“有钱人，吃丘鹑（奥地利很好吃的一种禽类烤制品）；没钱人，让鸟飞。”我知道，要想快点挣钱，只有一个办法：跻身于股票商的行列。否则，我不会总是说：钱多的人，能做股票；钱少的人，不可以做股票；没钱的人，必须做股票。依我的

财力，属于最后一拨人。我第一笔买的是一个铁业公司劳利姆的股票。我的钱刚够买两支股。然后我预买了25股莫桑比克，一家在葡萄牙殖民地的英国公司的股票。

通过工作，股票交易所给我留下了最好的印象，在这里不允许我做投机交易。我是通过一个中间人做的。结果并不怎么理想，我对钱的追求没有得到满足。

问题二十四：您是如何步入股市的？

答：1927年，我结束了在亚历山大先生身边实习的日子后，就开始了在阿蒙根证券公司的工作。我还记得我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第一天的情景。一个人和我打招呼，对我说：“年轻人，您叫什么？我在这儿没见过您。”

“我叫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在阿蒙根证券公司工作。”

“很好。”他说，“您的上司是我的好朋友，我以后会向您解释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是愚蠢的脑袋多于证券，还是证券多于愚蠢的脑袋。”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精辟的定义。

我作为独立的交易员很快在实际的股票市场开始工作了。我必须有自己的客户，把业务扩展到阿蒙根证券公司之外。我从客户的业务中获取佣金，就像今天全世界各行各业都在使用的方式一样。只是在德国有所不同。德国银行或储蓄所的股票交易员拿固定工资。其有利的一面在于，他们不必像他们的美国同事们那样必须不断地创造营业额。另一方面，为委托人提供咨询服务时也不必那么紧张，因为，反正他们从客户那儿得不到钱。德国的这套体系也在慢慢地变。一些银行下面的子公司的咨询员已经是按劳取酬了。在大银行董事会上，人们长时间地讨论这件事，“佣金”也是一部分收入。然后，德国的股东们很快也像美国人那样，去他们的经纪人那儿，问他们：“经纪人先生，我该怎么办？”答复像是被用手枪逼出来的一样：“没错，买黄金，您买呀！”客户说：“我不知道，我本想是要抛出黄金的。”

“抛售吗？”那位经纪人问道，“那，卖出去也行。”这个经纪人可爱得像个傻瓜，决不能把女儿嫁给他。

作为交易经纪人，我总在寻找一条既能让顾客获利，我也能得到足够回扣的折中的办法。我的客户们就这么成了我的固定顾客，他们为我提供新的主意。我甚至有这样的客户：他们只是我的名誉客户。他们在我这儿的交易特别少，我从他们那儿得不到回扣，但他们的名字被列在我的客户名单上，这就是个最好的双方受益的好方法。不久，我就拥有了可提取佣金的客户，他们委托给我大量的业务，我以此维持生计。我觉得对我来说股票交易并不难。最后，和招揽顾客的绝对大师亚历山大先生在一起时，我也是不可轻视的了。不久，我又换了个地方，去了费迪南德·利普曼公司。一位年轻时候的布达佩斯的朋友汉斯·卡尼兹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他到巴黎的时间稍晚些。我们一起合租一套公寓。在布达佩斯时，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在一起玩。但我们并没有上同一所学校，因为他信的是新教。我们在一次去塞莫灵的假期旅行途中结识，很快，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汉斯出生于一个很好的家庭，他父亲和他祖父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父亲是一个大银行的股东，而且还是一个很棒的钢琴家。特别是他的祖父给我的印象最深。当他打电话自报家门的时候，他不仅要说出自己的姓名——莫利兹·汉斯——还要说成水手汉斯，莫利兹。他得到允许可以在多瑙河上行船，所以，人们都叫他水手汉斯。汉斯的母亲是有名的美人，可惜，婚姻不长久。后来，她又嫁给了奥地利的一个大工业企业家。当她觉得自己应该香销玉殒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她就自杀了。汉斯的姐姐今天还住在维也纳，她还一直是我的好朋友。

我总是想起汉斯。他是个心地善良、品格高尚的小伙子，有的时候他甚至有些腼腆。在股票交易生意里，欺诈性的小动作和高额回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他却从不染指，也对此不能理解。汉斯是个很优秀的红马夹。他还教我如何操作。我们偶尔也在巴黎做几笔，不是为了业务，而是为了交更多的朋友。他是一个绝佳的交易员。他总是心神笃定，从不感情用事。也几乎从未失过手，或者因为什么精神紧张而给谁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他的桥牌打得也好。一个人的爱好很能

反映和培养一个人的性格。我的朋友莫利兹·汉斯是我见过的棋艺最高的人。他的纸牌也比我打得好，因为我越来越着迷于股票。

遗憾的是后来汉斯病得很厉害。他信仰犹太教，和我的一样，但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不得已中途更改，他改信了新教，我信了天主教——但在希特勒看来我们还是犹太人。

他没有去美国，而是仍然回到了中立的布达佩斯。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他被关了6个月的集中营。当我战后从美国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很快就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在瑞士的蒙塔纳治病。战前他就得了肺结核和肺翼肿大。在集中营被关押期间，他的健康肯定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由于我的股票交易投机赚了钱，能支付得起他在那儿一段长时间的治疗，然后，他和他漂亮的夫人一同回到了巴黎。战后我去了规模大一些的斯蒂尔公司，汉斯成了我工作的助手。从那时起，我一直资助他。让人难过的是，他不久就在尼萨病逝了；在那里，他和他的第二个妻子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我年轻时的伙伴怎么这么早就死去了呢？他是和我保持最后联系的朋友。我很悲伤，我不愿意打电话，我害怕听到说谁又不在人世了。

我和汉斯在巴黎度过的那段时光，我俩都觉得简直太美妙了。我俩可以互解思乡之苦。

还是言归正传吧。我转到那家费迪南德·利普曼公司时，汉斯已在那儿工作了。我开始业绩不错，但还没有大笔收入，因为，我必须建立我自己的客户网络。

巴黎奢华的生活总是令我有挫折感。刚开始只是看看，我就会满足。而现在就一定要深入其辛才行。当然我缺的还是钱。金钱对于我来说，似乎，突然间变得重要了，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成了获得幸福的一把钥匙。我把储蓄所里的钱都取了出来，不停地想着挣钱的事。

首先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然后就单纯地剩下了“目标”——挣钱——和对所有其他东西都预料不足的“我”。我的

理念，我的价值观彻底改变了。我不再对任何其他的东西感兴趣，只有“钱”能吸引我。我那时还是没有能力不花钱就混上女朋友。我梦想着装满了钞票的钱柜，我梦想着装满了钱的大麻袋。我反复地打量着，感觉着这些钱袋，我想能成功的。

这些渴望钱的观点自动地导致了我对知识追求的淡化。想买一部豪华汽车——当人们能买；当然从来都愿意买——的时候，才特别明白其前提条件是：口袋里有钱。有的人口袋里装了本支票，就觉得拥有了生活的全部乐趣，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拥有了。从这一方面来说，钱的价值升值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同样数量的钱，最终在所谓的现实面前又贬值了。现实，就是现实的东西，也就是说，钱能买到的一切。

巴黎的股票交易所整个被一种硕大无朋的氛围包围着。所有的人，无论是客户，还是交易员，谈论的只是他们各自的盈利。

每个人都宣称，他得到了最新的消息，吹嘘他在交易所赚了钱，他给他的顾客总是能提供最可靠的咨询，他的客户从没有赔过钱等等。人们宁愿相信，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了天才和先知先觉的预言家。所有的人都凭着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成果自吹自擂，每个人见人说的第二句话就是：“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交易所来个新人，他就会整个被这种气氛弄蒙。人们根本就不谈艺术、政治或者像其他时候朋友圈里常谈的话题——女人。谈话就是围着钱转：人能挣多少钱；人该挣多少钱；什么时候该买入；什么时候该抛出。人们只是根据一个人拥有什么，数量是多少，他的顾客或者其他交易员给了他多少利益等来评价他。幸运的是——或者说——遗憾的是，我慢慢地适应了这种氛围。

我在这方面还是有点滴经验可言的，简单而健全的理智告诉我，所有的这些只能是虚假骗人的。通过逻辑、解释、思考和论证获得的交易奇迹，对我来说，似乎是简单而幼稚的，是全盘错误的。

我对金钱所持的观点是典型的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我把这个极其违反常规的观点提高到了一个荒谬的高度，并成功地引发了全球性的对通过现金形式表达的货币的价值的贬低。通过现金形式表达的价值是指为其他所有东西制定的一个价格。因为我在内心对金钱的价值看得过高，我才觉得每一件物品的价格包括股票在内都太高。这种观点只带来一个结果：当所有的人都在股票上追涨时，我偏偏不这么做，就要买跌。我看不起股票交易所里的那些人们，也导致了我真正对金钱的蔑视。我内心坚定，卖空投机我一定会大获全胜，幸灾乐祸地得到其他人拱手奉送却又毫无察觉的赔偿。

有钱的人输了，他的价值在下跌，我看跌投机，从中盈利，他和我之间的距离在相应缩短……这就是我当时每天唯一的想法。我只有一个愿望：全力以赴，投入股票市场，因为这是快速挣钱、甚至成为百万富翁的唯一的办法。

凭感觉，我开始做有把握的短线预约交易，因为我认为，我很快可以在更便宜地把它买入。

同时我的佣金生意也越做越好。我给我的顾客也用预订的方式。

1929年10月22日在最著名的、空前的股票危机中，纽约华尔街破产了。相关联的法律开始起了作用，不太迅速，但已经有些作用。源于欧洲股票交易所的美元风暴突然升级，虽然不像纽约那样引发了经济危机，但汇率开始慢慢地下跌。我把握住了时机，我的卖空投机和我接手代理的客户们开始大有进项。客户们相互交换看法，从而我的客户群大增。

我在巴黎的股票生涯暂时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我来美国之前，我已经拥有了600多名客户，当然是多年来的总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照顾好600多位顾客。我的客户中最重要的几位是瑞士的银行家。他们经营着正规的公司，他们的客户也只是德国的贵族，他们把瑞士视为金融之地。我常去瑞士，为的是把他们拉过来。我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策略。我从不两手空空地回来，总是在口袋里装满送给巴黎股民们的建议。这个办法不仅吸引了个体股民，也引起了银行家们的兴趣。

我敢肯定，这个方法时至今日仍然是有效的。所有的股东都有同一个兴趣点：想挣钱。一个好的经纪人的艺术之处就在于能唤起他人的这一兴趣。

幸运的是，我常能如愿以偿，所以，我的佣金收入也在迅速地增长。一直这么做，有时也有些无聊，但有时同顾客打起交道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遵循的座右铭是：得到一个客户不难，难的是留住客户。

瑞士银行家们的造访总是很令人激动的。对于他们来说，和我联系的直接原因是可以来声誉盖顶的巴黎。毋庸赘言，在20年代，巴黎已作为一个大都市向全世界开放。我总是为他们做导游。这些银行家们首先是着迷于这里的夜生活。到了今天我能讲出来这件事了，因为除了我之外，其他当事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奥根布仁公司的首席全权代表，瑞士头号银行家，认识了巴黎著名的青楼。巴黎夜生活的迷人之处我只想讲3件事。

第一件事是著名的夏巴内特大街10号那家有名的妓院。这家妓院非常出名，以至于来这里游玩过的人们会向别人炫耀他们用过的一张小小的门票。因为这里的每一个接客的房间都很有特色。有一个房间，名叫蓝色列车，正是著名的从巴黎开往尼斯的列车的名字，这趟列车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开往科特达祖尔的列车平行而行。这个房间是模仿列车车厢建的，不仅有玻璃窗，而且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远处湛蓝的湖水。这间仿造的房子甚至模仿乘火车时的摇晃感，有如身临其境。另一间房子全是玻璃，所有的一切一目了然。今天这些青楼已不在，因为公开的妓院已被禁止。20年代的巴黎是多么的自由，多么的令人着迷或许由此可见一斑。当时一个来自布达佩斯的笑话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布达佩斯是欧洲的笑话加工厂，这个笑话是这么说的：格林从巴黎回了布达佩斯，他的朋友问他：“你看到什么了？”

“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格林说。“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指夜生活。”

“我看到了32种姿势。”格林说。“快讲给我听听！”

“好的，我讲给你听，不过你回家后必须模仿着试一下。”

“没问题！”格林的朋友回答说。然后格林讲了这32种姿势。几天后，他又遇到了他的那位朋友，问他：“你试了那些姿势了吗？”

“试了。”他的朋友说。“怎么样啊？”格林问他。“哎呀，弄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我常去那家妓院，不过只是作为一个清白的领路人而已。我的家庭教育不允许我那样做。

我还清楚地记得，男人们在下面叫，里面的女孩子就应答，打开门，喊着：“有客人来了！”这是在给其他姑娘们暗示，不要下楼来，以免和客人碰面。男人们都想径直去找自己的老相好。

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青楼是在玛塞特大街14号。有一个墙上带小孔的房间，人们可以从这儿看到妓女和男客的行动。奥根布仁公司的头头就总是愿意来这儿。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有意思的是，圣马丁大街26号。我只是和两个匈牙利的朋友去过那里一次。那是一个所谓的黑市展览。男人可以戴着面具，奔进熙熙攘攘的人群，只露出两只眼睛，看多人性表演。我其中的一个匈牙利朋友也认识了那里的一个女人，这很让我反感，但我必须承认，有些东西我只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现在也还有这样的事，只是不再那么公开而已，因为已被禁止。在我的住宅区里有很多约会点，本来这个住宅区是巴黎最好的。

我下定决心，在巴黎股票市场上迅速扩大营业额。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身边的两位同事的聊天，其中的一个说：“你一定要买股票。”

“为什么呢？”另一个反问道。“那个科斯托拉尼告诉我的。”一夜之间我成了精神领袖。我总是这么说，几乎任何一个股民，在他一生中，迟早会当一次投股专家，因为他总是能对一把的。一直保持正确是难得的。

随着奥斯特力克银行和戴维尔得纸币银行的破产，到了1930年秋天，巴黎股票市场跌到最低点。我的预感是准确的，卖空投机专家们都赢了。我每晚都算一算账，看看我赚了多少钱。我赚的很多，不过其中的损失与痛苦也是有的。成功鼓舞着我继续做下去。当我的客户们囤积手中的股票时，我却抛出了我的有价证券，甚至后来我把手中的短线股也抛出去了。我陶醉于我的成功——赚钱成功，预言成功。我的同事们前来拜访我，他们把我看成是对所有事情都料事如神的预言家。因为我现在找到了一种能让我愿意享受生活中的惬意的方式。汉斯·卡尼兹这个时候又回到了布达佩斯。我在蒙凯大街50号罗特切利斯宫的对面租了一间住处。后来，在同一条街上我又搬了一次家，搬到了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三居室，简直就是一个微型宫殿。我让一位女装潢家装修了这间居室。她是我一个很要好的女性朋友，著名的法国大诗人保罗·瓦莱利的大情人。当然，除了我的新住房以外，我的别的愿望还没有得到满足。

和我关系好的朋友们，同事们，所有的人，都被打垮了。他们在这次危机中既输了钱，又丢了职，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正相反，我过上了豪华的生活，那都是我过去梦寐以求的。我支付得起优雅的宾馆、饭店、穿着制服的司机开的汽车，所有的一切摆在我面前，因为我的皮夹子是鼓的。但是——这个时候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但是”——其他的我却没有，我还需要好的氛围，幸福的欢笑之后就是痛苦、厌世和郁闷。因为我还是一个人，形单影只。当然到处都能买到一些东西，但我对花钱买快乐没有一点兴趣。我觉得，当朋友们满足于喝杯咖啡的时候，更奢侈的香槟酒和鱼子酱是不会带来幸福的。我不敢表现出，根本也不可能有多快乐，我的心情比原来更消沉了。

许多巴黎股票交易所也破产了，所以，我失了业。但我的生活却丝毫不受影响。我有足够的钱用来生活。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投机商，我做卖空投机赚了大钱，在接下来的股市下跌时我也能站住脚。在股票市场上只有两种人：买空投机者和卖空投机者。一种是乐观主义者，另一种是悲观主义者，两者性格截然相反，在股票市场上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做买空，有时做卖空。买空的人像生活放荡不羁的艺术

家，在卖空者苦苦等待的时候，享受他们的痛苦。二者立场对立，互不相融。比如，有一次，著名的来自布达佩斯的一位顽固不化的卖空投机家来到了股票交易所，股民们正猛烈追涨，一位年轻的股票经纪人故意挑衅性地问他：“股票大腕先生，随着股市上升，年轻人把钱都搂走了，对此，您做何评论？”他回答说：“这个吗，他们挣的钱很快就会流到我这儿来，只有当我喝香槟酒和玩女人的时候我才可能因为顾及不到而输了钱。”

因此，我建议女人们，如果股市长时间疲软，她们应该试着做一做买空，但她们一直是卖空投机者。无疑地，和今日正相反，我那时是属于消极派。我后来钱挣得不错，因为德国的贷款问题，给卖空投机商们带来了机遇。当时德国因战后修复正处于艰难的举债度日之中，数额之大，无以计算。股市继续下跌，一直到胡佛总统做出建议，同意德国延期付款，暂且取消付款。这个消息使股市骤然止跌。所有像我一样做预定短线抛售的股民，必须不断购入上涨的股票，有价证券也随之攀升。最后，在这个所谓的“胡佛买空投机”中我蚀了老本，我就这么简单地破了产。这证实了老百姓们常说的一句话：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去了一个在股票风暴中挣扎过来的巴黎股票交易经纪人那儿，他叫玛威斯·爱斯皮纳，曾经在北京做过一年法国的大使。他的办公室与我们的相邻。我和他关系处得不错。我解释说，假如，我要是没钱了，我会给他建议，他如果同意给我提佣金，我会愿意为他工作，做他的经纪人。爱斯皮纳毫不犹豫，给了我一大笔贷款，他做得非常谨慎，没有把贷款记入我的账户，为的是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还到另外一个爱斯皮纳不知道的阿得列恩·波奎尔开的交易所求职，这是一家老字号的股票交易代理所。阿得列恩·波奎尔也同意给我一笔贷款，从日后的回扣里扣除。和顾客打交道的方法我还没有忘记。所以，很快地我还了债，赢了钱。3年后，即1936年，我的年收入又达到了15.1万法郎，约合1.2万美元，当时的货币购买力是当今的20倍，也就是说，我一年就能赚差不多25万美元。

问题二十五：就在您这几年成功的职业生涯期间，在德国，纳粹势力逐渐强大，您对其影响力做过估计吗？

答：做过。我很快就受到了希特勒的势力的影响。我概括我随后的几年里的做法是，希特勒插手哪些政治，我就在哪些方面变得消极，并开始做卖空投机。的确，股票市场并未受希特勒的影响，一路盘桓上升。我和我的同事们探讨甚至激烈地争吵起来，他们耸着肩，不解地问道：“希特勒碍着我们什么了？我们是在这里，又不是在德国，不是在法国。股市还会再升的。”

我气得不得了，说：“你们这些愚蠢的大脑，你们完全被这些愚蠢的脑袋制约住了，就像我前不久在一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电影里有个人叫布斯特·西彤，他坐在一间乡村小屋里弹钢琴，然后，来了一个可怕的妖怪，妖怪点着了房子，火苗越来越大，墙壁随后也跟着燃烧起来，布斯特·西彤一直在埋头弹琴。当他突然意识到的时候，他一下子陷入了恐慌之中，四处冲闯，夺路逃命。你们马上也会是这样的！”我提醒我的同事们。但很快我的神经绷得紧了，因为股势走向居高不下。若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我就会再一次全军覆没。我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维系生命的股票，就在我的预定期到期之前，股市又垮了。我的预言又一次被验证了。

问题二十六：当1940年反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您和您的同事，以及法国人是如何反映的？

答：我可以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那是我用法语写的，出版商们不是不愿意出版，怕的是引起法国人的反对。

多年来，我一直同一位友善而又充满智慧的叫泼瑞的记者关系很好。他的哥哥虽然是银行家，但他一直来我这里求得股票投资建议。我教他一些股票投资技巧，作为交换，他告诉我一些政治上的小秘密。作为记者，他也给电台做工，我想，他是在和那些人打交道时获得了一些信息。

战争爆发之前一周，他得到消息说，战争不会爆发，我们不必惊慌害怕，我们该买人股票。还说达拉第尔政府要被罢免，下一届总统是皮艾尔·拉瓦尔，他会和纳粹联合起来，为了但泽（DANZIG），一切的一切都会按部就班，井井有条。当时，“为了但泽而死？”被纳粹分子广为传播，成为一句人人皆知的流行语。

他说错了，战争爆发了。他几乎每天都带来有关战事的消息，此刻，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占领了什么地方，拉瓦尔政府投靠纳粹等等。因此，人们必须等一等再买，只有耐心等待，因为和平即将来临。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有几个人认为，该在最便宜的时候买进，不必冒险。因为即使战争不来，人们也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买空投机战；或者说，战争爆发了，那么，反正也无所谓了，世界末日到了，有钱还是没钱都一样，腰缠万贯，还是两手空空，人都会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我的天啊！我们怎么都食言了！很长时间以来，我自己竟然也是不能例外，一直在巴黎股市上忙忙碌碌，卖空投机。价格开始慢慢地下滑，又加剧了下滑速度，我已经在我的账上漂亮地记入一笔了。我的卖空投机当然还是做的长线定期，采用的还是老方法，甚至一个月一个月地往后延期。每个月的月初是所谓的交害c日，我把上个月中通过汇率回落获得的利润记入我的账户。在下一个交割日，即9月6日，我就会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1939年8月24日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签订条约之后，我感到战争一定会来。到9月6日一共还有14天，但这个期限对我来说却成了永恒。

我庆幸自己没有输掉理智，我理出头绪，认定了我该怎么办。战争来了，也势必会连带影响到股市破产。人们该在此之前金盆洗手，撤出股市。银行和银行家们同意政府债款延期。我也就不仅能取消我的预定交易，而且我的银行保证金也就不能被没收。我果敢决定，我必须至少要把我的保证金挽救出来。为了能取出押金，我必须停止手头正

在做的卖空生意。这个决定根本不符合我的心意，因为我预料，股市肯定还要下跌。

不过，这个考虑已无所谓了。是否再盈利，再赚钱，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断定股市和银行很快就要关门倒闭。谁能捞点什么就捞点吧！我在这里一收手，就把押金转汇到了美国。我父亲曾教导说：“有的人头脑灵活，行动呆缓；有的人讷于思，却敏于行。”当时看来我们是属于后者的。我们若是犹豫观望的话，后果也就截然不同了。

我错误地估计了股票的走势，却因祸得福。如我之预料，战争爆发了，但股市根本就没有闭市，长线生意还在做，政府没有延期贷款，也没有引进外汇管理体制。9月6日我取出了我的最后一笔卖空投机利润，转汇到了美国。这是我的幸运，因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股市又进入了令人心魂激荡的买空时段。所有的，所有做卖空投机的人，像我一样抽刀断水的人，都神奇地得到了幸运。

战争爆发了，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人有没有钱也无所谓的说法也错了。因为恰恰是在随后的几个月、几年里一些人改变了，拯救了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有了钱。有些人失踪了，死去了，因为他们一无所有。

我的那位记者朋友说的最没准，他甚至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不停地说：“达拉第尔政府要被罢免，拉瓦尔要接手政府，同希特勒和平共治。人们一定要买人股票。德国已垂兵波兰，然后向西闪电式开战，攻取荷兰，比利时肯定已是囊中之物。”几天的激动之后，我几个星期看不到我的那位朋友了，几天后，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这儿，直奔股市。他把我拉到一边，为的是不让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他讨好我地笑着说：“现在您帮我个忙，亲爱的朋友，您告诉我，我现在该以最快的速度买入什么，因为我要在这如火如荼的买空市场上赚一笔。”

我一下子激动起来，“难道是希特勒死了吗？”我问道。“不，没有，恰恰相反，纳粹的军队现已兵临城下，距巴黎30公里，两天后就攻占巴

黎，实际上战争就要结束，汇率会大幅蹿升到最高点。我该买什么呢？”

对此，我该如何回答呢？对于我来说，整个世界都完了。世界太平盛世，股票经纪人才有饭碗，但我知道了，后天纳粹军和盖世太保就要进驻巴黎。会不会有人用重重的铁榔头砸我的脑袋？我陷入了危机之中。

我的朋友还不停地追问我，他该买哪些有价值证券。是的，对他来说，一切都平安无事。希特勒为所欲为，他就是一切，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只是我的想法和我的朋友不一样。我本心想回答他，可是我也不知所措。我内心斗争激烈。我迅速撤离股票市场，拦住一辆出租车回家去了。

这时候我的那位朋友还一直在股票交易所里找我，为的是让我告诉他，他该投资哪些有价值证券，他想从希特勒的战争中发财。我不知道他最后选了哪几个股票，我只知道，他的过错，与我的相比，是令人深思的，也是有纪念意义的。他说的对，纳粹占领法国后，拉瓦尔真的当了总统。但汇率并没有上升，相反的，股市这一次真的闭市了，有价值证券长时间地处于低迷状态，卖不动，后来，自己又衍生出一个小的市场，买卖法郎，持有法郎证券的人赔了。

他的主要的过错在于，他把他的命运维系在了纳粹身上。战后，当我又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和他聊天得知，由于他的纳粹倾向，他坐了10年的监狱。

很明确，我必须离开巴黎。我给自己买了一辆非常帅气的汽车。我把10万美元藏在一条特殊的皮带里，除此之外，我还随身带了200美元和小面额的20万法郎现钞。我还记得一个俄罗斯人阿奈克都特，他给我讲过他的避难经历。他们全家突然来到一条大河前面，他们必须跨越那条河。根本没有桥梁，只有小型渡船，他们没有钱付渡船费，唯一值钱的是他母亲的钻石戒指，母亲把沉甸甸的戒指给了他，这是一颗很纯的钻戒，足有5克拉重。她当然更想拿一个一克拉重的戒指付

作渡船费，但又不能把一颗5克拉的钻戒像分现金钞票那样分割开来。我从他的经历中得到启发，我随身带了很多小面额的钞票。

打好行装后，我环顾居室四周，熟悉的生活痕迹让我顿生留恋，我暗暗地下决心，我一定要再回来。但我当时又想，我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再也见不到巴黎了，这里的人们，我的生活足迹，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们，熟悉的街道，许许多多，多么让人留恋。

那个波奎尔公司的会计也要离开巴黎，他叫麦茨格。因为他决心已定，要去维希，而且第二天股票交易所就要关门。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我正好没有司机。我有驾驶执照，因为我过去一直能雇佣得起私人司机，所以自己一直没有开过车。开始的时候我在美国乘车总是坐在后面。我们两个协调好，先去维希；他要去那里，我正好也在那里有个旧情人。她叫梅·热维斯，真名是玛丽亚·米勒；出生于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伐利，在和我在一起之前，她是查理·卓别林的情人之一，她还写了一本关于查理·卓别林的书。

行程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人们或许也是能想象得出的。整个巴黎城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逃难的人；幸运的是我带足了钱。如果我们必须加油的话，加油站的收银员就会给我们解释，汽油是按量供应的。我说：“我给你双倍的价格。”他就会说：“那我卖给你10公升。”这10公升注入了油箱以后，我就会说：“你再给我10公升，我付3倍的价格。”在这样的时候已经顾不上道义和良心了，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能继续前行。我也没有挨过饿，我的观点是，在面包和汽油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歌剧院的戏票我可以在黑市上毫不费力地搞到；我对音乐是一直有激情的。

不久以前，在布达佩斯，我得知有迈兰德。斯卡拉·沃迪斯演的《安魂曲》，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曲目之一。我搞到了两张票，那个时候的票其实已经售空；我找到一个熟悉的宾馆的看门人，我对他说：“我想要两张沃迪斯演的《安魂曲》的歌剧票。”他断然地说：“不可能了。”我补充说：“要黑市上的。”他说：“那也没有了，实在找不到了。”我说：“不管怎么样给我弄两张，我愿意出高价。”然后事情有了转机。他问我：“两张票你给多少钱？”我说：“1000。”看门人没有异议，对

于他来说这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也就是40马克。他当着我的面给人打电话：“尊敬的小姐，首先让我吻您高贵的手！我是那个看门的，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您，刚才说得有误，那两张票我没有拿到；我抱歉地请求您再给我两张票。”他放下电话转过身来说：“好了，科斯托拉尼先生，给您两张票。”

1946年，在萨尔茨堡的联欢会上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哪儿也找不到房子住，我去了慕尼黑庭院旅馆，请求能给我提供一间住房；那个看门人也是以一种正如我之所料的口气说：“不可能，我的先生，全满了。”我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满。”他说：“我实在无能为力。”我说：“请您注意，这里一间房一天多少钱？”

“好多先令！”他回答。“那好，我给您双倍的价格；正常价格以外的钱都是您的。”我说。10分钟以后我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我想要的房间，住下了。

用第一次注入的汽油，会计和我继续朝着维希前进。巴黎人说，新上任的总督维根德要下令建立一条卢瓦尔河防御线，以阻挡德国人进入法国；我们上路后不久，就来到了横跨一条小河——最好称之为小溪——的桥上。我让我的朋友留在车上，自己下了车。我简直不敢相信，牌子上写着脚下这条河就是卢瓦尔河。“这就是卢瓦尔河？”我对司机说，“如果这就是卢瓦尔河的话，我就一直开到美国去了。”当再次回到巴黎的时候，他跟我的朋友们讲起我的这句话，朋友们都大笑起来。后来，我自己也经常拿这句话开玩笑。甚至在电台里也对此有过报道，说是一群来自巴黎的难民如何如何。

因为空前的拥挤，这次旅程持续了好几天；在维希的阿尔伯特一号旅馆我下了车。可以看得出，德国人在巴黎是混不下去的。维希也很快就会被占领的，我想离开继续前进；但是我的朋友麦茨格不想再和我一起走了，因为他不是犹太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而且在维希也有了股票交易所，他有事可做了。我把车留给了他，又租了一辆带司机的车。我向旅馆门卫咨询，答复也如人所料：“弄一辆车？不可能。”这个游戏就又演出了一次，他问我能出多少钱，最后我就如愿以偿地弄到了车。当我离开这家饭店去和我韵新司机见面的时候，那个

门卫走向阿得列恩·波奎尔——他也是从巴黎开车来维希的，也住在阿尔伯特一号旅馆；我就是通过他才在这家旅馆住下的——门卫问他：“阿得列恩·波奎尔先生，科斯托拉尼先生是不是那个正在搜捕的骗子？”

“为什么？”阿得列恩·波奎尔问道。“他那么急迫地要离开这里，实在让人怀疑。”门卫说。阿得列恩·波奎尔大笑起来，然后安慰着给他解释清了。

我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就起程继续向巴利兹的方向驶去；自然了，这一段旅程也花费了好几天时间。这个地方受战争的影响还比较小，距离前线很远。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贝当元帅的演讲，他宣布同德国联合建立一条防线，德国军队不能逾越；防线后面的法国人是自由的。

（记者插言：然后，您又是如何从巴利兹去了美国的呢？）

我清楚地记得，在过去的岁月里，希特勒的许诺意味着什么，我因此不再相信所谓的和平。我断然决定，去美国。

在巴利兹，我遇到了一对友善的来自布达佩斯的夫妇。男的叫拉斯·保罗斯，是布达佩斯最大的一家报纸的总编辑；他的夫人是布达佩斯股票市场上最大的卖空投机家古斯塔夫·霍夫曼斯的女儿。因为保罗斯夫妇也打算从欧洲去美国，所以我们商定：一同从西班牙继续前行，开往美国。

那10万法郎还装在我口袋里。因为我总觉得法郎肯定要彻底贬值，所以我想尽早把它花出去。我走在巴利兹优美的街道上，恰巧路过赫尔梅斯的商店。店铺的主人就是赫尔梅斯先生。他亲自为我服务。他是从巴黎坐飞机逃到巴利兹来的。我把法郎给他，想买一些质量好的公文包和游泳时用的东西。这些东西之中的大多数今天已不存在了，这些皮包已有45年历史，锁上不用了，那个银色的男式公文包我从来没有使用过，现在，赫尔梅斯先生要出价5万法郎买回去，为的是放在一些博物馆里展览。采购完毕，我们上路接着前进；我有西班牙签证，保罗斯夫妇也有。人们要是想离开法国的话，还需要一个离境签证；

离境签证必须在巴欧耐省省长那里申请。当我先在屋子等着的时候，进来了一个又高又壮又丑的人；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他就是参议院议员巴龙·莫瑞斯·罗斯柴尔德先生，是在巴黎的上届家族同乡会主席的亲戚。他声音沙哑地说：“我要跟省长大人讲话。”办事人员问他是哪一位。“参议院议员巴龙·莫瑞斯·罗斯柴尔德先生。”他回答说。“您请坐。”那个办事员用生硬的口气说。这让我感到很震惊，参议院议员罗斯柴尔德先生尽管让人觉着不怎么和善，但是别人就这么对待一位议员也有些出格了。反排外主义已经从巴黎蔓延到了巴利兹，这里的人们将会如何对待我呢？

幸运的是我的恐惧很快就被消除了。不一会儿那个办事员就回来了，说：“尊敬的议员先生，您能否再等一分钟？省长先生很快就会见您。”这样，对于我来说事情就顺理成章了。难民罗斯柴尔德先生离开了。后来的经历就不像在这里这么顺利了，他也和我一样要去穿越西班牙到百慕大群岛着陆。一到那儿他就去了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人家打开窗口，他交上了自己的护照。领事打开他的护照的时候，发现里面夹着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这样一来，领事的答复很直接了：“巴龙先生，我不能给您签证；而且您也绝对不能再得到签证了。”罗斯柴尔德先生不知道，美国领事是不能接受贿赂的。在美国，人们能拿钱买到法官和政客的职位，但是领事却是个例外，因为他是联邦政府的雇员，不是州政府的雇员。罗斯柴尔德先生只能转而去加拿大，因为他再也得不到美国签证了。可是这未必是坏事，50年代初去世的时候，他公开的个人遗产是2.77亿镑，实际价值超过10亿马克；他儿子爱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是最大的受益者，由此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员。经过多次婚姻以后，他的财产被分割得越来越少了。我等的比罗斯柴尔德先生等得时间长，然后我得到了我的离境签证，保罗斯夫妇也得到了。我们又一同上路，开往圣塞巴斯地安。这里的生活远离战火、没有硝烟，我把剩下的钱装进护照包里，为的是在离开西班牙的时候还随身携带；这是我的原则。

在圣塞巴斯地安，我每天都出去转一转；发现有一种游戏——我觉着德国人肯定也知道这个游戏——人们可以把赌注放在各个不同的参赛队伍上，不是非得自己玩。我也顺便看了看斗牛以消磨我的时光。

一次我和在那儿结识的一个朋友一起出去，正好路过一个街头咖啡馆。和我一起出来的朋友示意我看坐在临街的咖啡馆的阳台上的一个又胖又丑的人，我问我的朋友：“那是谁？”他告诉我他叫霍拉斯·菲那利，是巴黎巴斯银行的行长。在德国，赫尔曼·约瑟夫作过这个职位。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在巴黎是权倾一时的显贵。他有权任命法国银行的新行长，甚至可以影响政府的工作。

这个巴黎巴斯银行是最大的贸易银行，不是分支机构的保险银行，而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银行，由犹太人的金融大腕们左右。除此之外，还有天主教徒支持的莱奥奈斯储蓄银行和新教教徒支持的巴黎联合银行，而菲那利的声誉是独一无二的。有人说，菲那利是法国最聪明的人。他的父母亲从维也纳的一个叔叔霍拉斯·兰岛那儿得到了一大笔财产，那位叔叔是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一位合伙人。在他们接受财产之后，菲那利夫妇去巴黎拜谒了母亲的出生地，这位母亲是个标致的美人儿，她在那儿开了一个文化沙龙。霍拉斯·菲那利是在那些文化精英们的熏陶中长大的。他本人后来也成了大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美妙绝伦的小提琴演奏家。

他开始就把巴黎巴斯银行的经营目标定位成重量级的银行，后来果真如此。1946年他去世了，身后留下1亿美元的家产和一个藏书价值200万英镑的图书馆。

后来我与之相识，还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1938年我在巴黎收到一封英文信，信是这么开的头：“亲爱的科斯托拉尼先生，我是一个美国黑人女孩。”她说她来自维也纳，我的朋友考夫曼把我的地址给了她。她想来巴黎，并请我给她提供些方便，帮一帮忙，领她转一转市里。我与她通了电话，她叫卡门·B。我们约好见一面。

按约定的时间我到她住的阿穆巴萨都宾馆接上她。她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计划是领她去巴黎最有名的克里玛利亚饭店转转。我在宾馆大堂等她，突然一位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女士从楼梯上下来，向我走来。她就是我正在等的人。她非常漂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更没有想到，她的“黑”让人感到特别惬意，黑头发，黑衣黑裤，她追求的就是这种气质，后来我明白这一点，其实，我早就该明白的。不过，当时在上层社会，黑色的确不是流行色，所以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取消了晚上的计划，因为我不能和她一起去克里玛利亚饭店，时机还不怎么成熟。我们一起去了别的地方，我领她在整个巴黎兜了一圈，我们玩得非常开心，直到她离开巴黎去了伦敦。我把她介绍给我在伦敦的哥哥，让他在那儿照顾她。我的哥哥埃梅里希也和我一样，一见到她感到特别惊喜。

打那以后我就见不到她了。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坐在我在纽约的居室里聊天，其中一个是我年轻时的朋友约利·歌林瓦尔德，他告诉我：“安德烈，我认识一位非常漂亮的黑人女孩，她是维也纳人。”我问他，她是不是叫卡门·B。我的朋友不知道我的故事，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他自顾自地讲着他的故事。这个黑姑娘是我唯一的偶然相识的老熟人。我跟她通了电话，我们约好再见一见面。我和一个白人女性朋友合住在麦迪逊大街的一间很大的房子里。我和她随后又见了几次。几个月后，她又给我打电话，当时我们也好长时间不见面了。她说：“喂！安德烈，你还好吗？我想让你见一见我的男朋友，他也是匈牙利人，巴黎的银行家，现在以难民身份居住在纽约。”

“他叫什么？”我问。她回答：“霍拉斯·菲那利。”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大银行家。

我在圣塞巴斯地安逗留了几周之后，又开始我的行程，向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进军，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住在那儿，他就是卡罗斯·索里亚博士。他和无线电发报创始人格拉夫·阿考一起工作。我在巴黎认识的德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富兰克·阿瑙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彼此都相识。这位侦探小说家有口皆碑的作品是《伪：告者的伪造者》。他在铁路上与索里亚相识，并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可靠的联系人，离开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来到了西班牙，还弄到了西班牙护照，有了留在西班牙的合法身份。我和索里亚的关系是通过我父亲建立的，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发展得很牢固，他年长我许多，我们之间的友谊就如同忘年交。是

什么把他和我联系在一起了呢？是什么使我一生中结识了这么多朋友呢？是对音乐的爱好。我俩都是瓦格纳的发烧友、崇拜者。好几个周末我都是到索里亚在马德里的别墅去作客，当时他在西门子供职。西门子为了招他进公司工作，专门给他开设了一个新职位。后来，他和他的儿子们一样去了美国，在美国我们又常常联系。

在我离开马德里时索里亚帮了我很大忙。他开车带我去威高市。我从那儿乘坐大型客船去了美国。我去美国是作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我要在那里好好玩一玩，舒舒服服地休个假，我申请的是旅游签证。居留签证是不可能得到的。人们相信我，因为我是有产阶级，而且，我不是犹太难民，因为当时德国还没有攻占匈牙利。

问题二十七：德国的犹太人的境况不同吗？

答：不同，他们那时也得不到旅游签证，因为，人们觉得，给了他们旅游签证的话，他们就不回来了。很久以后匈牙利才被德军占领，在这之前，我们——一直不被看做是犹太难民。后来，我到了美国之后，我一直续签我的旅游签证。很快，我的好运来了，美国颁布了一项法律，在美持有旅游、探亲签证的匈牙利人可以申请居留份额，反正没有匈牙利人通过战争逃往美国避难，现在在美国的匈牙利人都是战前就到了美国的，所以，在美国的匈牙利人的份额就敞开了。

当时美国的难民政策对难民们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吸引力。我觉得其所依赖的基础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现在，我愿意给你们讲两件有趣的事情和三个事件，来阐述我的观点。

第一件事是关于非常有特色的美国清教徒的。一艘载满了欧洲难民的船从墨西哥开往美国，其中有一个匈牙利的犹太青年和一个德国女青年，他们尚未结婚；但是作为一对情侣，他们在一个船舱居住。男青年是宝石匠，所以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些宝石，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兜售。很快，我从他那儿买了几个放在袖口上做装饰用的纽扣。当船停在大西洋岸边的时候，墨西哥政府宣布不接受犹太难民，他们的签证作废，这艘船必须驶回德国占领区——也就是难民营。总统夫人爱利诺·罗斯福开始干预此事，她上书美国议会，要求允许船只在美国靠

岸，而且不管船上的乘客有没有签证都可以上岸。乘客踏上美国土地以后向移民局蜂拥而来，排成了长队；在人群之中也有那个匈牙利的小伙子，就是那个珠宝匠，他叫德施费。因为我听见他大声地喊：“德施费，生于匈牙利，犹太人，珠宝商，355号舱，身体健康，一切正常。”他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得到了移民许可。然后是其他的乘客申报，过了一会儿就是一位女士；我听见有人说道：“出生在德国，亚利安人，就这么多吧，：355舱。”过了一会儿，办事员说：“355舱我已经受理过了！把他叫回来，你们是在同一个舱里吗？”

“是的，”德施费回答说。“我们是一对儿，是生活伴侣。”那个办事员紧张地眨着眼说：“那好吧，不过不是在美国，我要把您的手续退回去！你们就可以在船上马上结婚，然后再来办手续。”这一对年轻人感觉清教徒式的美国的一切都是这么井井有条，所以他们再也不想回来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有良知的霍尼家的故事。他们是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人，夫妻俩和一对儿女。他们向美国移民局递交了永久居住申请，为的是得到生活在这里的合法身份。

他们必须到华盛顿的其中一家法院去面谈，说明自己留下来的理由，必须准时出席。当时的场面令霍尼家的人很激动，但法官只问了一些常规性的问题：“您如何看待美国？您为什么愿意生活在美国？”等等。父亲霍尼首先做了回答，然后是母亲，然后是女儿，一切正常，顺利，霍尼一家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按顺序轮到儿子说的时候，有意思的事出现了。“您认为美国怎么样？您为什么愿意留在美国生活？”法官问他。这位年轻人回答道：“我觉得美国最糟糕了。只是因为我爸爸来了，我才跟着来了。我根本就不想在美国生活。这里没有民主，这里有令人恐怖的法西斯主义。走吧，走吧，赶快走，越快越好，我憎恨美国。”法官们听愣了。法庭的工作人员让家庭的其他成员到外面的大厅去等候。一家人感到很生气，他们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了，他们的好运眼看就要被糟蹋了。然后，结论出来了，爸爸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妈妈和女儿也随了心愿，当然还有儿子。理由是：“憎恨美国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了成为一个美国人，允

许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想什么想什么。这个发热的头脑需要冷静一下，让他好好看一看，到底美国人是怎么思考的。”

我也和美国的公务员打过交道。那是我在美国住了好长时间之后，我对美国已经有了很多的好感。一天，我接到哇寸来自里斯本的老朋友写来的信。“我叫爱迷尔·怀斯，是维也纳的股票投机商。”他告诉我，他想到美国来，希望能有机会取得美国签证，可以的话，以后能到美国来淘金挣钱。他请求我，用我的钱想办法为他弄出一份证明来。我想，我不能置我的朋友于不顾。所以，我用我的5000美元，以他的名义在一个很有名的股票经纪人公司立了户。他在得到一份账户清单后，再照单把5000美元还给我。这样爱迷尔·怀斯就有了来美国的正当理由。6个月以后，我受到了移民局的调查。调查通知单上写着，我必须去移民局当面做些解释。于是，我随身带上了我的那些有价值证券。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去做些什么解释，我心里当然有些慌乱。一位雅利安的公务员接待了我。他沙哑而生硬地说：“科斯托拉尼先生，请坐。”然后，他开始提问：“科斯托拉尼先生，您往里斯本给怀斯先生寄了一张账户清单，5000美元，然后您再收回这5000美元，这样，您的朋友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来美国了，这是不是事实？”我吓得不得了，立刻就承认了。调查员继续追问道：“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您从中收取钱财了吗？”

“金钱？”我反问道，“没有，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愿意帮助他。”我必须努力说服这位调查员，让他觉得我也的确没有什么别的企图，事实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紧张。“您仔细听好，”调查员说，“这样的作弊行为是被禁止的，但我们调查清楚了，其中没有金钱交易，而只是出于朋友关系，相互帮忙，我只当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次就算过去了，既往不咎，但是，下不为例！”

我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这间办公室，一路想着：“这就是美国。自由与人权。”

类似的问题在我身上又发生了一次。那些英国人乘坐的船在大西洋海域被扣留，我迅速给瑞士银行写了一封信，指示他们把钱汇往布达佩斯的拉约斯·堪。这涉及我父亲，他的名字还没有改成匈牙利人的，还保留着犹太人的名字。向敌占区汇钱转账是不允许的，我又一次被提审了。有人问我是不是不知道，向敌占区汇钱是不允许的。我回答说：“我必须这样做，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您的父亲？怎么回事呢？”办事员反问我。“他其实不是这个名字。”我给他讲了我的家族宗教与名字的变迁，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明材料，办事员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又闭上眼睛，放了我一马。如果一些事情是与家族成员或亲情、友情相连却又与法律相左的话，他们往往会考虑人性上的一些因素。这很让我感动、佩服。假若，我在以上两件事情上得了一些钱的话，我也肯定会把这些钱再送出去，因为于心不忍。

除此之外，我总是呆头呆脑地做些蠢事，被叫到当局去问话。当犹太难民像上等人一样出手不凡的时候，是会引来别人的误解和不信任的，特别是在行政机关和银行里尤其如此。有一次，我在一家法国银行办美元贷款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贷款到期了，我去了曼哈顿银行，为的是还掉贷款。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什么银行回单也没收到。于是，我又去了这家银行。那位银行负责人接待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情，对我解释说，他得首先认真检查核实一下。我知道，其实，他是在赢得几分钟的时间，核对一下我所陈述的事实，以便于做出决定。身在法国，身份的问题让我感到心情特别紧张，我马上向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从这宗生意里我了解到了很多情况，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不如在美国顺利。大的误会解除了，办理手续却一拖再拖。我就没想到，银行的人是在有意拖延，致使贷款迟延了几日才被还，我凭空多付了几天的利息。我还发现，机关办事人员还对我的另一件事感兴趣。我的一位巴黎的大客户，叫阿闽·维莱，一个斯洛伐克人，来自维也纳。一天，我俩产生了意见分歧。我是有道理的，而阿闽·维莱不愿意接受我的想法。后来，在我已生活在纽约的时候，他给了我点颜色看。他当着警察的面断言说我是一个危险的纳粹分子，为墨索里尼干活，写了一本反对苏伊士运河的书。这肯定是一个计谋。我即使是写了一本关于苏伊士运河的书，那也不是反对苏伊士运河的，更别

说供职于墨索里尼政府了。那位官员把这事看得很重，因为当时苏伊士运河问题正是一个矛盾尖锐、争论激烈的政治问题。他向上级做了汇报，促使意大利和法国也插手此事，弄得沸沸扬扬。

一位政府官员到我在纽约所谋职的第一家交易所调查。他向我的一位同事询问，这个人也是匈牙利人，恰好是我在纽约最好的朋友，他叫阿历克斯·福克斯，“您说，科斯托拉尼是法西斯分子吗？...法西斯分子？为什么？这是从何说起的呢？”

“我们有这样的指控，说他是法西斯分子，而且，说他为墨索里尼干事。”我的朋友大笑不已，反问道：“科斯托拉尼先生能是法西斯吗？恰恰相反，他是个犹太难民。”

这个事件最终使我明白，这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半点战争的经历的历史。我想要应征入伍的计划也因为调查而被拖延了。当我想去参军的时候，出来了一条法律：入伍的年龄限制在35岁，我电就彻底死了心。

我不像哥哥们那样在家里受重视，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但我也因祸得福，在家人的照料，我免受了上战场的痛苦。我的哥哥埃梅里希在伦敦的一家私人银行谋到了一个职位，他后来死在了伦敦。我的二哥贝拉去了巴塞罗那，就在二战前夕他还来巴黎看望了我，战争一爆发他就不想回布达佩斯了，可是他又不能呆在巴黎；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还不像我有工作职位，有居留身份。那时候我就向他建议，去巴利兹附近的一个叫做赫恩代的地方；我父亲的朋友卡罗斯·索里亚住在那儿。卡罗斯·索里亚人很好，他一点也没有犹豫就接纳了我二哥。因为赫恩代当时还归法国所有，所以他还必须再转移，然后他开车去了里斯本，去找天主教耶稣会会士；我在巴黎曾经和耶稣会有过联系，让一位那里的耶稣会牧师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所以我觉着凭着这些他可以在里斯本获得居住权。他的确在里斯本的有关部门申请了居住权，并递交了自己手里的推荐信。但是，官员们的反映却不大让人满意，他们持一种怀疑态度。葡萄牙人和耶稣教会没有联系，所以他们就又把哥哥赶出了里斯本。他又回了巴塞罗那，在那儿他获得了居

住权。他还得到一个职位，在哪家公司我记不清了，但是他过得不错，后来把夫人从布达佩斯接到了巴塞罗那。

我的兄弟姐妹之中，只有我的姐姐是唯一留下：来和我父母一起待在布达佩斯的。有一段时间，她藏在一些非犹太教的朋友那里；我的父母也得到了一些匈牙利朋友的保护。就在战争结束前不久，他们还曾经落入纳粹之手，遭到拘禁；后来碰到一个仁慈而善良的看门人，赢得了他的同情，很快就逃了出来，获得了自由。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厄运那是谁也不敢想象的，只有可爱的上帝才知道。他们像我一样，和其他我们的朋友一起做了洗礼，不再信仰犹太教，尽管按照希特勒的种族法律我们这样的人依然是犹太教徒。战争结束后，我再次回到巴黎，把父母接到了苏黎世，用我做股票交易挣的钱供养着他们在苏黎世安度晚年。我们的家族企业当然也没有逃过战火；通货膨胀也让我父母的财产大大地受损，所以那些年轻的夫妇们如果他们问我投资最佳：方案的话，我会建议他们把钱投到孩子的教育上。我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我在战后不仅资助我的父母，还资助了我的哥哥们；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是否让我的儿子——如果我有儿子的话——也从事股票生意的话，我会明确地回答：不！按照我的设想，我的大儿子一定是一个音乐家；二儿子是个画家；三儿子是个作家，至少是个记者；四儿子一定要当一个股票商，为的是养活其他的兄弟们！

我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安然无恙，但是我的一些亲戚还是在战争中死去了。我的所有的在战争期间停留在布达佩斯的表兄弟们，像很多其他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一样被关押了起来，后来被扔进了多瑙河，我自然是在战后才得到这些消息的。在战争期间，在美国，人们也听到一些类似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可是我根本不相信，尽管有一些亲身体验，但是我还是一定要说不相信很多东西都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我的第一位夫人一起去电影院，在那儿放映了关于集中营的一些电影，我告诉我夫人：“所有这些都是宣传。”我不能想象德国人，这个一直作为文化的榜样来学习的民族竟然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我的夫人是雅利安人，她都相信；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的事实都比我们看到的都更残酷！

我非常庆幸自己的幸运，我在移民的过程之中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还觉着自己也是一个：牺牲品。

在我这次乘船从维高到纽约的时候，我曾经久久地凝视着远去的大陆，直到它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心里暗暗地想道：我还会再回来吗？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我也没有意识到，我一生之中最美丽的一段时光在等待着我。一路上，乘船旅行时两岸风光美妙无比。同船的还有匈牙利的大经纪人马塞尔·沃特斯和作曲家保罗·阿布拉汉，除此之外，还有当时的风云人物伍尔沃斯的女继承人芭芭拉·赫顿的先生；航程是3个星期，其中有3天的时间我们停留在哈瓦那。我离开甲板后，一些年轻人围拢过来，想让我给他们签名。现在有的时候也有人让我给他们签名，从本意上说我是想拒绝的，因为我又不是音乐家又不是艺术家。哈瓦那的年轻人却认为我是，他们把我当成了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茨先生——那是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年轻的半古典主义音乐家。后来我到了纽约，我的旅行——或者炫耀成是逃难——持续了两个月。我的英语不那么纯正，但是也够用。因为在巴黎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阅读英文报纸。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从我的一个叫马奎斯·尼古拉·维勒瑞的老客户那儿得知，我也在那艘船上。这位马奎斯·尼古拉·维勒瑞的先生是巴赫先生的叔叔。巴赫先生创建了一家叫做维勒瑞·巴赫的陶瓷公司。

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在布鲁克林港口迎接了我，在我面前他必须扔掉法语，不是因为纳粹，而是根据法国警察的规定。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同性恋者，可是他却有两个孩子：在尼萨城，他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别墅。法国人对战争早有准备，他们从尼萨港调来一艘叫做马利娜号的船，停泊在布鲁克林港。我的朋友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想结识一个海员，他和一位长相英俊的小伙子攀谈起来，他说了很多行话，但是显然人家什么也没有听懂，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慌乱之中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他的上司，我的朋友一下就陷入了困境，人们认为他是间谍！所以他就有口难辩了，港口的警察倒是相信了他的话，但是勒令他在一周之内离开法国。所以这位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先生就到了美国。在我们乘出租车开往郊区的住宅区的时候，他给我讲

了几件重要的事情，我想我应该择善而从，和正派人交往；少和不正派的人搅在一起。

（记者插言：您肯定是择善而从的。非犹太人总是说犹太人爱聚群；非匈牙利人说匈牙利人爱聚群。您是匈牙利的犹太人中的一个，所以您是小团体之中的小团体了。）

非常正确。不过在我到这儿的第一天，在我朋友的提醒之下我就充分注意了这个问题。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问我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做泽尔热·鲁宾什的人，我说：“我当然认识他。”

“真的吗？”这是他的第一反应。“他在这儿过着富裕的生活却不被人瞧得起，因为他的财产来路不明。”我知道他的财产是怎么来的。我在巴黎的时候就认识鲁宾什，在那儿的时候他也不怎么招人喜欢，因为他开了一家不怎么样的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黑钱；利用弗兰克—亚洲银行经纪人的职务之便，他发现了好几个俄罗斯人的账户，这些户头上都趴着很多钱。他千方百计地找到了这些户主，告诉他们该如何把那些钱弄到手；条件就是他从他们那里收取好处费。这样的生意在做金融贸易的圈子里受到了普遍的嘲讽；后来，不知何故，他离开了法国，后来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接管了一个金矿勘察公司，对公司的控股权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

“要想在纽约结识正派的人，你就最好远离这个人。”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警告我说。我的第一个夜晚是在圣莫瑞斯饭店度过的。一个大明星约瑟芬·巴克也住在这个旅馆。这天傍晚，我去皮埃尔饭店的酒吧，我本想第二天搬到这个饭店里来。坐下以后，一看，我旁边的人是泽尔热·鲁宾什！我该如何反应呢？打不打招呼？这可是个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我要是不承认我是刚刚来的纽约，而且我的朋友刚刚给了我警告，那我肯定会因为心虚而神情不自然。

这个泽尔热·鲁宾什马上认出了我：“我的上帝啊，科斯托拉尼先生？”他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说：“认识。”

“我是泽尔热·鲁宾什，你是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你在巴黎持匈牙利护照。”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没有什么目的的。我说：“你说匈牙利护照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匈牙利人。”然后我就把我朋友的忠告置于脑后和这个危险的人攀谈起来。不久，他约我到他家去参加庆祝乔迁之喜的晚会。他那时在第五大街上买了著名的银行家巴赫的大屋。纽约社会的上流人物都来参加这个晚会了。

美国卷入战争以后，泽尔热·鲁宾什应征入伍。他比我小10岁，有很多机会能转成有长久居住权的当地居民。他来自澳门，持有葡萄牙护照。葡萄牙是中立国，可以不受配额的限制，可以不和同乡们争抢在美国的居留权。我真想能普及这个法案，因为不久匈牙利站在德国一边跟美国打了起来。我想履行我的权利，可是不行，因为根据我的年龄，我已经过了参军的最大年龄限制。泽尔热·鲁宾什年龄还不太大，所以他通过一些别的途径尽了自己的义务。他给几个军火公司做经纪人，利用和几个公司的董事会的关系给自己开出证明，证明他是一名公司中身居要职的职工。

在我度假期间，我和他在滑雪圣地普莱西德湖见过几面。当时正好通过了一项规定，兵役金可以提取出来作为预备金；我和他并肩而坐，问他：“泽尔热·鲁宾什先生，您为什么总是做这样一些生意呢？这样事情的结局总是很糟糕的。”他笑起来，说：“我也希望我从未染指过这样的事啊！”两个月以后，律师团的人站到了他的家门口，由于申请预备金的行为，他被逮捕了。他被判了两年刑。媒体可算是找到了炒作的好材料，他们乐此不疲地反复报道，讲泽尔热·鲁宾什是如何走上了这条路，结交不好的朋友，大摆宴席，买下庞大的豪宅，平时生活又是如何奢华，只玩欧洲人才玩的那种大赌注的纸牌游戏，但是现在却只能在牢狱之中度过了。

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又被流放，不过还是给了一定期限的居留权。他的财产当然也是一个大问题，另外他还有两个女儿，是一对儿同母姊妹；她们的母亲，那个强悍的有男人倾向的女人在他坐牢期间终于离开了他。我心里很清楚，我必须马上去看一看他；开诚布公地

和他谈一谈，他就会明白我丝毫没有理会那些关于他的闲话，一如既往地和他交往，因为整个社会都很排斥他。

几天后，人们发现我的朋友泽尔热·鲁宾什被人杀死在了他自己的公寓里，他是被阉割致死的。凶手的作案方式、作案动机以及作案的细节人们都一无所知。据说这是马其顿人干的，因为在马其顿这样的杀人方法是很流行的。引诱别人的妻子或者情人，就会被施以这种刑法。这个方式可以好好地教训一下泽尔热·鲁宾什了，因为他有一个可怕的坏习惯，总是想去引诱每一个已婚女人或者是别人的情人，也就是那些没有自由的女人。他想向自己证明通过他自己的钱他可以把别人的钱弄到手，对于那些本身就是自由的女人他却没有一点兴趣。

泽尔热·鲁宾什确实是有大量的通过恶劣的手段得来的财产，不过也正如媒体上所说的那样，他确实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小伙子，并不是什么可怕的魔鬼；只是女人们对他的这种恶劣行径十分反感。他可能还是一个钢琴手，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他的两个女儿从他那儿得到了1500万美元的遗产。我和泽尔热·鲁宾什的朋友关系也没有避讳别人。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我认识的是一个好人、正派的人。在纽约住着很多匈牙利的移民，所以尽管我不能回老家看看，我还是不太悲伤。我每天在皮埃尔饭店的大厅里和我的朋友们聚会。在那里我每个月要付400美元的房租。

（记者插言：您那时一晚上就要花400美元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映通货膨胀的例子。还有一个能反映通货膨胀的例子就是乞丐们乞讨的时候所要的钱数。战后他们沿街乞讨的时候说：“你能给我一毛钱吗？”他们会为得到一毛钱而满足。后来他们开口就要两角五分的硬币了，现在，他们一般来说都是要一张美钞（一美元）了。

我参加的那个匈牙利的小集团里面，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那位大作家法荣斯·莫奈。在著名的文学杂志《纽约客》某一期的第三版上曾经刊登过他的一张照片，所有的人都想结识他。因为莫奈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持一种拒绝的态度，在人群中显得有点胆

怯。唯一不想和他一样的人就是我；不是我不喜欢他的作品或者别的什么，恰恰相反，我很喜欢。我的叙述在这里要进行一下追忆了：我们两个早年在巴黎就相识了。巴黎的维斯拉维斯股票交易所两个咖啡屋，左右各一个；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左边的那个咖啡屋吃点东西。从那里是进不到交易大厅里去的。我在右边的咖啡屋里看见莫奈先生坐在平台上，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但并不认识。第二天我又在同样的地方看见他坐在那儿；第三天，情况依旧。我很好奇，也很纳闷，他在咖啡屋干什么呢？我走到他对面主动和他打招呼，问候了他。他非常惊讶，一个匈牙利人在和他打招呼。他马上就和我攀谈起来，他觉着我可能是想向他借点钱什么的吧——正如人们，所说，莫奈是个非常小气的人。一次，在卡尔斯巴登，有一个人径直走到他跟前说：“莫奈先生，我叫考瓦斯。”莫奈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100克朗，也就是现在的10马克。“什么？”那个乞丐不解地说。“一个堂堂的大莫奈就给了我100克朗？”

“不。”莫奈说，“你应该说，考瓦斯得到了100克朗。”不过，我知道，在私下里他的确是资助过朋友的。在巴黎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认识他。这次经历之后，在纽约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和他形同路人。尽管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经常在电梯里碰面。

我和他的夫人打招呼，他的夫人总是礼貌有加，和蔼可亲；她在那儿和他住在一起，但我就是不搭理他，我心里总是很排斥他，觉得他是一个势利眼，即使碰了面，只要可能的话，我都尽可能避开，因为我觉得他不想和任何人交往。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讲，每当有人想要和他套近乎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对朋友和熟人无所求。”

有一次，法荣斯-莫奈与一个我俩都相识的朋友为一件事争论了起来。他们并肩坐着，争得面红耳赤。莫奈断言，他们正谈论的某一件事不可能那么简单，我的朋友却正好相反。“不可能，不可能。”莫奈一再重复着。“有可能，有可能。”我的朋友也不甘示弱地答道。“你怎么知道，你说的就那么正确？”

“是科斯托拉尼这么说的。”莫奈沉默了，不再争辩了。那人后来跟我讲到这件事，我感到，莫奈彻底服了我。

有一年夏天，我还是在普莱西德湖度假。我在那儿和我的老朋友拉斯·保罗斯一起合租了一间房，我俩一路上做伴，一起来的。保罗斯和莫奈关系不错，莫奈正好也在那个湖边度假。我的朋友每天按时和莫奈碰面聊天，他和莫奈讲一讲我的情况，回来再和我说一说莫奈的事，莫奈说了什么什么，科斯托拉尼讲了哪些哪些，一五一十地来回联络。有一次，莫奈和我的朋友保罗斯说：“那么，给科斯托拉尼问个好，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不过，他为什么不来问候我呢？”

“莫奈抱怨说，你不和他打招呼。”保罗斯告诉我。“告诉他，真希望我过去根本就不认识他。”我回敬我的朋友。

“不认识？”莫奈不敢相信地问道。过了几天，我俩在街上碰了个正着，当时的情景是尴尬之极，再也无处可逃。我是和我的朋友一起去的，于是，保罗斯给我们相互做介绍，等莫奈向我伸出手来致意时，他说：“我们终于相识了。”然后，我俩在纽约经常一起出去吃饭。他向我问一些股票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尽管他对股票一窍不通，但他给卖空投机商们下了一个极其精确的定义，他认为，卖空投机商们就是“拉着别人一起跳进陷阱的人”。

还有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他是出了名的吝啬鬼，但他常请我吃午饭，是在他每天吃午饭的那个饭店。每一次他都要特别强调地告诉服务生：“一起算账。”因为他给了饭店工作人员一个长期有效的指令，即“当我和别人在此处用餐时，请各付各的账。”从而也能看出，莫奈把我看得有多重。

我就这样在饭店、咖啡屋和各种晚会上消磨掉了我的时间，纽约人就是这样从一个晚会旋转到另一个晚会上。

问题二十八：不过您在美国并不仅仅是成天参加各种各样的晚会，您是移民，是为了躲避迫害从欧洲逃离出来，到这里避难的。您是如何量入为出，维持生计的呢？

答：我真的有很多钱。很幸运的是，在我往美国移民之前，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转汇到美国了。我一到这儿，我在格兰特信托银行的户头上就有20万美元，我很快把其中的10万美元转向欧文信托银行，因为我认识这个银行的行长，我可以自己手里掌握着支票，随用随取，就像放在我的家里。只把几张用以还贷的美元债券放在了那个巴黎人开的私人银行雷多公司。

有意思的是，我到美国后不久收到了一封信，信中问我，是不是犹太人，因为按照德国占领区的规定，要冻结犹太人的账户。我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回答了这封来信，我写道：“我提醒您注意：我是罗马天主教徒，我拥有美国居民身份证。”当时这些东西还不那么明确，但那些银行的工作人员也不会那么认真地去核实。“您要我把这笔钱交付还是支取，告诉我，不日我即可前来办理。”银行的人吓坏了，赶紧通知德国的有关部门，说我不是犹太人。其实，我不是犹太人的说法也是正确的，因为按照匈牙利的法律，我不是犹太人。当战后我又回到巴黎的时候，我把法郎贷款兑换成了美元，贷款数额因法郎贬值已大大减少，我再用收益中的一部分买回贷款，这一卖一买，其中的利润是巨大的。

问题二十九：您当时的20万美元按当今的社会购买力折算的话，是现在的多少倍呢？

答：加上后来的5万，我估计是20倍。我在经济方面没有忧虑。开始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只想象个花花公子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至少说起来是这样。在美国的确有很多东西值得我观察和学习。自然我做了一圈环美旅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游玩了所有的大城市，首先是去了好莱坞，在当时乃至现在，在好莱坞都有很多匈牙利的电影公司。

问题三十：您是否想过办一家自己的经济实体？

答：我后来当然还是接着做投机商，做股票和金融证券，做短期交割，也做远期交割。在我观察了美国，在美国过了一段悠闲自在的生

活以后，我也确实想做点什么的了。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话是要被普通老百姓瞧不起的。我在那里也去很多经济公司应聘，要在华尔街上找到一席之地的想法激励着我。我在心理揣摩着，在和我的未来上司的第一次谈话中我该如何表现。他们肯定不仅要考察我的学识，还要听一听我对股票生意的个人观点。我这样渴盼等待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们拒绝了我。后来我知道了个中缘由。这是一家世界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通过关系我认识了总裁萨克斯先生，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是通过他的夫人和他认识的，我后来的夫人和他的夫人是老相识。他请我到他那儿去，在我们谈话之后他决定录用我。但那里的人事部经理却不同意，事后萨克斯先生向我解释了那个人拒绝我的理由：我在我的求职信中列举了我所有曾经工作过的公司，他们由此认为我是个不可靠的人，他们不愿意要这样的人。为了让员工们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自食其力，他们急需既能取信于客户又特别能挣钱的员工。他们估计我在股票生意方面应该可以找来大批的订单，但是我挣不来很多钱，不是“大制作者”。他们说得很正确，我当时只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见过这样一个词，看来股票经纪人也能成为“大制作者”！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所以在我这次失败的求职中，仅仅学到这么一点东西。

不过，我并没有放弃。我想如果我不能在我喜欢的股票交易所里找到一席之地的话，我可以做另一件事：音乐。在曼哈顿大街上有一个非常别致的商店，我当时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唱片，这些唱片我一直保存到了现在。我要是把这些唱片整理好，一个挨一个地播放下去，我一周都听不完。我觉着在这种商店里肯定有特别多漂亮女孩儿，在我卖给她们唱片的时候或许还能得到一些“意外收获”。但是这个商店也没有要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匈牙利的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公司。我自己的投资并不多——这个公司叫约瑟夫·巴莱；公司的办公室就在汉诺威广场上，华尔街附近。我坚持了我的原则，只做投资人，由其他人经营。由此，发展了我自己的业务。我也不在这儿做我个人的事情，一般来说我都是在上午11点的时候就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每天都和一个意大利的擦皮鞋的人聊天，讨论国际政治问题；然后去电影院，为的是

一睹弗兰克·泽那塔的形象；当然，我也是歌剧院、艺术馆的常客。对于我们男人来说，一个很奢侈的消费就是在女人身上花钱。很多男人都应征入伍上了战场在前线英勇作战，所以现在这里的竞争也就不那么激烈了。

我也从中受益，认识了我的第一个妻子。她是维也纳人，已经有了美国正式居民的身份：因为她一开始和美国人结了婚；而我和她结了婚，我也就有了美国居民的身份。我俩经常一起出双入对地去歌剧院和剧场。

问题三十一：这是一个富有的年轻人的经历。为什么您在二战结束后又回到了欧洲呢？

答：好的，我必须纠正一下，我在纽约的生活也不是绝对地无忧无虑。我们所有移民过去的人都有一个担忧，那就是：战争会怎样发展？在美国我们明确地感到，希特勒的军队是不可能踏上美国的国土的。而我们的忧虑在欧洲已经是事实。发生在美国的一切都发生在欧洲有多好啊！我们想念我们的家乡。一位从维也纳辗转而来，后来生活在美国的叫格林的人给我们讲了一件事，他的一个同事向他提了一个问题，问他：“您在美国的生活幸福吗？”

“已经很幸福了。”这是他不假思索地给出的答案，“但是我不快乐。”说起“幸福”，格林想到的是个人的安全感，就是说，他和他的财产都有安全保证，被社会接受。但是，对于一个上了年纪，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欧洲人（维也纳人、法国人、匈牙利人）来说，他不如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年轻人心情更舒畅，因为年轻人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所以他能找到这里的“快乐”。年龄大的人对这里的氛围不习惯，坐在咖啡屋里谈论哲学时，在街上散步时，随便四处闲逛时，他都会感到这里味道不对。我们还能再回到维也纳、巴黎和布达佩斯的咖啡馆里去坐一坐吗？

想法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无论如何也会赢的；另一些人则心怀忧虑，我也属于后者。就像前面给您提到的那样，谈到欧洲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措施，只想着裤腰上打不打褶子的欧洲人

同美国作战，美国能不赢了这场战争吗？当时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可以用来区分谁是消极的，谁是积极的：消极的人待在美国，积极的人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我过去常去八十六号大街，人们也称之为德国大街，因为街上有很多的德国的书店、餐馆和咖啡馆，都冠之以非常德国化了的的名字，比如说，兴登堡咖啡馆、劳乐莱咖啡馆等。还有一个德国影院，美国没有被卷入战争之前，我去那里看过一次电影。人们能看到发自德国东部前线和西部前线的消息，影片是关于德国军队在前线作战的报道，这些电影在德国国内的电影院里也在放映，为的是调动全体德国人民的积极性。看过电影后，我又去了维也纳小提琴屋，桌子边坐着的差不多都是德国人。这里虽然没有德国的纳粹，但是这里坐着一些德国的“爱国者”。我听到有人在聊天，他们说：“我们一定已经好好地教训了英国人，然后，再给谁谁点颜色看看。”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的精神上的绝对自负起了作用。我也有些害怕，希特勒已经把他的意识强加给了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希特勒的思想渗透得有多深，有多远。

我有个朋友，名叫爱德华·凡佛，他也是我的雇主的朋友，同时还是阿得列恩·波奎尔的朋友。凡佛是个百分之百的同性恋者，他总是给我讲他的那些艳遇。当他去世的时候，他委托我做他的遗产管理人。这样，我认识了他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他把他的财产分给了他们。爱德华·凡佛不和我讲他的艳遇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国际政治。有一次，他讲的让我震惊不已，“我们输了！”他说。“为什么呢？”我问。“德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密集型杀伤武器！”他讲不出这种武器为什么这么有威力。不管怎么说希特勒是有这种武器。我深感不安。是不是我再也回不了我的家乡了？是不是最后美国也得被德国占领？几周后，我参加一个匈牙利人的晚会，在晚会上，我碰上一位匈牙利的教授冯·诺依曼，他是计算机的发明人。我有两次在墙角和他碰面，当我们终于可以独自静下来说话的时候，我给他提到了爱德华·凡佛以及他跟我说的希特勒的秘密武器的消息。他笑着说：“我们能得到一切消息，现在没什么危险。”我听了他的话就又放心了。因为我知道，他总是和雷欧·茨莱德、瓦格纳、爱德华·泰勒等一些圈子里的匈牙利

名人打交道，这些人都是胡佛政府的科学家或者公务员，今天我们都
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就全力以赴地研制原子弹了。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前不久，为
纪念1945年5月8日法西斯投降50周年，我接受了一家报纸的采访，他
们提了4个问题：

问：您在哪儿？

答：和我的夫人，还有成千上万的喜悦的人们在一起，我们站在广场
上，广场上人山人海，都没有地方跳舞了。

问：您想马上得到什么？

答：一张希特勒的画像，是他让我总是有家不能回。

问：您最敬佩谁？最恨谁？

答：跟胡佛比较起来，更敬佩丘吉尔，最恨谁？允许您猜3次！

问：您当时有些什么样的梦想？

答：我坐在柏林的咖啡馆里，凭窗而坐，读着报纸；就在我放下手中
的报纸的时候，已经看完对犹太人的评价。一个长满络腮胡须的老者
走向我，我认识他，他特别消瘦，颓废的样子，好像是过惯了不健康
的生活。他弯腰低头地走向我，说：“尊敬的先生，我能看看这张报纸
吗？”显然，他是看上了那篇关于犹太人的评论。我说：“我已经看完
了。但是，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希特勒先生。”整个夜晚我都和他
在一起，我们坐在时代广场上聊着天，所有的纽约人都到大街上来庆祝
打败了希特勒的这场战争。就在这天夜里，好事也降临到了我的头
上：我要回巴黎了。我在纽约的生活过得很惬意，但是巴黎是我的家
乡。1946年夏天我第一次遍游欧洲，因为战争刚刚结束，我还不
想直接回去。我到了巴黎以后，搬到了蒙高大街53号；在那儿租到
了一个房间。因为我发现这是一个名人居住区，一开始我并无兴趣
去拜访他们，因为我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总是要回来的，还有机会。

到这儿的第一个夜晚，我就和我的夫人一起去了非常别致的雷·豆恩饭店。我们一落座就听见蒙堂德先生在唱歌。我的旅行由巴黎而瑞士，从莫奈那儿接到了一份委托，为他考察欧洲的经济情况。我有了一个大概的感觉以后马上就写信向他汇报。法国的货币疯狂地多了起来，可是有什么商品也没有；意大利市场上有很多商品，但是人们手里没有钱；瑞士的钱和商品一样多；德国则既没有钱也没有商品。我把上述考察结果以及我个人的观点都向他进行了汇报。德国人去了法国什么都往回带，只是不带法郎回来，因为法郎已经贬了值。意大利人把他们的商品都藏了起来，战后又拿出来销售；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所以老百姓手里没有钱；瑞士因为保持了战争中的中立，所以和战前比起来没有什么变化；只有德国陷于战火的中心，山河破碎，百废待兴。

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才知道，莫奈对我的报告很满意。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应该是战后的法国的形势。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美元——当然是从黑市上兑换来的——官方的汇率是一美元等于50法郎，而黑市交易价格是500法郎。当然没有人愿意把美元卖给官方了。在大饭店、大宾馆，客人们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吃，在我下榻的克利隆宾馆，早餐的时候人们还从来没有喝到过咖啡呢！

这样一来，黑餐馆也就应运而生了。人们到那儿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就餐的时候不能照着菜谱点菜；一般是老板走到你身边，悄悄地告诉你他都有什么饭菜。他所提供的一切都是黑市价格。

所以我就把我的美元在黑市上卖了，去黑餐馆吃饭，点黑菜，按照黑价格付黑钱。也就是说用黑钱在黑市上从黑交易商那里买了黑货。那些黑市交易上的小贩子们手里有很多钱，他们贿赂市场管理人员，然后再去挣更多的黑钱，大肆买卖黑市上的交易品。所有的东西都是“黑”的，都是非法的。这样的交易混乱地进行着，行贿受贿的行为掺杂其中，这和法国人的性格有关。根据经验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黑市贸易在当时的东部封锁地区还没有被封杀，应该到那里去发展。这种黑市交易迟早都会转向公开的市场经济行为。

1948年我又迁回了巴黎，过起了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日子。

问题三十二：然后您在欧洲都做了些什么呢？股票交易所肯定是都关了门了。

答：我转向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冒险投机行为：金矿股票。

法国人极其恐惧、极其担忧：他们所有的在德国占领区的财产和银行存款会不会全部不复存在？人类在受到威胁时本能的自我保护是先保护自身，再妥善安置自己的财产和存款。法国人得到指令，为了安全，随身携带自己的有价证券。他们把这些值钱的东西藏在树干下，藏在于枯了的井壁上，藏在深山古峪的悬崖绝壁上，藏在诸如此类的一些地方，做一些记号，等他们陷于绝境时，再来寻找。战争给了马丁先生和杜邦女士一个简单而深刻的启示：保留黄金，这是人在困境时的唯一的一个安全港湾，个人财产不被化为乌有的唯一救生之道。法国的法郎不行，美国的美元也不稳定，只有换成纯金、银币，或者说是拿破仑硬币。受他人左右的纸币不能给人以立身之保，必须要把成吨的纸币换成实实在在的黄色金属。

黄金的流通价值再次起了作用，由此人们看出，黄金是一切货币及货币代用物中最坚挺的，能解人于危难。这些给人们带来利益的金币、银币和金矿股票等应该被悉心保管，放在钱柜子的最底层。我有一个股票交易所的朋友，当时他在做仲裁事务，还没有做股票经纪人，他把自己的证券分散着投在5个不同的国家，多次炒作升值；直到最后，如他计划的，他的收益翻了一番。这笔生意的背景是：法国百姓怕手中的金矿股票烫手，他们热衷于手中握有黄色金属。所以股市震荡，人们抛出股票，高价购入金币、银币。他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受益匪浅。我也给了他资助和支持，我自己当然也参与其中，一起做了这笔生意。

战争结束后，我还做了另外一种投资，这对我以后的生活很重要。若是没有什么炫耀之嫌的话，我也愿意说一下。

在我安置好我的住宅后，我于1946年先后用美元、英镑、瑞士法郎等购买了德国贷款，其中也包括1930年的用法国货币执行的5.25%的扬格贷款（扬格计划于1929年实施，主要目的是处理德国的战争赔款——编注）。1946年，利率为正常值的0.25%。。

问题三十三：您是如何明智地预感到，德意志帝国或者说德意志帝国的后来人的购买力会再次恢复呢？

答：我感到，德国会再次脚踏实地地重新站起来。房屋和工厂都倒塌了，整个国家是一片废墟，而这个民族的美好的品德，比如勤奋、缜密、准时等等没有被遗失，民族精神尚在。第二点是全民选举康拉德·阿登纳为第一位总统。我本人对他非常有信心。我的希望是，为了在德国重新建立起信贷的机制并赢得人们对它的信任，阿登纳应该采取措施，偿还债务，不是说，马上做这件事，不管什么时候吧。

我在巴伐利亚州的拜罗伊特看歌剧《特利斯坦与伊瑟德》的时候，中间休息时意想不到地碰上了一位过去股票交易所的老同事，他对音乐特别感兴趣，但是对这么晦涩难懂的歌剧早就没兴致了。“您在这儿做什么呢？”我问他，他的回答简短而意味深长：“我在等待着剧终！”

他的话让我想起那个扬格贷款。我向做这个项目的朋友们建议，利率回降时，他们该把它们再出售出去，他们这样做了。因为我也买了，所以，我知道并分析了这个形势。我是通过瑞士银行买的，他们嘲笑我，还幸灾乐祸地说：“这个债务永远不会偿还的。”他们太缺少想象力了。事实证明：想象力比智商更重要。在股票交易中，人们需要想象力和耐心。

按照惯例，利率又该上升了，的确，我签完字后，没有马上抛售出去，我是在等待观望，等利率升到1000法郎的时候贷款就会被偿还。

问题三十四：那您得到了您所期待的了么？

答：正常值到1000法郎的长期贷款，我买了250股，不过，我把它们看成并写成了3.5万法郎。怎么能这样呢？您可能马上会问。

由于战争，法郎大幅度贬值。阿登纳总统萌生了改善德、法两国双边关系的想法，并同德法同盟算了一笔账，他说：“我不能偿还英国人喜欢的英镑，美国人喜欢的美元，和法国人不喜欢的法郎。”他向那些长期贷款持有者们提出了这个说法，假如过去他们是所说的扬格贷款的美元持有者的话。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这笔交易，前一段时间我还做了一笔与之相类似的生意。操作这样的生意能给人带来乐趣，同时也能带来些收益。

在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探讨了两国之间许多重大问题并使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之后，我产生一个观点：不久，戈尔巴乔夫就要同几个西方国家投资一个上十亿美元的贷款。我肯定，这笔贷款会得到允许，但限制条件是，俄罗斯至少应该把沙皇时期的贷款整理一下。我给我熟悉的一家代理公司打了电话，这家公司打出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招牌，我请他帮我买入老沙皇时期的债券，时间限制在1822年和1901年。这两年的债券在股票市场上注册的份额较少，从25%的占有率下滑到了一个平常值，之后的1917年列宁公布，新苏维埃政府不承担沙皇的债务。很可能很多的债券都被扔到垃圾堆里了。1991年10月29日当时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巴黎同法国总理密特朗的会晤中谈到并承认了这批债券。紧随其后就开始了关于老沙皇债券的投机交易炒作。利率最高值升到12%，也就是说，每一单的平常值是500法郎的话，就可收益60法郎。在最后的几个月里，生意非常火爆，似乎再也没有比这个再过瘾的了，达到一种空前绝后的状态。市场几乎被购空了，付款方式当然不像扬格贷款那样全部都是现场交割，但其工作手续是井井有条的。俄罗斯必须在欧洲议会上面对着实况转播的摄像机向人们作出保证。我一般不做四平八稳的常规的投机交易，这批贷款首先是时间很久远，而且，德国战后比俄罗斯今日的经济实力还要强。

这时候有些人可能要问我，我是怎么能有这些预见的呢？那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典故。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学开车，我的教练对我说：“您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学好驾驶。”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因为您总是看发动机罩。您抬起头来，眼睛看着300米远的地方。”打那以后，我再开车时就像换了一个人。我建议那些经济学家们，抬起头来，看着远方，不要喋喋不休地谈论，明年的经济增长指数是3.3%还是3.2%。因为我要赌一把，我认为，没：有什么失误的国民经济；对于投机商来说，好与坏的经济形势都要冒同样的险。

在我出手了那笔扬格贷款之后，我在日内瓦的一个拍卖会上买到了一本天主教教义的祈祷书，不是印刷品，而是手刻本，装帧漂亮、精美。我收到了两封感谢信，一封是阿登纳的亲笔信，一封是德国大使馆写给我的。

问题三十五：到现在为止您已经多次使用了“天主教”这个词，您本人是天主教徒，阿登纳也是天主教徒，您如何理解天主教教义？您参加天主教的宗教节日吗？您笃信天主教的教义吗？

答：不。我对内心祈祷，也到教堂去祈祷。我的父母和我的姐姐们是十足的天主教徒。我没有他们那么虔诚。

（记者插言：但是你同天主教保持着一种最基本的联系。）

我相信上帝。这是真的。我一直拥有这么幸运的生活。我曾经描述过我大部分的生活情况。每次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似乎总是有上帝之手在帮助我。我有两次破产的经历，是上帝把我重新拉了起来。一个真正的股票投机人其实就是一个不倒翁，他应该百折不挠，受了任何挫折都能很快就站立起来。

问题三十六：在随后的几十年生涯里您又开创了一个新的事业。您成了一名记者，32年来，您为经济报纸杂志写了大量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文章，在您的同龄人都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時候您并不服老，而是

奔走各地，到处演讲，不遗余力地宣讲您的理论。您为什么要这样呢？

答：这一直是我心底里最热爱的职业。我学的是哲学和艺术史，为的就是日后当一名小品文（散文）作家。我已经说过为什么在这个方面我一事无成了；后来我实际上是一直在致力于我心中的这个理想，并最终实现了我的梦想。到处给报纸投稿，成为自由撰稿人。在巴黎的时候我给很多报纸写稿子，比如布拉格的、罗马尼亚的、南斯拉夫的是用匈牙利文写的。不仅仅是写金融方面的内容，而是涉及所有关于巴黎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在巴黎的确发生了，很多重大的有世界影响的事件。匈牙利人对此很有兴趣。我也给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写稿子，不过更多的时候我还是给我的表哥保罗斯当翻译，他是用匈牙利文写东西的，德语不如我，而奥地利人是说德语的。在战前我就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这一次是以图书的形式出现的。那本书叫做《苏伊士——一个公司的成长故事》。那家苏伊士公司是当时一家非常庞大的股份公司，以苏伊士运河经济担保公司的名义建于19世纪。在欧洲的伦敦和巴黎的股市上了市，资助运河地区的进一步建设。

在纽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为我的第二职业做准备了。我结交各个行业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并写一些宣传他们的文章。现存的一家晚报仍然把从股票经纪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

让我们再回到巴黎的话题上来。我的另一本书也完稿了。叫做《美元之于巴黎》，是一部关于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书。其中谈到了我对确保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些观点；为了保证中东和平进程继续进行，美国需要向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提供财政支持，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把书的名字定为《美元之于巴黎》。我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中东和平取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利益协调。双方互惠互利才不至于爆发战争。所以我总是说，一个好的股票交易商，不仅仅要关注新闻事件，而且还要留意大众对新闻的反应。我的书《美元之于巴黎》很畅销，多次再版印刷，原因就是我在其中提到的美国外交政策。这太好了，这使我下决心继续干下去。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罗威尔·伯耐特碰到我时，对我说：“这本书写得很精彩，也很细腻，有的人会猜测

您已经掌握了我们重要的外交策略秘密文件。”于是，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种“秘密”的协作关系，经常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保持了多年的联系。我甚至开始帮助他们做事了，在法国的很多城市做演讲，宣传他们的外交政策。让这本书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法国的外交部长后来的总理罗伯特·舒曼作的序。为了说清楚这件事情，我必须追溯到开始写书前的一些想法。写书的念头萌生于我的一次在南美的旅行。我的一个表弟叫乔治·科斯托拉尼，他前几年才去世，当时我做横穿大陆的旅行去探望他。我在那里进行的为期两个月的旅行之中，曾经好几次踏入匈牙利的殖民地。

那儿的人经常咒骂美国人，我觉得要把这种美国不受欢迎的事实及其原因公布于众，我要把这种情况写出来。旅行一结束，我马上就坐到了打字机边上，整理思路，把个人的观点和所见所闻都写了出来。起初只想搞一个政治性的小册子，全部手工印刷，而且有一定的反美嫌疑。在书中，我以一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小册子一共是140页。我当时同几位MRP党的法国政治家的关系不错，就给了其中一位一本，他是罗伯特·舒曼的密友。他认为我的书写得很有意思，就转给了当时的这位外交部长。这让我受益匪浅，当我把这本小册子搞成正式的书的时候，他给我写了后来事实证明非常重要的序言。我同一个经营不错的出版社有联系，向他们推荐了我自己的这本书；他们很快就答应了。后来《巴黎出版》的人问我，他们是不是可以刊登这本书中的一部分？其实，我不想一直不断地去关注什么外交政策，老是写这类东西。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大广告，使我名利双收。我的新的工作让我非常满意，在随后的几年里就一直给《巴黎出版》写稿子。《巴黎出版》是一份很大的晚报，可惜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的工作非常有意思，能和旅行结合起来。有一次我还跟随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团去了印度访问。我还写了很多关于法国和美国的双边关系的文章，在美国宣传戴高乐的英明，促进美法友谊。因为在当时的法国有一股反美思潮。后来，法国总统戴高乐亲笔签名授予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我为《巴黎出版》的工作结束的时候就退休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感觉很无聊。我的两个爱好——阅读和听音乐——也不足以打

发掉所有的时光，我多少有点颓废。于是就去拜访我的老乡思聪迪教授，他在苏黎世，是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几年前才去世。

我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心中的迷惑，他帮我做了一个著名的思聪迪测试；后来全世界的心理医生都使用他的这种测试方法。我们一同看了48张照片，我必须不停地告诉他我看那些照片时候的感受，哪些喜欢，哪些不喜欢。然后他就反反复复地琢磨了一个小时，问我：“您家里谁是最有影响的人物？谁最爱发脾气？”

“是我父亲。”我告诉他。“您有的时候也爱发脾气吗？”他又问。我说：“是的。”他给我分析说，我是能量过剩，不管什么反正必须做点事儿！我要是体力劳动者的话，他说他就会把我送到深山古峪去劈柴搬石头，为的消耗掉我身上的能量，因为我受过教育，所以就得做点别的事情了。他建议我写点东西。“创作，”我说，“对我来说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10年前我就写过一本书。可是我现在应该写点什么呢？”

“您对什么感兴趣呢？”他问。我回答道：“两样东西，一个是音乐，它像宗教一样左右着我的灵魂；另一个就是股票。”

“那您就选一个题目写吧。”这就是他的建议。

我回到家，独自一人左思右想：我不能写音乐的书，竞争性太强，我没有受过完整的音乐教育；但是对股票我却有真知灼见，我在股票经营上有很多实践经验，写一本关于股票的书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在《巴黎出版》的工作使我结交了很多出版和文学界的朋友，比如乔治·佩那德，他是法国一家大报社的社长；我和他一起去吃饭，席间和他聊起股票，最后向我说出了他的决定——当然也是我想得到的结果——他说：“您所讲的引人入胜，非常有趣，您一定要把这些写成一本书。”两天后他和我签了一份合同，我的第一本关于股票的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1961年，高沃兹出版社也在德国出版了这本书，题目是：《这就是股票》。这本书于1960年在法国出版，题目是：《要是

股票能说话》。扎格·盖特瑞把这本书改编变成了电影，用了不同的名字。

当我把创作手稿交给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里并不是十分自信，还说：“会不会线索太乱了呢？”

有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有理论，还有忠告。而他只是说：“这很好，否则就太单调了。”他读过这本书以后对我说：“科斯托拉尼先生，这本书太棒了！肯定会轰动的！”我在电视里接受了一个关于出版这本书的采访，在法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我的一位很有影响的朋友阿尔伯特·汉认识德国的一位高沃兹出版社的出版商，谈起我的书，使他对我的书也有了兴趣。讲好，让我把主要内容翻译成德语；后来这本书还用德语之外的7种语言出版了，包括日语。

阿尔伯特·汉是我终生的好友，我是通过我在股票交易厅的老朋友弗利登什，在纽约和他认识的。在我们这一群人中，他被称为“股票场上的友谊大使”。我和弗利登什后来在纽约合伙开了一家金融贸易公司。

阿尔伯特·汉是来自瑞士的难民，尽管他和我一样也受了其他教育的洗礼，但是希特勒仍然认为他是犹太人；他的夫人是雅利安人，是一位伯爵夫人。尽管在瑞士他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但他仍然感到与德国为邻还是不安全，所以就逃到美国成了难民。跟他相比我是个穷人。他来美国的时候带了100万美元，其中的大部分是继承的遗产。因为他的曾祖父是德国一家证券银行的创始人。在罗斯柴尔德制定政策之前，阿尔伯特·汉的全家继承了遗产。他们属于所谓的法兰克福犹太人。遗憾的是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犹太人了，阿尔伯特·汉的父亲那个时候就给自己买了瑞士居民的身份，所以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瑞士人。

我的那本书《这就是股票》在德国确实很畅销。原因在于，在此之前在德国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书。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做股票经纪人。那个时候股票经纪在德国就更是新鲜事物。我的这本书的确是开了先河。现在德国关于股票的书还是不太多。在慕尼黑的胡根杜拜尔书店书架上的书琳琅满目，我的书在那里一直销得很好。

这或许是因为这家书店本身很有竞争力，或许因为我是唯一一家户晓的股票作家。

在我的这本书在西德畅销起来以后，我就开始了我在德国的活动。我发现这里的股票客户存在着一种巨大的需求：辅导讲座。第一本书以后我写的第二本书就是：《金钱：最大的冒险》。我第一本书的巨大成功给我创造了机会，使我认识了《资本》杂志的编辑们。有一天，我给考那留斯·保曼打电话，他是刚刚创刊的经济杂志《资本》的自由撰稿人。他问我是否有兴趣为《资本》的一个栏目写稿；他的话在无意间触动了我那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因为给杂志报纸当自由撰稿人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零星的写过一些这样的文章，但是成为一个栏目的固定的撰稿人确实也是我心中的梦想。考那留斯·保曼领我一起去拜见《资本》杂志的创刊人，阿道夫·泰奥巴特。编辑部坐落在奥友盘那大街上，这个大楼现在也还在那儿，只是比原来大了一些。开始的时候我做一个栏目的收入是200马克。

到现在已经是快3年了，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在2000年的1月份的刊物上还在为这个栏目写文章。

到现在为止只有两次没有给这个栏目写，一次是我在国外感染了重感冒；另外一次是一个编辑的意思，不让发表我的文章，因为我在文章中猛烈地攻击了TOS，那个编辑认为人们会喜欢伯尔尼·考恩菲尔德，人们肯定不愿意听到关于他的大不敬之词。但是后来我给那一期的文章还是发表了，而且还有很多文章都是反对IOS的。通过我自身的股票交易经验和自己亲身的生活经历，我觉得那份伯尔尼·考恩菲尔德的政治报纸是极其荒谬的。一次，伯尔尼·考恩菲尔德的一个同事亨利·布尔建议我到伯尔尼·考恩菲尔德资助的IOS资金委员会去求职；我一开始就可以有10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调配。当然，首先是我必须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市场份额。我的问题是，如果已经有了10个交易员，每个人都想做10000股IBM的短线投资；并且我也要买入的话，你们公司该如何阻止同其他的交易员的买卖呢？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们认为完全不在话下，他们只关注：最后每个人必须创造出多少利润。当时我还是善意地拒绝了这个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我同布尔的这次谈

话还是对我大有裨益的。后来我确切地了解到，这是一个阴险狡诈的花招，最后结局悲惨，草草收场。

在我同IOS的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后来维持了多年的友谊的朋友海勒。我们是在一次巴伐利亚区的地产抵押银行组织的聚会上认识的。经济部的一位部长谈到了当时最新的关于外国人投资的法律条款，并且强调了福利基金会的重要性；他认为福利基金非常重要，对老百姓来说就像交通工具。他把一种基金和一个公共汽车作比较。那个时候大家都坐公共汽车，没有私人轿车。我问那个部长这些设想的可操作性在哪里？是不是外国的公共汽车司机们连驾驶执照都不需要了呢？

聚会活动后，海勒跟我聊天，把我的想法具体化了。科斯托拉尼先生的股票培训班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毫不犹豫地把计划变成了实际的行动。从那时到现在，参加我个人的股票培训班的人已经有将近两万人了；除此之外，我还与海勒合伙创办一个公司，主要业务是菲度卡银行保障金的管理工作。到现在为止，经我们手的基金和保障金的总数已经达到了2.7亿马克。

我的大量的活动当然有助于增加我的知名度。我的知名度越来越大，所以我经常可以接到一些邀请，去电视上做一些访谈节目。在海德女士主持的每晚夜话的访谈节目里我表现的据说很不错，带来了点轰动效应。对我来说这就是很大的成功了，后来的许多报纸上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在电视上说的如果不是什么真知灼见的话，也都是肺腑之言，尽管观点有些保守。一开始那位女士的词锋就很尖锐，马上就说到了利丽·达瓦斯。利丽·达瓦斯是当时匈牙利的一个电影明星，后来又成了德国的电影明星。她是马克思·瑞恩哈特公司的大牌，是我的朋友法莱斯·莫奈的最后一位夫人。我是通过我的这位朋友和她相识的。

一次她到巴黎来，我们约了晚上见面。吃过晚饭以后她对我说：“现在，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先生，我要和你告别了。我得花点时间把自己打扮得更鲜亮一点，到外面的林荫大路上走走，看看人们对我的态度如何。否则女人们就白白地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了。”这样，因为我对这位当红明星谦恭不足，我就被打上了男性沙文主义者的烙印。当

我晚上回到宾馆的房间里的時候，我接到一个妇女联合会的一则消息，其中的大部分我记不清了，意思是她们为明星的愚蠢行为感到遗憾，从此我的名气也就更大了。

随后不久我又出了一本书，大众口味，通俗易懂，由思瓦尔德出版社出版。我坚持，新版书应该用硬皮封面。后来，我又出版了一本袖珍版。紧接着，在思瓦尔德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叫《金钱和股票编织的美妙世界》，还有一本我的心得体会集，名叫《科斯托拉尼的笔记本》。

接下来的一切进展顺利，就是同贵社——经济出版社合作的6本书。同经济出版社的第一次联系非常有意思。一天，总编先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给经济出版社写本书，我说：“或许可以的，但我必须再详细谈一谈。我反正下一周要去杜塞尔多夫，届时我们可以见一面。我们约定在希尔顿的大厅见面。他邀请我在宾馆的饭店里共进午餐。进餐期间，一位非常幽雅而友善的先生坐到我们的餐桌边，他也是在那里吃饭的。他问我：“您就是那位科斯托拉尼先生吗？”我说：“是的。”

“我非常感谢您，祝贺您写了那本《金钱与股票编织的美妙世界》，这本书令我着迷，让我受益匪浅。”坐在我对面的总编先生自然也把这些话听得真真切切。如果这次吃饭是我付账的话，我肯定会替这位先生买单的。

问题三十七：在IOS事件中您做得非常正确，使德国大众免遭了一次大的损失。从这次事件以后，您似乎成了德国经济发展的理性指导者。您认为当今的政客是缺乏经济理性思维的，或者说您对欧洲经济政策的现状还是持满意态度？

答：如果您所指的是欧洲联合进程的话，那我的态度还是满意的。要是让我投票的话，我宁愿投马斯特力赫特一票，不过，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搞这个投票的。我要对那些反对欧洲货币联盟的人说，跟马约

做对不值得，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多狂热的欧洲人，包括我在内，理所当然地梦想着，一个统一的共同的欧洲货币的诞生。他们认为，欧洲政治联合的唯一的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就是首先货币统一。恰恰相反，反对派认为，加盟各国有了和谐统一的经济、金融、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后，统一欧洲货币的前提条件才算成熟。这让我想起过去君主共和制时期的一个类似的形势。当时有两个议会，共同掌管外务、金融和国防方面的事务并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匈牙利的国王弗朗兹·约瑟夫，必须在生效期之前签署完所有的法律条文，但只有在两个议会都同意的情况下他才能签字。当时的钞票只在两个国家印刷，一个是德国，一个是匈牙利。

调整外汇汇率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均衡两国间的经济发展。当然，投机买卖的过度超额认购另当别论。比如说，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指数是2%，而另一个国家的是20%，那么，大幅贬值的货币不管什么时候，不可避免地肯定要在国际市场上与低值贬值的货币相遇，这不会导致过大的贸易非均衡性，应该说，只有防御性的措施能有效地帮助这种局面，但是，处于欧洲陷阱中的这些措施又是荒谬不可行的，因为他们面前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是说，欧洲共同体要首先始于“海关联盟”。

在欧洲，在德国和意大利之间，人们能很清楚地看到通货膨胀的差异性来。好几次，为了均衡通货膨胀带来的心理情绪，意大利里拉被迫贬了值。最近的几次非均衡性，人们可以从1992年9月和1993年夏季的几次金融调整中看出来。1992年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一夜之间突然宣布退出欧洲货币管理体系，他们不再想搅在其中，因为联邦银行的汇率总是紧随他的总统施莱辛格的意志行事，经济形势不断下滑。在近一年后，基于同一个原因，货币体制链条上锁定的货币影响领域由原来的4.5%扩大到了30%。震动幅度的加大是制约投机贸易的最好手段之一。这个昂贵的游戏就此结束了。多种货币被链条联在一起，形成一条锁链，人们共用一种货币，这种情形会导致货币的保守，弱势发展，而这时候正是做卖空投机的好时机，因为风险相对较小。当然，欧洲货币联盟的实际意义已比7年前决定成立时的旨意要现实而且宽泛得多了。

一个一致的通货膨胀率是欧洲国家使用统一货币的前提条件。也只有当工资、生产力和税收等因素全部都达到这个要求，协调一致、同步发展，甚至是受一个统一的欧洲政府和欧洲工会的领导的时候，才能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要达到这一步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还非常大。如果为欧洲货币制定一个统一的前提条件，即统一的通货膨胀率的话；那么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的平均价格也应该一样。但在欧洲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的人们之间该如何协调这个问题呢？我常常往来于德国和法国之间，亲身感受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风俗。在欧盟中的这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相距并不遥远，但是实际上的差距却非常大；法国人看重的是美酒佳肴，德国人则最青睐汽车和住房。再看看英国，英国人对吃喝不屑一顾，他们讲究穿着，衣服必须得体。而对北欧国家的人来说冬季的燃油和取暖问题则是首要的，对于南欧的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各国之间的政治重点也各不相同：法国人对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之类的问题特别敏感；德国人最怕通货膨胀。所以法国人比德国人早得多地接受了黄金储备基金的政策，因为它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而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没有那么多高，储户想要得到的是银行的利息和养老保险。法国人不看重银行利息，他们有了钱就往股票上投。

在对外政策上，英国和法国直到今日还在它们的殖民地国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不迁就于欧洲的外交政策。与此相反，德国这些年来一直在联合国组织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已经习惯于在共同体之中按部就班地处事了。

在环境政策上各个国家之间也是差别很大：德国人率先垂范，从经济税收之中拿出大笔开支致力于此项事业；其邻国的环保意识却没有这么强。德国人并没有把自己的环境政策强加于人；但是鉴于内部政治的压力，德国人也不能更改自己的环境政策。在欧盟统一进程中的另一个大障碍是加盟的12个国家的政治的不稳定性。欧盟政府只是在近四五年来才逐步形成的。在这12个国家的统一进程之中的很多允诺已经形同虚设，成了废纸一张；因为只要其中的某一个国家已经实行了

自己制定的汇率，对其他国家来说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人们设想着，德国以后会是红一绿党联合执政。欧洲在能源环保政策上面的统一和协调也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而法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放弃原子能的研究；在德国，绿党的势力却在不断地扩大。

中央银行议会的成员们坐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也是纷争四起；当他们正式谈到“欧元。”这个词的时候，更是意见不一。他们每年要花38万马克，每个月要去两次法兰克福开会协调相关的事宜；他们让自己这么忙忙碌碌为的是不让自己失业。他们还提出要实现零通货膨胀率，以此来标榜自己。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却不做这种无用功，比如法国和英国，它们就认为较低的失业率要比绝对的货币价值的稳定性更重要而实际很多。同时，让另外的一些国家加入进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像西西里亚人、苏格兰人、丹麦人、西德的东弗里西亚人还有葡萄牙人，正如歌德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不管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不管是意大利人，还是德国人，人人都愿意像其他人一样，维护自己的尊严。

欧元是否进入法律议程还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我想借用朱略斯·罗迈斯的一段歌剧唱词来解释一下，歌剧的名字是《多那格》。30年代首次公开演出的时候我就看了这部歌剧，现在人们把它看成是传统作品，又在法国人公认的古典派剧院法国大剧院上演了。歌剧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个年轻的冒险家要自杀，他卧薪尝胆，立豪言壮语，却无一实现，所以，他心灰意冷，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公园里，他邂逅了一位老者，他叫拉·塔哈戴克，是个地理学教授。老教授是个厌世悲观的人，他向这位要自杀的年轻人抱怨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他要加入法兰西科学院，却被拒绝了，原因是另一个被他称为对手的科学家揭发他，说他的论著中有关名叫“多那格”的那个国家的论述有失实之处，在这个位于南非的国土里蕴藏着大量的黄金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那里根本就没有黄金。

“什么？”那个年轻的冒险家突然跳起来，大声尖叫着，“多那格根本不存在？那我们干脆就造出一个‘多那格’来吧，我们组建一个股票公司，

上市集资，攒足了钱到多那格去开采黄金。”

这么说了，马上就这么做了。他向银行家和金融家们游说，他要建一家公司。股票上市了，报纸、杂志等宣传媒体大肆宣扬、报道，要到多那格开金矿的一切事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不久，全世界的冒险家们，开采金矿的行家里手们，还有那些破了产的妄想家们都来关注这件事，到“评评说说”栏目里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想到拉·塔哈戴克所描述的那个铺满黄金的地方去。实际上，他们一克拉的黄金也没有挖掘到，但是，因为一大批人生活在那儿，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城市倒是建成了，有商店，小吃店和住房等。

即使没有找到黄金，小城里的生意照样做得红火。城里的一个居民举行了一个联欢会，庆祝他来到多那格国10周年。正在人们欢庆的时候，又来了一封电报，纠正一个“科学界的谬误”，给拉·塔哈戴克教授平了反，说他被获准吸纳进了法兰西科学院。

塞翁失马，谁知这一定就是坏事呢？就在欢庆的氛围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多那格人好事成双，多那格国又爆新闻，随着一声爆炸的巨响，多那格国地底下蕴藏的石油喷发了。

所以说，欧洲是否真正拥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货币制度，或者是使用一种统一的钞票都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有实现这个目标的愿望。长期以来扎根于欧盟各国的普通消费者，股民特别是企业家们心底里的观点就是希望国泰民安，所有的一切秩序良好，有条不紊地进行。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家不断地投资、扩建和发展，企业家们广泛加强各方联系，收购国外公司，期望在不远的将来大展宏图。最终在第一份条约签署并生效之前，出现了全世界的大联合。

（记者插言：是的，您说的很正确，但要等一等才能实现，而且，这一等还不是个短时间；世界大联合在一种无序的氛围之中交错——从南极到北极，从亚洲的日本到欧洲再到美洲的洛杉矶，到处都充斥着一种混乱，一种没有秩序。）

这就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所在，像个发电厂。他们是职业的悲观消极者。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或者提到德国的第二次经济腾飞，因为他们缺乏想象力。相反的，他们谈论的是，世界大联合的泡沫早就烟消云散了。这又让我想起也是这个剧作家写的另一个歌剧，我是70年前看的，里面有一个诺克博士，当他的同事用言语攻击他的时候，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病者，只是自己不知道！”现在，按科学的观点，倒正好与之相反，认为，其实人人都是健康的，只是人们没有自我感觉。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议论着危机，真的是纯属饶舌的空话，即便是富有的人还不是照样也有危机。

问题三十八：为什么富有的人有危机呢？

答：奢侈品的消费价格肯定是提高了，我拿皮埃尔饭店的价格做个例子，1940年的时候，我在那儿一个单人间的月租金是400美元，现在呢，一个晚上的房费就是400美元。我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很幸运的是，一直过着富裕的生活。就从这一点来说，我随便就能找出些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做例子，证明我现在的日子不如我过去的日子殷实滋润，从而也能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过去我雇着3个人，帮我料理家务，我25岁的时候就有了私人司机，我毫不费力地就能负担得起这样的生活。

工资绰绰有余，像我以前提到的，在豪华的宾馆住一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周末，我就到圣莫瑞斯饭店里去消磨时光。当时的费用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就掏出去，可今天我就得盘算一下了，因为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原因就是不断增加的服务行业人员的工资。过去，宾馆的服务人员可以免费住在所工作的宾馆里，而且他们还能得到小费。如果入住的客人自己打开车门下了车，对宾馆的大门服务生们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对于生活优越的阶层人士来说，这不是个小事，而且因为他们根本也没什么大的事情。

现在，所有的人都开车出去度假，即使穷人也这么着。德国的旅游经济发展迅速，增长势头居第二位，但大宾馆的费用，每晚300马克，还不带早餐，所以，住得起大宾馆的几乎都是公司里出来出公差的，私人很少有人住。

问题三十九：您没有错过企业经济学或者是国民经济学的学习机会吧？

答：从没有放弃过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在我完成我的上一本书，并将其推向社会的时候，我就等于得到了一份毕业证书。我已经承认，您刚才所提到的那些话。我过去的确隐藏了这一点，其实我也一直留心着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我已经在现实的股票交易的实践中学到企业经济学的知识，有关国民经济方面的知识我是在几次失败的交易中被动地学的。

问题四十：今天您是否还会说，现在学院派的经济理论太多，实用的经验认识太少呢？

答：这的确是世界的灾难，那些不知深浅的人们把从大学的课本里学来的国民经济的理论就当成了现实经济发展的操纵杆。在德国银行这种灾难性就更是显而易见，经济部长奥特马先生全部继承发展了施莱辛格先生的不可理喻，无法评价的政策。罗那得·里根就经常超越范围地向他那些满腹经纶的顾问们提些建议、起草些文件，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空前繁荣的全民就业的经济形势；德国即使在80年代也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正如人称猛虎的那位法国大人物乔治·克里曼考所说，战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人们把战争托付给了那些将军们。那么我要说，世界经济也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为了繁荣经济，人们把经济托付给了那些经济学家们。当然这需要极其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推翻原来固有的理论、拟订的方案，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一片空白之上规划蓝图，振兴经济。莫列尔说：“人们与愚蠢的人共事的时候，就需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了。”

但是尽管如此，现在的年轻人们还是都愿意去学国民经济或者是企业经济，因为这些科目学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在德国一个人要想去一家大企业去谋一个职位，无论如何也是要有一个文凭的。对于企业来说这张文凭就是一份允诺，证明招来的人不是个文盲。不过，当这个学国民经济的人后来又做起了股票交易的时候，就是很不幸的事了。过

去我总是说自己每天都要去股市上转一转，因为我觉着不管我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在每一个平方米上我都碰见好几个愚蠢的人。现在的银行都让那些好像是小商小贩的贸易部的经理们控制着，而且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国民经济学的学者们的理论分析已经和现实脱了节，没有什么人再理会了；要是拿到股票交易上做市场分析的话，那就更只能意味着彻底毁灭了。

问题四十一：您对现在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学生们有什么印象？和他们有交往吗？

答：很难讲。我觉着现在的年轻人们很有才华，但是有的时候又非常愚蠢。总的来讲还是积极的吧。尽管我在任何一个大学校园里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位，但是我在德国、奥地利的所有名牌大学里都是客座教授；我去讲学的时候走廊里都站满了学生。我告诉那些学生们什么是股票，为了在股票交易场上建功立业他们要做的不是算计，而是思想，用脑子思想。有一次，我应邀到曼海姆大学去做讲座，听者逾千人。报告结束后，一位学企业经济的学生向我提问：“科斯托拉尼先生，您的报告非常精彩、非常有意思；不过人要是天天这么左思右想才能获得成功的话，还有必要去股票市场上当交易员吗？”这个问题实在好笑，这个学生就是我才提到的愚蠢的人群中的一个。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很有才智的一面，最后报告终了的时候我给那个学生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让他的那些坐在前排的教授们非常愤怒：“如果您现在离开这所大学，去股票交易市场谋职的话，您就必须把您所学的东西全部忘掉；您不要相信经济学家们那些消极悲观的论断。当我们向着经济的高潮走去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世界的和平；这种和平是1912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稳定。”

问题四十二：您说世界是和平的、经济是繁荣发展的，但是在非洲、在安哥拉、在莫桑比克、在印第安、在拉丁美洲还存在着种族之战；阿富汗也还没有和平；在我们的附近。古老的南斯拉夫也还是战火连绵。

答：是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很让人难过的事情；无疑，这也是全人类的悲哀。不过这于我们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并不是说我没有同情心，我要表达的只是我们的和平以及世界的和平不会因为这些因素受到什么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南斯拉夫已经不存在了。先前，这个火药桶曾经牵动着世界上的两大军事阵营的神经；每一次矛盾出现即是危机在即，好战者荷枪实弹，好像核战争随时都可以爆发。类似的地方似乎也有这样的爆炸性，比如古巴，不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问题，苏联和美国都会各站一边，只要美国站在这一边，苏联就马上会站到那一边，从而使全世界都陷入到了一种紧张状态之中。

当时的南斯拉夫的矛盾其实根本不值得闹大，后来的结果是很多欧洲政客的错误。波斯尼亚不被看做是一个主权国家，它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要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呢？它在历史上可从来都不是啊！波斯尼亚原来是匈牙利君主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它一直是塞尔维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竟然不归顺于塞尔维亚。在20世纪初，当政的塞尔维亚奥波仁那维克王朝依靠卡拉奥地维克家族的势力，把波斯尼亚的势力排挤掉了。塞尔维亚奥波仁那维克王朝想要同君主共和国达成共识，但出现了一股新兴的奥地利—匈牙利反对派势力。随后这个奥地利—匈牙利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包括谋杀即将继承王位的弗朗兹·斐迪南德和他的夫人，直接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件事的根子就是波斯尼亚。

在维也纳愤怒的人群举着标语、走上大街游行示威，大声地叫着口号：“塞尔维亚人死无葬身之地。”当时整个欧洲都被战争的乌云笼罩着；在匈牙利，人们还用一首歌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歌中唱道：“等着吧，等着吧，塞尔维亚，你这条狗！只要匈牙利和德国还有一腔热血。你就永远霸占不了波斯尼亚。”

而塞尔维亚人唱得正相反，他们唱道：“波斯尼亚属于塞尔维亚！只要塞尔维亚人一腔热血尚在，波斯尼亚就不能搞分裂！”事实教育了西方的政客，这是一种要忍耐的痛苦，是一种两国人民共同的灾难；如果不忍耐就会有战争。

问题四十三：那您是否要对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来表达您的观点：人们应该自我解放？

答：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是朝着大一统的方向的，人们也能够用言语规劝波斯尼亚人做出让步，放弃独立的要求；因为独立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身边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话，我马上就会反驳并说服他。波斯尼亚人曾经和我们共属一个国家，可是现在却和我们分离了，这个事实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问题四十四：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提到了建立和平新秩序，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世界的确又是一个平和的世界。不过，您对我们现在的世界秩序真是百分之百地满意吗？

答：现在的情况当然不是最完美的，但是如果让我拿现在的情况和冷战时期的情况相比的话，那我觉着当然还是现在好一些。我每天早晨7点起来听新闻，总是害怕听到什么地方又出现了紧张局势。现在这种紧张的心理应该说已经结束了，我现在早晨的新闻一直要听到10点，听到的当然不都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不过大多数无非是些电影明星的婚变，摩纳哥王妃喜得贵子之类的消息。

问题四十五：科斯托拉尼先生，您的兴趣和关注点一直就是钱，您最大的爱好一直就是音乐，对吧？

答：是的。在我的生命之中有一个坦诚的想法：我永远不会成为音乐人。我的哥哥就是走的另一条发展之路，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时间致力于音乐研究。二战后我回到巴黎，有了时间；拜访恩聪迪教授之前我还试图尝试着作曲。到布达佩斯去就是为了听一个音乐教授的课，不过也只是漫无边际地学学而已。人过60岁，什么新东西也学不了了。这是人老了以后最大的缺点。再比如计算机，我也还是不大会操作。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年龄又赋予了我们得天独厚的东西，我们会变得一天比一天好，每一天都比以前的一天都更有创造力。所以，我当

不成音乐家了。只是为了纪念生活中几件重要的事情，我让人给我谱过几首曲。

我曾经和一位美妙绝伦的古典舞蹈家相爱，她叫贝·高尔；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如醉如痴；我请人给她谱了一首曲子，曲子就是依她的名字而作的：BEA。那位作曲家叫简·弗兰凯西，当时我们就认识了，到现在关系也还很好；她现在还生活在巴黎，已经有85岁了。

就在不久前，我把这首曲子又买回来了；因为有人把这首曲子灌成了CD盘；这次我把它送给了另外一位关系非常好的女性朋友，是施恩堡的伯爵夫人。她是色恩的格劳利亚的母亲，她和我的旧情人有着相同的名字，也叫贝。

问题四十六：您的父母亲让您去上过音乐课吗？

答：我是在音乐的熏陶中长大的，好多年长我的哥哥们经常在我们家摆弄乐器，贝拉拉的是小提琴，还和他的同学们办了亚拉巴马音乐协会；我的姐姐参加了一个合唱团；我的大哥埃梅里希弹的是钢琴，他甚至能谱写曲子。这些古典音乐的美妙旋律就常常萦绕在我的耳边。听得最多的是我的哥哥们拉的室内乐，每天都能听到。在我的儿童时代我就知道了舒伯特、博拉姆兹还有舒曼等一些大音乐家创作的室内乐，直道今天我也还依旧喜欢着这些曲目。

我也去上了钢琴课。和我妈妈两个人四只手在一架钢琴上弹奏过贝多芬的曲子。我的钢琴女教师名叫奥根尼亚·穆勒，她是和著名的钢琴家弗德里希·李斯特学的钢琴；从她那儿我了解到李斯特最爱吃的烤蛙腿，遗憾的是后来我就开始了我的股票生涯，也就荒疏了音乐的学习。不过即使我不弹钢琴我也还是有一架钢琴，是我股票交易所的朋友奥根·万莱弗送给我的礼物，他是阿密·万莱弗的哥哥。他把这么高档的礼物馈赠于我，是因为我给他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我建议他买了门德尔松债券，买的时候是10，不久就涨到了90，这让他收益很大。

我对音乐的热爱还源于我的姐夫，就是我姐姐的第一位丈夫；他带我去了歌剧院，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歌剧院。演出的曲目是马斯卡厄创作的《卡拉维利亚·古斯提卡那》。剧中人古斯·马勒使这个曲目世界闻名。第二次去歌剧院是父亲带我去的，看的是莱恩卡瓦牢的《：巴亚佐》。我的父亲在音乐上造诣也不深，但是和我一样也是个音乐爱好者。第三次是我到歌剧院听了普希尼的《包海默》；第四次听的是瓦格那的曲子，叫《唐璜》。维也纳歌剧院的头儿叫第利根·弗利兹·万格纳，是当时的风云人物。需要提一下的是我当时才13岁，打那以后我经常光顾这家世界著名的歌剧院。

我在巴黎听的第一出歌剧是《玫瑰骑士》c我对这个曲子的印象一般，倒不是因为我在歌剧院里的位置不好，而是因为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音乐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现代的。《玫瑰骑士》是世界顶尖的作品。在首次上演的时候，我还从我表哥那儿知道了一件关于这个剧目的一件趣事。

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歌剧由理查德·施特劳斯作曲，豪夫曼斯达尔德·雨果作曲；服装非常奢华，是人们前所未见的。演出地点是最著名的三波剧院，甚至远在柏林和德累斯顿的人们都坐专列来这音乐之都看演出。我的表哥当时是记者，为匈牙利的一份政治报纸提供稿件。演出应该19点开始，因为是首演，所以备受瞩目；可是到了晚上7点半，剧场的大幕还没有拉开，突然来了3个男人，径直走到第一排落座；因为剧院里很黑，所以看不清楚他们是些什么人。随后歌剧就开始了。我表哥有着一一种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的好奇：这3个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到了就开演？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剧院的经理还去拜见了那，3个人，但是并没有向人们介绍他们究竟是谁，也没有说他们的到来的重要性。我的表哥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演出一结束就紧紧地跟随着到了他们下榻的地方，他觉着知道了他们住在哪儿了也就知道他们是谁了。突然，3个人在一家宾馆门前停了下来，一位显然是最重要的人物说道：“我的先生们，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出我们的想法吧：这首曲子简直就是一钱不值得臭大粪。”后来我的表哥才知道，这与巴黎的歌剧界的权威人物的看法有关。巴黎的歌剧是很有影响力的，把持巴黎的歌剧的人们的评论会直接影响《玫瑰骑士》的购

买商的热情。所以，人们对这3个人寄予厚望。80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歌剧院都在上演着这出“臭大粪”，它的创作者也被人们尊为大师。有的时候股票交易界也是这样，一些股票交易所的顶尖人物对金融市场却知之甚少。

我的态度当然正相反，我很喜欢这部歌剧；到现在也还是我最喜欢的歌剧之一。我可以告诉你我本人最喜欢的所有曲目：最喜欢的是理查德·瓦格那的《纽伦堡的歌唱大师们》，这首曲子我已经听过166遍了；然后就是：莫扎特的《唐·季奥瓦尼》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沃迪的《弗尔斯泰夫》比才的《卡门》瓦格那的《特利斯坦和依泽尔德》沃迪的《奥赛罗》普希尼的《包海默》莫扎特的《洁净的笛子》。

问题四十七：您在一生中是否结识过和您同代的大音乐家呢？

答：是的，有过几个，甚至还包括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贝拉·巴陶克和理查德·施特劳斯。我同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相识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是50年代，我去维茨瑙的森林之湖度假；刚刚住进房间，我的夫人就非常兴奋地跑进来告诉我：“安德烈，你知道吗，我在走廊里看见谁了？”我说：“我不知道，你看见谁了？”

“理查德·施特劳斯，他和他的夫人坐在沙龙里。”我也一下子激动起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位大师只和我有咫尺之遥，心几乎都到了嗓子眼上，一个劲儿地想象着今天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我心里很清楚我一定要结识一下他，这样一个机遇简直就是改变命运的，一旦错过了就永远不会再有下一个了。第二天，正如他所说的，他正在街上散步，我径直向他走过去问候了他；他非常和善友好而且平易近人，我们一同步行着走回了我们共同下榻的那家宾馆。当时我有一辆崭新的跑车，他请求我送他去苏黎世的浴室，他要去那儿修修脚。

大作曲家安东·布鲁克那也是瓦格那的崇拜者，在和瓦格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竟然屈膝跪在他的面前吻了他的脚趾。我想我没有做得那么过分，我开车带着我崇拜的偶像一起去了脚部护理中心。

后来我们又做过几次野游，进行了几次非常有意思的谈话。理查德·施特劳斯生活淳朴、崇尚自然；当时他的情绪非常好，心态平和。德国的命运和他紧密相连，因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他是一个正派的爱国者，而不是纳粹。度假结束以后我们也还经常联系，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已经在《小匈牙利人》中认识了弗朗兹·莱阿；在巴黎的时候我们有经常性的往来。在那儿，我还能经常看到马丽娜·比特里希，我本人并不和她真正相识。我只是和弗朗兹·莱阿关系密切。他是一位大音乐家，是个军乐作曲家，非常有名；希特勒最喜欢的曲目就是他的歌剧《快乐的寡妇》。很不幸的是，他和一个匈牙利的犹太人结了婚。他想离开她，可是她死也不离婚。因为希特勒太喜欢《快乐的寡妇》了，就承诺如果他和她夫人离婚的话，就可以给他颁一次大奖；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就意味着唯一的可能就是和夫人分道扬镳了。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的答复是：“在这种条件下让我离婚我不离。”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和古斯塔夫·福利希正相反；古斯塔夫·福利希就和他的犹太夫人吉塔·阿尔帕离了婚。他的夫人是当时有名的大歌唱家，而且当时还怀着古斯塔夫·福利希的孩子。战后，古斯塔夫·福利希又回来了，跪在地上请求原谅，但是吉塔·阿尔帕坚决地拒绝了。她还活着，已经有90多岁了。

我也同歌剧作曲家埃梅里希·卡尔曼保持着多年的友谊。我做他的金融理财顾问，通过他我还认识了其他的大音乐家，比如弗利兹·克莱斯勒。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总能认识一些有名的音乐家。

问题四十八：您认识伊高·斯塔文斯基吗？

答：不认识，很遗憾。我本来是可以和他相识的。在纽约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可是我们在那里没有机会见面；我那位朋友只是告诉我我和他长得特别像。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后来我在威尼斯的菲尼斯歌剧院看了施特劳斯的《探索的进程》的首场演出，不久之后这个剧院就被烧毁了。我独自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在我对面是一个大长条桌，桌子边上坐着10个人，这10个人在用4种语言聊着天，法语、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正冲着我的是一位老先生，引起了我很大的关注，

我在心里做出了决定，我一定要认识一下他。于是我就主动走过去，坦诚地和他攀谈了起来：“这就是我，只年长20岁。”就在这一刻，我心里想到，这一定就是麦斯特罗·伊高·斯塔文斯基本人。我又问了侍应生，他也证实了我的想法。后来我在威尼斯也和伊高·斯塔文斯基见过几次，遗憾的是没有和他交谈过。

问题四十九：其他一些人您不仅见过而且还有很多交往，特别是歌剧作曲家埃梅里希·卡尔曼；您真的喜欢他的作品吗？

答：非常喜欢，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演奏他的作品，他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在俄罗斯都很有名。我现在还和他的儿子以及他的遗孀微拉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在埃梅里希·卡尔曼在世的时候我和我的夫人微拉还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当然是关于金钱方面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天，我到了维也纳；微拉给我打电话，说：“亲爱的安德烈，我想请求您一件事儿。”

“是什么事儿呢？”我想知道。“那个埃梅里希·卡尔曼想在一小时以后打电话，问问您，一颗大钻石戒指是不是很好的保值办法，请您告诉他是，因为我身边的所有的女朋友都有了钻石戒指就我没有！我可是一位富有的大作曲家的妻子啊！”一小时后电话真得打了进来，埃梅里希·卡尔曼真如所料地那样问我：“一颗质地纯正的钻石戒指是不是真能保值？”因为有约在先，我就答复他说：“您手头只有有价证券，而且还都是美国的，其实也可以把钻石戒指作为有形物品保值的；那样的话将来的回报也许会是十分可观的呢！”

“什么样的回报？”埃梅里希·卡尔曼将信将疑地问道。“当那些女朋友们看到这颗钻石戒指，因为嫉妒而变得耿耿于怀的时候，她们的关系也就疏远了。”我这样解释道。他哈哈大笑起来。一个星期以后，微拉真的就拥有了一颗钻石戒指。当那位单纯的女士为了一颗钻石戒指而欣喜若狂的时候，我倒也是心怀坦荡的，心底无私天地宽嘛。要是某个女士爱上了先生的银行账户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无以满足她的虚荣和贪婪。

对于我的朋友埃梅里希·卡尔曼来说，这也是经他的手送出去的最后一枚戒指了；就在那个星期，他去世了。

问题五十：当我想到贝拉·巴托的时候，我感到您所提到的其他那些作曲家都是在另外的一个曲子的基础上搞创作的。您是在哪儿认识的贝拉·巴托呢？

答：在美国。和我一样他也是个移民，尽管他没有申请移民的任何理由，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崇尚自由与民主的人，所以不愿意生活在第三帝国。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么高尚的人。他总是按照一个贵族的标准来行事，尽管他出生于一个小市民家庭。他是个百分之百的音乐天才，遗憾的是就像英格兰人所说的那样，他的音乐不对我的胃口。对我来说，他的音乐太现代了；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欣赏的是德国的浪漫主义。

问题五十一：您认为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之间的过渡者是谁呢？

答：当然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我知道他的所有的作品，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在苏黎世的度假的时候，一起在圣巴顿的沃纳餐馆吃鳟鱼的情景。那条鱼又大又长，我们两个一块把它吃了。这是一些平常的琐事，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却已经有终生都难以磨灭的印象了。我本来想经常和他谈谈音乐，可是每次都必须大谈特谈股票，特别是他的夫人保丽娜，想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股票交易中去。

事情总是这样，不管我是跟画家、作家还是音乐家在一起，他们都是想让我和他们谈谈股票，其中大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弗利兹·克莱斯勒也不例外，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他。他总是不停地让我给他一些建议和提示，因为他总是有很多棘手的问题，是该抛出去？还是应该卖进来？他认为股票这类问题上我的观点总是比他的看法正确的。不过，他也给我很好的启示：上午在交易所输了钱，晚上就又可以打开琴盒拉拉琴消除心中的不快。

问题五十二：但是，并不是说音乐家都特别爱谈论钱，文学家们也不是都特别爱谈论钱，是吗？

答：是。股票是能使人一着了它的边儿，就再也放不下的奇妙的东西。下面我就说一个典型的故事。我的一位朋友叫亚诺斯，来自布达佩斯。我在法国的时候他经常来看我，他是一位大文豪，在法国文学方面造诣颇深。我想给他介绍一位特殊的朋友，就邀请了我的这位朋友和我的邻居——一位是法国大作家、龚古尔奖获得者，M.c。他还是一位艺术评论家而且是美国的法国文学教授。我特别想在这位法国文学家面前炫耀一下我的匈牙利朋友。我的朋友亚诺斯做了充分的准备，想和这位文学巨匠做一整天的文化交流。可惜，朋友的愿望没有实现。我的朋友不停地问我一些问题，电子产品、石油工厂、黄金价格、股票市场以及原子弹防御等等。我那可怜的朋友亚诺斯没有一点机会，一言未发，黯然地坐在桌子边。预计的文学聚餐不欢而散。

问题五十三：您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吗？

答：经常碰到。但是，为了我心中对艺术的那种崇拜，我还是愿意。所以我愿意警告所有好客的女士们，如果你的客人们是艺术家、作家或者其他的人类灵魂大师的话，就邀请我也到场吧。因为有了我，气氛就会被“污染”，从而也就活跃起来了。

问题五十四：那好吧。不过，要是另外一种情况，愿意和您谈谈股票或者理财的不是知识分子，不是艺术家，而只是单纯的普通消费者，他们只有微薄的普通收入；这样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您有哪些建议？

答：我会对他们说：买一些国际知名的一流公司的有色证券，然后就一劳永逸，放起来再也不用管了。尽管睡大觉去吧，等醒来的时候就会有意外的惊喜等着他！他要是想去股票市场上赚钱的话，那他就该

给他的孩子教育投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最好的投资，我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要是我现在不资助我的父母的话，即使退休以后他们也还得为了生存而奔波。

问题五十五：您的生活开始于匈牙利，在后来您又把生活的重心转向了匈牙利，还在那儿买了一所房子。

答：我不常到那儿去住，很多时候我都是因为贪恋多瑙河边弗姆宾馆那舒适的环境才去住一住的。一个人在一座城市有了自己的一所房子以后，他对这座城市就多了几分眷恋。

问题五十六：您是如何看待匈牙利的发展的呢？

答：我还是很乐观的。当然这需要时间，五六年以来社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国外资本的注入。匈牙利人民是非常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人民。

问题五十七：您如何看东欧国家呢？

答：捷克这个民族是出了名的勤奋的民族，他们有着德国人的美德；波兰人也很优秀，非常积极、活跃。但是做生意的时候却不怎么勤奋，所谓的“波兰经济”有的时候就成了困难的代名词。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最钟情于匈牙利，因为这里已经悄悄地实行了市场经济，甚至也有了股票交易所。交易所开张那天我也在，还被授予荣誉主席的称号。我还能实现我青年时代的梦想，我还要开自己的股票交易所，还要建自己的歌剧院。有个人叫奥古斯特·爱沃丁，我和他关系很好；我经常和他开玩笑地说：“等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就是歌剧院的院长了。”这就是我的梦想。

问题五十八：您从布达佩斯到了巴黎，与布达佩斯的联系却从来没有间断过。除了哈波斯堡的奥拓之外，当今的匈牙利的各路豪杰之中，您还和谁有联系？

答：在我90岁生日那天，我接到了古拉豪恩总统的邀请；他同时还邀请了在国外的其他著名的匈牙利人。我在那儿见到了哈波斯堡的奥拓先生，他是瑞士人；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成为一位匈牙利领袖人物。共和国的总统能让他实现这个想法。我已经跟他认识好几年了，经常能碰到他。他总是特别快乐，而且他的快乐也特别能感染人，他说着地道的德语，说着地道的战前奥地利德语。

问题五十九：他的匈牙利语怎么样？

答：像我讲的匈牙利语一样纯正。我有一次问他：“奥拓，”我总是这么称呼他，“您认为我的匈牙利语怎么样？我已经有70年不生活在匈牙利了。”

“棒极了。”他说。然后他问我我是如何看待他讲的匈牙利语的，他可是从来没有在匈牙利生活过的。他有一个匈牙利语的家庭教师，从那里学到的纯正的匈牙利语。他的母亲是兹塔·波旁—帕玛王后非常聪明。他的两个哥哥我也都认识，一个叫热内，住在纽约，像我一样有自己的家产，通过他的婚姻成了丹麦国王的女婿。有一次，我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自然是给了我丰厚的回报。我告诉他，他应该去华盛顿，他和住华盛顿的丹麦大使关系很好，去打探一下丹麦的长期贷款是否可以在1941年的12月归还，那样就可以购买了，他和他的朋友接受了我的建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在美国，我对欧洲各国的政府贷款很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债务国是被德国军队占领的国家的贷款。

这个问题是关于丹麦王国的债务证券的事；这个证券被拿到了美国的证券市场上去运作。人们已经购买了债券息票，但是问题还不明了，大家对是不是偿还这样一个危险的问题还是没有底。“付款还是不付款，对于丹麦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问题。”这涉及6%的有价债券，这些债券在市场上是以平常值的6折记的账。6个月以后，就将以全额被贴现。这样一笔不寻常的预支对于一项长期贷款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债务人，丹麦政府，在美国银行并没有一大笔美元储备。

这个证券的比率为30：40的时候我就已经买了一小部分，为什么人们在当时的60：70的比率的时候就该抛售了呢？当人们几个月以后再简单地回到交易窗口，为的就是以百分之百的比率贴现的时候，证券还会慢慢地攀升到哪个点9尼？我就是不知道，丹麦是不是会付款。

直到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小时，王子从华盛顿给我打来了电话（王者的礼节就是“准时”），“无人偿付贷款！”虽然丹麦政府不是一个赖账的债务国，丹麦政府为了贴现其有价证券而在美国存储了足量的美元；但是，他们一定是把储蓄柜清空了，把财产转移到了另外一项晚一些时候才到期的现在仍在运转着的债券上去，就没有能力再支付利息了。这一笔60%的贷款利息日后也应该是被偿还的，但不是用这一笔资本金。

我只能把我的丹麦证券以特别便宜的价格抛出去了。因为只是到了规定日期前的一个月才攀升到了最高点，90点。我就是在90点鼓足勇气全部售空的。这个利率对我来说是个惊喜，我没有想到会长这么高，我甚至开始怀疑王子通报的消息。不过，很快，一天早晨，在《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丹麦政府的一个重要声明，声明写道：“丹麦政府非常遗憾地不得不痛心通知其债权人人们……”内容就是那些我从王子那儿听到的消息。这批贷款在攀升到60%的时候就已经垮掉了，我的内部消息卓有成效。不过，打那以后我就不大相信《旧约》第143条第三段大卫国王所说的：“你们不要再相信王子们。”

问题六十：科斯托拉尼先生跟您谈话的人根本就想象不到您是1906年出生的，而且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过去的人们不像今天的人们这么幸福，那个年代的人该会把您这个年龄的人作为寿星来看待了。您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而且总是充满激情，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意思正好相反的问题：科斯托拉尼先生也会偶尔地想到死亡吗？也会想到生命的尽头吗？

答：遗憾地想过。我已年届90，我时时提醒自己，当我和别人约定半年以后的学术报告的时候我就会自己问自己：半年以后我还能不能去

做那个报告。我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图书室里独自地想，我如果半年后不能按时付约会怎么样呢？更糟糕的是，我所有的这些证券又该怎么办呢？人们会把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扔掉，几年前我去苏黎世参加完我姐姐的葬礼之后，我去处置她的房屋和财产，也是把大部分东西都给扔掉了，我心里其实特别难过，因为我知道，一个老人对于这些使用过的充满了自己的生活痕迹的物品是感情深厚的啊！

问题六十一：是的，这些是与死亡相连，但却又是来自于生活的一种念头。如果允许我接着问下去的话，再以后呢？对于您来说死亡是一种终结吗？还是说死后还有某一种存在的方式继续施加自己的影响呢？

答：我不知道。

问题六十二：那您给自己留了惊喜吗？

答：是的，我给自己留了一个惊喜。我祈祷，我还能庆祝2000年的千禧夜。

问题六十三：您也做些身体运动吗？

答：根本没有任何体育运动，就像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从不运动。”

问题六十四：科斯托拉尼先生，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些绝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呢？您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观点，您都是以此为杠杆，来衡量其他的事情呢？

答：我愿意接触那些客观而毫无偏见的人，只要一个人善待我，把我看作一个正直的人，我就决不会不正确地对待他，这是一个积极的为人处世的态度。我依照人们各自不同的品格来评价与我交往的人，是充满智慧的，是美丽漂亮的，还是有道德感的。我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人的各种各样的品格，积极因素10分，消极因素10分。

我有些朋友，他们的积极因素——智商分是10分，消极因素——道德分也是10分，因为他们是职业扒手。而我在我的朋友圈子里的形象则正相反，我是重道德的。说一个人是否美丽，我理解，这就是在评价一个人的外在的表现出来的东西。一个人可以不是乖巧伶俐，也可以不是谦逊圣人，但是他可以照样对他人有很大的影响力。

问题六十五：您希望自己被人看作是博爱的慈善家还是被人鄙弃的人呢？

答：那当然是众人之友了。我热爱人类，走到任何地方，我都会主动与人攀谈；而且，我相信，对方也很喜欢我们的闲聊。特别是在青年朋友中，我的知名度很高。

问题六十六：我想，日后如果有人总结您的事业生涯和声望的话，一定会让您感兴趣的，是吗？

答：我非常有兴趣，这是我的一大幸事，因为我的书已被翻译成了8种文字，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售出100多万本。我的书被翻译成了日语，还被翻译成了匈牙利语——不是因为我是匈牙利人，他们才把我的书译成了匈牙利文；而是因为，匈牙利人对股票交易特别感兴趣。当我去华盛顿的时候，我总是要先去议会图书馆，为的是看一看，那儿是不是有我的书。您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记者答：没有，不过我曾经在百科全书中查看过一次，看看是否有我的名字，我找到了，里面有我的名字，我感到很自豪。）

我写的书上了最佳销售排行榜，可以说10%的版税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我更看重我写的书在现实中的作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人们愿意花10倍于我的书的钱获得我的箴言和忠告。我的书将成为我生命的延续，我的后代们还能用我的书。

（记者总结：那么，这就证明：对于您来说，钱的确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您的后代虽然受益了，但是并不会为您付出半点酬金。这是人性善的一种写照，是给后代的最宝贵的遗产。）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目录](#)

[问题一：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先生，您1906年出生于布达佩斯，居住在巴黎，工作在德国，持有美国护照，那么究竟哪里是您的家乡呢？](#)

[问题二：但是您的家的感觉是与哪座城市、哪些地方联系在一起的呢？扪心自问，下面的这些问题您应该如何回答：我的家在哪里？我将叶落归根于何方？哪里给我留下了对生活的铭心刻骨的印象？](#)

[问题三：您人生的前20年是在布达佩斯度过的，追忆一下旧时时光，说一下当时您的家庭，好吗？](#)

[问题四：您是受的天主教的洗礼，不过，您的家庭本该是信犹太教的，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五：您是由一位德国的家庭女教师带大的，是吗？](#)

[问题六：您又是如何相对来说那么早地远离家乡匈牙利去了法国巴黎呢？这与您的职业生涯设计有关吗？](#)

[问题七：第一个建议后来怎么样了？](#)

[问题八：您直到今日还一直坚信，要做证券生意，决不可人云亦云？](#)

[问题九：那么，您对当前的德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持乐观态度？](#)

[问题十：我们谈到了“建议”，您作为股票投资人是否曾以工作之便从官方那里得到过一些不是人人皆知的所谓内部消息呢？](#)

[问题十一：您是否认为，在几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搞内部控制真的有效呢？](#)

问题十二：您父母打过您吗？

问题十三：我还想再回过头来说一说布达佩斯，您不仅出生，而且成长在君主立宪制国家，还在那里上了学。您印象中刚开始的几年是怎么样的？

问题十四：您对1914年战争开始爆发也有印象啦？

问题十五：您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匈牙利的反应吗？

问题十六：您的答案始终是来自于您对美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信任，美元根本不会下跌的，美元属于地球上的被证实了的东西。

问题十七：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从未开展过一次真正的全面战备防御，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工作。纳粹们一直想全面但实际上也没有彻底组织这场战争。现在，回到您的青年时代，当您从布达佩斯去了巴黎时，您已经在学校和跟您的家庭教师学了德语吗？

问题十八：您也已经能说法语和英语吗？

问题十九：您是怎么到了巴黎？那是在哪一年？

问题二十：那是欧洲极度通货膨胀之时，对您却影响不大，是吗？

问题二十一：德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德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自打那以后，德国人患上了永久性的与德国政治休戚与共的通货膨胀恐惧症。他们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受到这种恐惧的伤害，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科斯托拉尼先生，他们经常在一些文字章节中提到“通货膨胀恐惧感”，而且他们非常重视马克的稳定性，并把对此稳定性的把握能力视为评判德国银行的基由，是拥戴还是攻击。您如何看待通货膨胀并不是最大的苦难的说法？

问题二十二：我们对黄金从没有这种依赖性。您估计我们落后于法国，原因何在呢？

问题二十三：现在我们谈一谈您年轻的时候在巴黎，是不是很快就进了亚历山大先生的公司了？

问题二十四：您是如何步入股市的？

问题二十五：就在您这几年成功的职业生涯期间，在德国，纳粹势力逐渐强大，您对其影响力做过估计吗？

问题二十六：当1940年反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您和您的同事，以及法国人是如何反映的？

问题二十七：德国的犹太人的境况不同吗？

问题二十八：不过您在美国并不仅仅是成天参加各种各样的晚会，您是移民，是为了躲避迫害从欧洲逃离出来，到这里避难的。您是如何量入为出，维持生计的呢？

问题二十九：您当时的20万美元按当今的社会购买力折算的话，是现在的多少倍呢？

问题三十：您是否想过办一家自己的经济实体？

问题三十一：这是一个富有的年轻人的经历。为什么您在二战结束后又回到了欧洲呢？

问题三十二：然后您在欧洲都做了些什么呢？股票交易所肯定是都关了门了。

问题三十三：您是如何明智地预感到，德意志帝国或者说德意志帝国的后来人的购买力会再次恢复呢？

问题三十四：那您得到了您所期待的了吗？

问题三十五：到现在为止您已经多次使用了“天主教”这个词，您本人是天主教徒，阿登纳也是天主教徒，您如何理解天主教教义？您参加天主教的宗教节日吗？您笃信天主教的教义吗？

问题三十六：在随后的几十年生涯里您又开创了一个新的事业。您成了一名记者，32年来，您为经济报纸杂志写了大量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文章，在您的同龄人都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時候您并不服老，而是奔走各地，到处演讲，不遗余力地宣讲您的理论。您为什么要这样呢？

问题三十七：在IOS事件中您做得非常正确，使德国大众免遭了一次大的损失。从这次事件以后，您似乎成了德国经济发展的理性指导者。您认为当今的政客是缺乏经济理性思维的，或者说您对欧洲经济政策的现状还是持满意态度？

问题三十八：为什么富有的人有危机呢？

问题三十九：您没有错过企业经济学或者是国民经济学的学习机会吧？

问题四十：今天您是否还会说，现在学院派的经济理论太多，实用的经验认识太少呢？

问题四十一：您对现在的大学校园和现在的学生们有什么印象？和他们有交往吗？

问题四十二：您说世界是和平的、经济是繁荣发展的，但是在非洲、在安哥拉、在莫桑比克、在印第安、在拉丁美洲还存在着种族之战；阿富汗也还没有和平；在我们的附近。古老的南斯拉夫也还是战火连绵。

问题四十三：那您是否要对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来表达您的观点：人们应该自我解放？

问题四十四：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提到了建立和平新秩序，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世界的确又是一个平和的世界。不过，您对我们现在的世界秩序真是百分之百地满意吗？

问题四十五：科斯托拉尼先生，您的兴趣和关注点一直就是钱，您最大的爱好一直就是音乐，对吧？

问题四十六：您的父母亲让您去上过音乐课吗？

问题四十七：您在一生中是否结识过和您同代的大音乐家呢？

问题四十八：您认识伊高·斯塔文斯基吗？

问题四十九：其他一些人您不仅见过而且还有很多交往，特别是歌剧作曲家埃梅里希·卡尔曼；您真的喜欢他的作品吗？

问题五十：当我想到贝拉·巴托的时候，我感到您所提到的其他那些作曲家都是在另外的一个曲子的基础上搞创作的。您是在哪儿认识的贝拉·巴托呢？

问题五十一：您认为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之间的过渡者是谁呢？

问题五十二：但是，并不是说音乐家都特别爱谈论钱，文学家们也不是都特别爱谈论钱，是吗？

问题五十三：您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吗？

问题五十四：那好吧。不过，要是另外一种情况，愿意和您谈谈股票或者理财的不是知识分子，不是艺术家，而只是单纯的普通消费者，他们只有微薄的普通收入；这样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您有哪些建议？

问题五十五：您的生活开始于匈牙利，在后来您又把生活的重心转向了匈牙利，还在那儿买了一所房子。

问题五十六：您是如何看待匈牙利的发展的呢？

问题五十七：您如何看东欧国家呢？

问题五十八：您从布达佩斯到了巴黎，与布达佩斯的联系却从来没有间断过。除了哈波斯堡的奥拓之外，当今的匈牙利的各路豪杰之中，您还和谁有联系？

问题五十九：他的匈牙利语怎么样？

问题六十：科斯托拉尼先生跟您谈话的人根本就想象不到您是1906年出生的，而且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过去的人们不像今天的人们这么幸福，那个年代的人该会把您这个年龄的人作为寿星来看待了。您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而且总是充满激情，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意思正好相反的问题：科斯托拉尼先生也会偶尔地想到死亡吗？也会想到生命的尽头吗？

问题六十一：是的，这些是与死亡相连，但却又是来自于生活的一种念头。如果允许我接着问下去的话，再以后呢？对于您来说死亡是一种终结吗？还是说死后还有某一种存在的方式继续施加自己的影响呢？

问题六十二：那您给自己留了惊喜吗？

问题六十三：您也做些身体运动吗？

问题六十四：科斯托拉尼先生，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些绝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呢？您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观点，您都是以此为杠杆，来衡量其他的事情呢？

问题六十五：您希望自己被人看作是博爱的慈善家还是被人鄙弃的人呢？

问题六十六：我想，日后如果有人总结您的事业生涯和声望的话，一定会让您感兴趣的，是吗？